



記憶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9月13日第22期

总第168期

REMEMBRANCE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68期

中央学习班·周向红专案

目录

向红 我的“文革”

1. 办周向红学习班的情况
2. 周向红的问题摘要
3. 周向红交待材料（一）
4. 周向红交待材料（二）
5. 周向红交待材料（三）
6. 周向红交待材料：复员前
7. 周向红交待材料：复员后
9. 周向红给周向阳的信（一）
10. 周向红给周向阳的信（二）
11. 周向红给顾北青的信
12. 余翔：关于周向红同我接触的一点情况
13. 顾北青：关于周向红在和我接触中谈论到的一些问题（1974. 4. 27）
14. 顾北青：关于周向红在和我谈话中谈论到的一些问题的补充材料（1974. 5. 13）
15. 周向阳的证明材料

附件：

11. 周向红给黄项阳的信（1--12）
12. 周向红写给黄项阳的日记（1-2）
13. 周向红给鲁莹（晓艾）的信（1-2）

我的“文革”

向红



我因林彪的“9·13”事件先后被办过四次学习班：第一次是1971年10月下旬听完传达中央57号文件后当即被广州军区“留堂”的学习班，地点在广东省军区体校，听传达文件的有很多人，都是当时在广州军区服役的干部子弟，留下办班的除了我们学院的同学以外基本都不认得，但记得有父亲被中央文件点了名的黄永胜三子、四子、养女，邱会作次子，还有其他军区首长和广空首长的孩子，历时四天。第二次是我当时在读的本校广州中山医学院主办，参加者是我们这届学员里的干部子弟，历时一周。第三次则是由广东省委主办、委托广州中山医学院经办，参加者是在校的“9·13”事件中父母被中央文件上点了名以及受到牵连的其他人，除了我还有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江腾蛟的大女儿江新德、南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的二女儿陈梅、上海空军第一医院“ ”政委宫健的小女儿孙晶、南空学员带队的“455”医院军医陈兰英，还有我母亲所在的空司门诊部带队来上学的负责人陈隆银等。我们这几个作为“重点对象”每个人都由三个表现积极的党员同学“帮助”，同住同行，行动变相受限，所写的交待材料一律上报，记得一次学习班开会，领导很有成就感地宣称：“你们写的材料有的已经上报到中央专案组了！你们要继续深挖，坚决和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划清界限！”这次历时三个月。前三次办班时都是停课，然后补课。本卷宗记载的是最后一次即中央专案组的学习班。一般来讲学习班规格的级别意味着问题程度的严重性。

事情起源于和我同年入伍的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之女鲁莹。1971年“9·13”事件

中她因跟随空军党办“调研小组”（即所谓“小舰队”）成员“南逃广州”而被抓获，先是关押在亚洲学生疗养院，后转入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的中央专案组学习班：216信箱。这个学习班成员主要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有为林立果备选的三位女青年（她们是张蓓琴、袁庆华、张宁。张蓓琴和袁庆华是由林立果亲自挑选、亲自定点培养的上海女孩子，其中的张蓓琴更是与林立果经常见面，是林立果心仪的最终人选。1971年9月12日离开北京时张、袁陪林立果乘坐“256”三叉戟到了山海关机场，林告诉她俩接了“首长”一起去广州）、还有黄永胜的保健护士小辛、空军34师空乘队长孙富荣、301某护士等。另有黄永胜长子项阳、李作鹏的大女婿刘伟钦，如果没记错的话还有邱会作长子邱路光。

由于学习班是上午劳动、下午学习，纪律比较宽松，鲁莹和项阳渐生好感，加上张宁也是干部子女，“同是天涯沦落人”，很有共同语言，三个人便经常私下聊天，谈论内容涉及时政和“9·13”。结果被学习班领导发现后引起高度重视，分别找三人谈话，张宁首先将所谈内容和盘托出，对此项阳部分承认并且对生活问题做了检讨，鲁莹拒不认错。学习班领导经过甄别将此事定性为以项阳为首的“翻案小集团”的翻案活动，同时为防范“不轨”禁止他们再接触。鲁莹为了和项阳继续保持联系想出一个办法：他们分别写信给还在部队的我，由我再交叉分寄给他们，我就这样成了他们的信使。频繁的信件再次引起学习班领导的注意，他们派人私自从鲁莹的抽屉里拿走了一打信件，终于发现了项阳、鲁莹违抗学习班规定仍然保持热络联系的秘密，再去项阳那里查抄到了我给项阳的信。中央专案组由于发现了我的参与，勃然大怒之下可以说是勃然大喜！大怒之下将项阳转去丰台的空军执法队看押，大喜之下果断对我采取了专政手段。

记得是在1974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已复员回北京在家待分配近两个月有余，先是被我母亲单位空军司令部门诊部医生以“检查卫生”为由到我家侦查情况，见我在家，遂后即派一人前来以“主任有点儿事找你”为由将我诱至门诊部二楼会议室，由身穿陆军军服的时任门诊部主任的于某高声宣布：“周向红！由于你参加了中央专案组学习班成员黄永

胜之子黄项阳、鲁珉之女鲁莹的“翻案小集团”，参与了翻案的活动，经王洪文副主席亲自批准、由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亲自安排，决定给你个人办中央学习班的附设学习班，委托空司、空政给你就地办班，不去团河。你要严肃对待、老实交代你们的翻案活动！”随即摘去皮带、发卡等一切他们认为可能被用于自杀的东西，立即将我扭至空军司令部老办公大楼地下室看押。因为是在地下室，所以需要24小时都开着灯，我由空司门诊部的几个医生、护士轮流看守、送饭，除一周一次去澡堂洗澡可以穿过半个大院外，每天到地面放风一次，其余时间不得出地下室。

学习班基本上是由一位孙姓的空军保卫部的干部领衔，另有两三个人和他一起围攻我。紧紧围绕“翻案小集团”的成员，让我交代都有哪些“翻案活动”，后来把时间追溯到我复员前的活动。另外根据他们立即进行的第七次抄家抄到的信件，把范围扩大到我所有的往来关系上，让我交代所有接触过的人、是什么关系、做过什么、说过什么以及和别人的通信内容。他们逼我承认自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对反革命分子周宇驰深表同情”、“对现实不满”的“现行反革命”，在往来的信里和别人的揭发材料上划出或红或黑的重点线，作为“证据”。学习班历时三个月，最后做结论时他们说：“根据你的反动言论你是现行反革命无疑，应该逮捕法办！但是根据我们党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让你去参加劳动，好好改造世界观，彻底和周宇驰划清界限！”

“9·13”以后我们在空军大院的家已经从原来4号楼的四居室搬到职工住的11号楼一间屋里，在给我办班期间空军干脆连这一间屋也收了回去，家具中的一套藤沙发和金属折叠椅被拿到门诊部办公室使用，其它杂物被临时堆放在门诊部一层的一间小屋子里，将从1955年就跟我们一起生活的奶奶硬性遣返回河北老家，一个学习班，使得人亡的家最终也破了。最损的是空军把我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登记表撤下，这一举动意味着我失去了能分配工作的资格。所以当学习班结束后，我面临无家可归、无工作可分配的境地，空军曾经企图也遣返我回老家，被我拒绝，又骗我先去哈尔滨的姑姑家暂住，但都没有得逞。最后将我送到空军南苑机场空司生产队菜园劳动，表面上是安顿我，实际

上无限期、无报酬，是他们报北京市公安局想送我去“劳动教养”不成功后的“强迫劳动”，直至我1976年9月结婚才得以离开那里。

团河农场的中央学习班1975年在毛泽东批示的“以观后效”后解散，鲁莹去了成都，不久后复员回京；张蓓琴和袁庆华坚决脱下军装回了上海。项阳获得自由比大家都晚，他出来后先是通过记忆中我哥哥在西山农场的地址找到了我哥哥、得知看我的下落，再找到在南苑机场遥遥无期劳动的我，除了劫后余生他深怀内疚！当我以为这下他和鲁莹终于能够如愿以偿相聚了，高兴地要把鲁莹新的地址告诉他时，他沉重地说：不必了，我不想跟她再联系了，她太幼稚，把我们害惨了。

1988年我们一家三口从青岛调回北京，第二年9月离婚。离婚后我才获悉前夫只把他自己的档案关系转入了北京市，我的档案则被他搁置一旁成了“黑户”，人生再一次归零，我无法就业。调令一年有效，而一年前批准我们调入北京的赵紫阳总书记也已下台，我只好拿着自己的档案找到李铁映的弟弟李铁林，想调入他刚刚担任区委书记的北京市东城区谋份工作。档案交给他之后，有一天他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当着我的面与时任东城区劳动人事局的魏局长一起打开我的档案袋，取出这份厚厚的卷宗、一叠我和我父亲周宇驰的合影以及一本我以前的笔记本郑重地递给我，他说：我们认为这些东西不适宜放在个人档案里，你带回去自己保管吧！就这样，记录着那一段思索、青春、苦痛和历史的文字归还到了我本人的手里，

我给项阳写的信及后来的交代材料里凡“黄项阳”、“黄向阳”、“项阳”均指项阳，因彼时未曾与项阳见过面，仅是为了与哥哥周向阳加以区别。“D哥”、“冬哥”则是因循项阳的小名衍化而来。信中“艾”、“A”、“小艾”、“晓艾”均系鲁莹。

文革于我曾经边缘感很强，毕竟当时的年龄没有参加过“打砸抢”和“大串联”，像是隔着一块玻璃观看社会，它们像是都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直至“9·13”，文革不再是虚幻。从一个坚信自己是红色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到突然被“以革命的名义”抛出红色阵营、在旋涡里徒劳地挣扎着无处安身，这种失去“革命”的政治身份的认同感、无处

不在的异类感时时警醒着我；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等等丧失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艰难处境长时间地困扰着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给自己上纲上线的“泼脏水”羞辱着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情感、意愿、思想，用别人的语言强加到自己头上的扭曲刺痛着我。这份卷宗体现了没有人事权的组织、学习班在文革中无上权力的存在，它们可以以党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偷走”一个复员兵的档案，再以革命的名义把一个人任意带走、强行关押，最后不打招呼、不负责任地在这个人的档案袋里塞进他们想塞进去的任何东西。这一连串的恶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这样的事情绝不是只发生在我一个让的身上，它为什么能在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肆虐不已？

顺序号	材 料 名 称	材料日期	备 考
1	呈请参加反帝斗争材料	2页	
2	周向红给周向阳信	3页	
3	周向红给周向阳信	10页	
4	周向红给周向阳信	29页	
5	周向红给周向阳信	7页	
6	周向红给周向阳信	1页	
7	周向红给周向阳信	5页	
8	周向红给周向阳信	16页	
9	周向红给周向阳信	3页	
10	周向红给周向阳信	14页	
11	周向红给周向阳信	12页	
12	周向红给周向阳信	37页	
13	周向红给周向阳信	3页	

这份卷宗自 1974 年 6 月起在我的档案里，如影相随跟着我从南到北最后回到北京，至归还给我的 1989 年历时 15 年有余，其间，有胆子大的干部偷偷告诉我“你的档案袋好厚哦，比老红军的都厚，读起来像是小说！”也有私底下表示同情，说自己“9. 13”时恰在北京怀柔县的渤海所当基干民兵，参加了当年围捕直升飞机的行动……。改革开放后我也趁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之风给中央写信，说明自己曾“受‘四人帮’魁首王洪文迫害”被办了学习班，要求对档案材料进行清理，但没人理睬。

得到卷宗后我从未翻阅过，我没有勇气去阅读亲友们的揭发材料，我也不想再触碰当年项阳和鲁莹的所做所为。“9·13”让我尝尽人情冷暖，我习惯把一切情感思绪收藏起来不为人道。只有十年前，在给英伦读书的侄子写信谈及“想家”时，我才偶然地回眸一顾：

十五岁的时候入了伍，一个人远走高飞，离开幼稚的中学校，离开家庭，在一个全然

陌生的地方，扮演着一个革命战士，重回课堂，却是全新的大学生活。心里很满足，希冀自己飞得更高，告诉自己已经长大，离开的家是属于父母的，我已不再需要它了。离开你，是那么无所谓，甚至怕家人发现自己欣喜不已。但也许，离开你是为了想念你。

后来政治风暴来了，一切美梦都被打碎，现实异常残酷，生活在亚热带，却感到了人情象严冬般的寒冷。因为父亲的全国皆知的反革命，在公开场合下，我只能表示对其的唾弃，其余任何情感都只能是在心里，默默地流着眼泪想念熟悉的一切。

作为一种处罚，放假时有家我也不能回。没有人知道我的心事。我不能跟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同学啦、朋友啦一同俗气地老去，俗气地家长里短，感叹时光；我因怀揣心事而变得与众不同，散发着忧郁的美丽，这种美丽很昂贵。

故土的人只知道我的小时候，异乡的人只认识现在的我。只有自己收藏着那个分裂的完整的自己，并且享受着那种分裂自虐。年轻时某个阶段的瞬间幻想，带着那么一点自虐的成分，总之，是借着沉重的离去而幻想一个空灵又完美的人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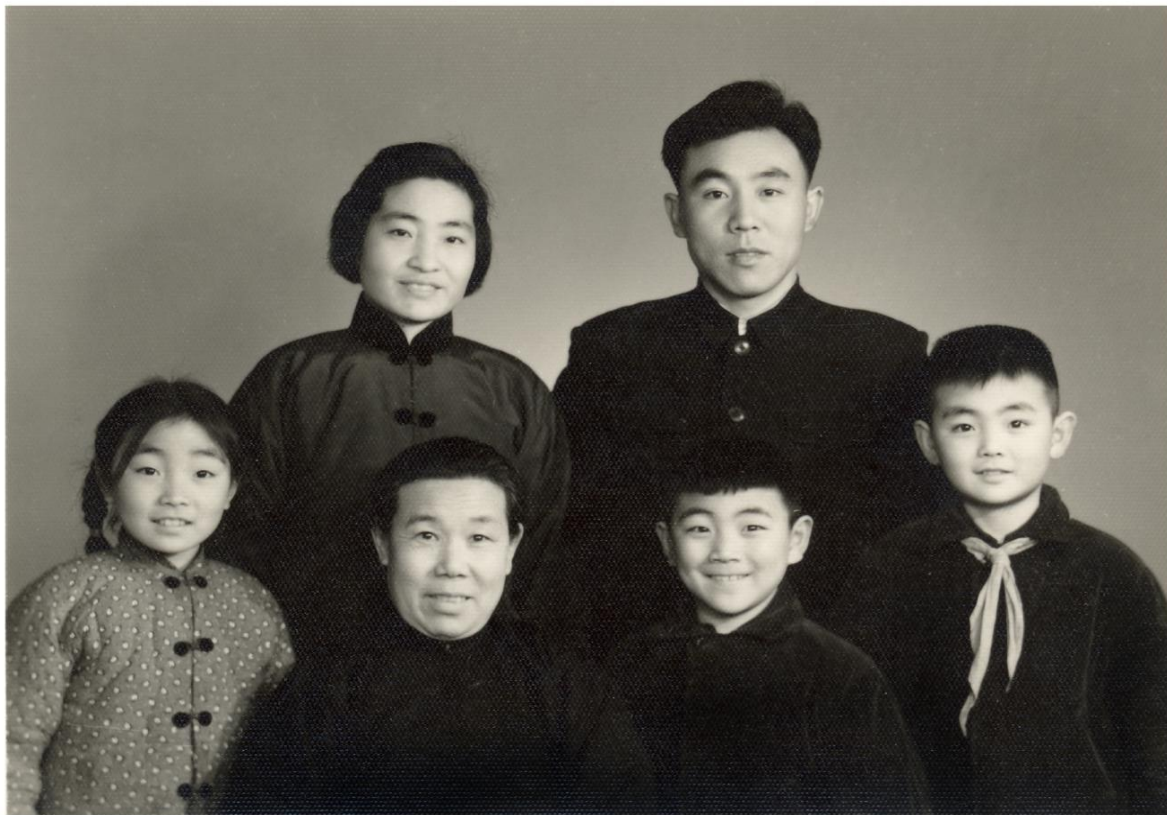
故乡、恋人、祖国、爱情——如今，已经认识了太多的人，你也不一定要跟你至爱的人结婚。凡俗的结合可能有实惠，但空灵的境界似乎更让人回味。不在国内的人，说起中国，似乎更有资格似的。放弃了爱情的人，来谈爱情，好象更有内涵似的。总之，我们的人生，似乎是需要一种空缺，一份未能实现的感情，一个想念着的人，一个有所寄托的地方，才能享受一种完美、空灵的滋味，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自己。

今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是“9·13”事件第四十五周年，三月的一天早上，我鼓足勇气打开尘封已久的档案，如烟的往事历历在目，看到了在政治漩涡里一个无辜、上进、好学的女孩子从“革命战士”到“复退军人”再到“现行反革命”一路上的苦苦挣扎，如实地反映了阶级斗争观念下整个社会不仅人性丧失、狂热偏执、文化断裂，而且在无限上纲和滥用专政手段的“红色恐怖”下，导致了人人为了自保的“自黑”与互害。

翻阅中我蓦然发现了其中夹了那张当年我填写的、被空军从北京市海淀区复员退伍军

人安置办公室擅自拿走的待分配卡片，它就静静地夹在发黄的卷宗里，无声地控诉着被剥夺的自由、被剥夺的时光、被剥夺的权利、被扭曲的人性……。我无言地盯住它，明白自己的人生本来可以是另一番风景，顿时感到痛彻心扉！就是这张卡片，促使我下了原文公布自己专案的决心，用以纪念这两个不应当忘记的日子，用以告诫人们这两个日子应当永不再来，是曰“我的‘文革’”。

2016-6-20



后排左起：妈妈，爸爸周宇驰；前排左起：我，奶奶、弟弟向华、哥哥向阳

办周向红学习班的情况

林彪死党周宇驰的女儿周向红，一九七三年底由空军上海医院复员回京，住在空军大院十一号楼其祖母处，等候海淀区安办分配。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专案组倪树林等三位同志，根据郭玉峰同志的指示，介绍了周向红与项阳（林彪死党黄永胜之子）为首的反动小集团关系密切等问题。他们思想反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批评批孔运动，为林彪反党集团鸣冤叫屈。指示空军对周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对周进行搜查，清查项阳给周的信。经空军领导同志批准，当天下午办了周的学习班并进行了搜查。

在学习班期间周交代了她的反动罪行，并写了交代材料。对搜出来的信件已经转至中央专案组和有关单位。同年六月上旬解除周的学习班，暂放在南苑机场空司生产队听候海淀区安置办公室处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保卫部（盖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司政治部保卫处（盖章）

一九七五年.五.二十三

周向红的问题摘要

周向红一九七三年底复员，今年一月回到北京，暂住空军大院。周回京后与其兄周向阳积极与林彪死党黄永胜、鲁珉、顾同舟的子女黄项阳、鲁莹、顾北青、顾南青、顾怡青等人进行串连，为林彪及其死党翻案。其主要问题是：

1. 污蔑党内斗争，为林彪及其死党鸣冤叫屈。

周攻击我们党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在今年一月二十九日给鲁莹的信中说：“今日你整我，不知明天谁整谁。”据周交代，这一反动观点是“九.一三”前周宇驰对她讲的。她竭力叫嚷对林彪一伙不能“全盘否定”。污蔑批林是“阶级偏见”。今年三月周与其兄周向阳、顾北青、顾怡青逛动物园时说：“一会儿讲这个人好，一会儿又否定，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周向红等人继续鼓吹林彪一伙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法西斯精神。他们对周宇驰等人的自杀，赞赏不已，大骂李伟信“贪生怕死”，恨他没有“杀身成仁”，是“最可鄙的”。

清理材料摘记					编号
材料名称、来源	林之果提到联合舰队				
原件时间	72.1.12	编号		现存放处	南空材料科77
摘记材料标题	周向红和林之果等在一起			摘自页码	1
处理意见	转空司				
主要内容： 陈励耘之女陈萍揭发（71.12.26）： 七一年三月在松山警卫处小林贼住处楼上吃饭， 王明鑫把大瓶白酒都加进酒。陈励耘说：“敬你 部一杯酒，祝你部身体永远健康！”小林贼立刻接 着说：“祝我们的联合舰队不断强大！” 周宇驰的女儿周向红也在场。 74.4.19 王松					

空军党委清查办公室

她给黄项阳的信中说：“人，应该坚定，将一条路走到底。所以我欣赏赞叹 zh（指周宇驰）而绝不赞叹 L（李伟信）的投降”。

他们采取胡风反党集团“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的反革命策略，蓄谋翻案。她给黄项阳的信里讲：“最好暂时听话”，在谈到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时说：“问题是我们的对手（永远？暂时？）力量太强大了……”表示“必须学习”尼克松的“战斗精神”，在另一封信里还说：“愿意自己的朋友干有把握的事”。她给鲁莹的信也说：“不反对历史的变迁”，即拥护复辟倒退。

此外，他们对林彪一伙的垮台，十分惋惜、怀念。称赞“小舰队”是“少壮派”、“有能力”、“有魄力”等。

2. 为林彪死党周宇驰翻案。

周向红、黄项阳、顾北青、鲁莹等，自认为“同属天下沦落人”、“有着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语言，均认为自己的老子是“被迫”“上当”，“跟错了人”，

并为他们涂脂抹粉，竭力美化，周给黄项阳的信中说：“九.一三”以后（好感）全转移到父亲身上了，我又独出心裁地将其特点提炼了一番，变成超阶级的东西，时时回忆，收取益处。”她说她对周宇驰是“典型的一分为二。她还说周宇驰“并不是什么凶神恶煞、蛮不讲理、一肚子坏水的人”。她还作了一首怀念周宇驰的诗，说什么“可叹中华骨，常在梦中会。”扬言要为周宇驰“争气”。

3. 对现实不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九.一三”事件后组织上对她一再教育挽救，但她执迷不悟，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尤其是未能提干当医生而复员，对党更加怀恨不满。哀叹现在的处境是“上帝成贫民”，“今不如昔”，“治于人了”。她在给黄项阳的信中恶毒污蔑现在“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表示“对现在的，总是有点反感”，同意“谁人执政三十年”的变天思想。给黄的另一封信里讲：“我怀疑一切。我不信，现在这个世界真的如广播员与印刷厂所讲的那那么美好。”她用“吸一口空气，苦的，喝一口水，苦的，苦，苦啊！似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味道全在我面前消失了，退去了，惟留这个苦！”来发泄她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

她还把组织上对她的教育挽救污蔑为“剖开了”她的“胸膛”，“检查了”她的“心”，对她“痛苦的呻吟全然不顾”，给她“留下了道道伤痕”，咒骂帮助教育她的同志是“愚人们”，是“直接干涉他们言论自由的罪魁”等等。

4. 和黄项阳为首的反动小集团的关系

从查获的周向红、黄项阳、鲁莹的来往信件看，周是知道黄、鲁的三人反动小集团的，虽未正式参加，但表示和集团“思想上建立统一战线”。

在另一封信里还表示和黄“手挽手、肩并肩地勇敢地向伟大的目标共同前进。”



周向红交待材料（一）

(一)

黄向阳，鲁莹和张宁在学习班里曾组织过一个小集团。

(一)

黄白阳、鲁普和张宇在学员班里曾组织过一个小集团。

这件事大概经过是：听鲁普在春节前后讲过，在以前，我知晓鲁普与黄白阳、去年夏天三个人照了一些相也。而最近这些“被领导”发现了，他们作例行检查，经普名说后，才意识到不仅是简单如两个人心怀嫉妒，还有什么“搞翻案”的政治名堂。但我当时并未重视“翻案”的“小集团”，而只是单纯认为他们太不谨慎，不该把时间闹到这些地步。所以给鲁普的信中只说到要见利忘情。二月初左右，我与黄建订通讯联系，并给黄和鲁普下一段时间的“空使”，从彼此的信件里可以获悉，他们所做检查非真心，而是迫不得已。黄一再主张“普阳同志”的“精神胜利法”。

在我给黄的第2封信，我（以开玩笑的口吻）写道：你们的小集团我是不参加的，但在思想上可以搞“统一战线”。当时

这件事情的大概经过是听鲁岩在春节前后讲的。在以前，我只晓得鲁与黄的关系，去年夏天3个人照了一些相片。而最近这些事被领导发现了，他们做了检查。经鲁岩说后才意识到不仅仅是简单的两个人的关系问题，还有什么“搞翻案”的政治名堂。但我当时并未重视“翻案”的“小集团”，而只是单纯认为他们太不谨慎，不该把事情闹到这等地步。所以给鲁莹的信中只谈到要克制“感情”。2月初左右，我与黄建立了通讯联系，并给黄和鲁当了一段时间的“信使”，从彼此的信件里可以看出，他们所做的检查非真心，而是迫不得已。黄还一再宣扬“吾师阿Q”

的“精神胜利法”。

在我给黄的第二封信里，我（以开玩笑的口吻）写道：你们的小集团我是不参加的，但在思想上可以搞“统一战线”。当时，我的意思是，要求通信可以，决不要是因为想把我拉入他们的那个小集团。但因为小集团在 73 年 11 月底时形式上就已不存在了，无所谓参加不参加，故是“玩笑”。后来，在回答有关这方面的询问时黄告诉我，这个三人小集团被组织上和群众称之为：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替林彪反党集团鸣冤叫屈”，“为总长和

部长翻案的‘反动小集团’”。这些并未使我吃惊，因为我觉得：

①谈论一下过去，回忆自己的父母，这在于子女来说是难免的，算不上什么“翻案”，且没有这种翻历史案的能力。②我一直认为，黄向阳和鲁莹是由于感情上的关系，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例如想“翻案”而密切起来，所以说不上什么“小集团”。③我就没少谈过周宇驰，但我还是要革命的，二者并不矛盾。再说，他们的信里也没有透露过反动的有意狠狠整人，是小题大做，很可笑。在这个问题方面，我们达到了“统一”。这样，一方面我对组织和学习班的反感增多了，不止一次地表示我的不满，甚至连领导上批评他们“道德败坏”，也认为是胡说八道。另一方面，我对他们的处境给予同情和支持，认为他们是“无辜”的，劝他们忍耐，“识时务为俊杰”，并未对他们小集团的反动之处予以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立场的批判。

黄向阳和鲁莹果然没有透露过错误的想法吗？是领导无中生有，有意整人吗？是作为朋友的我，不愿触怒他们而放弃斗争吗？恐怕都不是。主要原因在于，我是以自己去衡量他们的，而我的思想中就存在着和他们相似或一致的东西，彼此之间产生了共鸣，是“心心相印”的。那么，我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怎么会去指责他们“反动”呢？我们有“共同语言”，以后又互相影响和渗透了。议论父母的确是难免的，否认这一点就不现实，问题是怎么议论，采用什么基调，抱什么感情，站什么立场，其内容是歌颂呢，还是相反？主席说过：“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但都错了，因此我们之间就不存在什么“异议”了，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涉及到了自己的家庭、父母，触及了自己的灵魂，就不继续前进，采取了含糊的有时甚至是与革命相反的态度和立场。假若仅仅从“没有翻案能力”来确定是否想“翻案”，实在幼稚可笑。当然我们没有权力向广大人民宣布什么，难道在个人的头脑里就不存在“翻案”与否的问题吗？还是存在的，这就是承不承认历史的结论，承不承认亿万群众对于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的问题。如果不承认，就是“翻案”。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意识支配的，今天有“翻案”的思想，明天就必然会

有“翻案”的行动，对于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这股“历史潮流”，发表或保留反对意见，确属“反动”。

对“反动小集团”的态度，我从根本即立场上错了，参不参加不过是个形式问题，关键在于思想。

（二）

在如何看待十次路线斗争，如何对待父母的问题上，我们虽也具备了正确的认识，但没有在头脑里把它上升到统治地位，没有勇气同旧的传统观念和反动老子做最后彻底的决裂，在某些场合下，只把正确的东西当成装装门面的东西，以免受或少受革命浪潮的冲击。

在我给黄向阳的通信中，在他的回信里，尽管表达方式不太相同，但意思只有一个。我们坦白地写道，对周宇驰、黄永胜等人的看法评价，我们与广大党员群众是“不一样的”。批判过后，不是仇恨的延伸，而是爱戴的再现，还把这个反复视为“正常现象”，“应该”如此，且表示“没办法”不这样。这个坦白，虽然当时是小心翼翼的，现在又似乎“迫不得已”，但都是真实写照。

我们谁也不是不明是非的小孩子，用“儿女长情”来解释，自己也知道是行不通的，对这个反复真的没有办法吗？无论是愿意施行或不愿意接受，办法总是有的。但我（们）把这些办法，看成是“有意整人”，“小题大做”了，予以嘲讽，（在心里及某些行动中）采取“不接受主义”，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耍了两面派，没有从根本上只是口头上“解决”了矛盾，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和林彪及其死党们站到一块儿去了，难怪这么认为。

（三）

“我们现在走着一条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路。”

我的这句话曾得到了黄向阳的赞同，认为它是“较客观”的。于是乎，我也因它的“符合实际”而欣赏了一番。

①究竟这条“路”存不存在？这是需要首先搞清楚的。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无论谁也否认不了，在这个斗争中，每个人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就是革命的前进的路，即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走的路；另一条是反动的、倒退的路，即资本主义的林彪及其死党走的路。二者之间或以外是不存在第三条道路的。我说的那条“路”，只存在于少数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实际上是没有的，是行不通的。它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完全被否定了。

弄懂了，承认了①，在②里，就需进一步澄清：既然那条“路”根本就未曾有过，那我（们）在前一阶段里，到底走着一条什么路呢？事实可以证明的，除了“资产阶级的路”以外，没有其它，在我们的言谈中、通信中，与无产阶级背道而驰的东西还少吗？

对这句话的错误之认识，在写它和欣赏它时也有过，但一闪而过没起什么作用。现在我认识到，这是在严肃的大是大非面前，避免表明自己的真正态度，即非无产阶级的态度，是在为思想上的倒退行为辩护，混淆了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界限。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会越来越远，最终必定要与反动分子“会师”的。

周向红交待材料（二）

（一）

我原来对林彪及其死党包括周宇驰在内，一度憎恨得咬牙切齿，确实从思想上认识到，他们与我们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但后来由于放松了政治学习，放慢了前进的步伐，落后了一大截，当我发觉这一点时，就把“标准”降低了许多，要求自己“少想”他们就行了。

问题不在于多想少想，而在于想的是什么，我又是怎样想的呢？

批林时，说林彪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知识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

阅，我却认为批得笼统，对林彪贩卖孔孟之道表示佩服，说他古书读得多，否认他“什么知识也没有”，因此，认为在这方面，批得有些“过火”。听了顾北青讲林在建军方面有功，也觉得不错。在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面前，我又想到了“一分为二”，其含义也就是说对林彪及其一伙野心家、叛徒、卖国贼不该全盘否定。

这就是我想的内容，当我想到什么“过火”，“一分为二”时，岂不是说只有我们才是正确的，只有我们的这种程度，才不“过火”，只有我们，才是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岂不是说，全国广大人民群众都不对，批林批孔运动搞坏了吗！？

“过火”，这和《571工程纪要》里林彪一伙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疯狂攻击多么相像，和孔孟的“中庸之道”又多么一致！历来的阶级斗争都从来没有按照“中庸”去做，两个对立着的阶级相互间也从来都是采用“过火”的行动的，否则就不能达到本阶级的政治目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秦始皇不采取“过火”的“焚书坑儒”行动就难以维持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统治。同样，无产阶级对刘少奇、林彪一伙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活动如不予以看来是“过火”实质是极必要的行动，不镇压他们，不剥夺他们的发言权，无产阶级的政权，社会主义的建设，劳动人民的主人地位，这一切根本保不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对林彪一伙就是要“过火”，就是要狠狠批判，这是阶级斗争的必要手段，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林彪反党集团不是攻击我党对苏修“做绝了”吗？这只能说明他们与苏修是一丘之貉。现在我们又怀疑批林有些“过火”，不也反映出我们的立场同林彪的是一样的吗！？至于什么“一分为二”“客观地看待事物”无非是为了让自己的论点站得住脚，是在“明知故犯”的情景下的一种较有效的自我安慰罢了。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以革命的词句粉饰自己的行动，竭力‘从左面’批评党，竭力穿上‘左的’外衣”，而实际上却实实在在是站到了资产阶级的立场，维持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二）

回京后，曾对我哥哥说过，“爸爸还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以前有人说我和他的关系十分亲密，某种程度上甚至超出了父女的长辈关系……我还不愿听。“九·一三”后我才清楚意识到自己是很爱他的。在现在人们的心目中，死党们一切都是很坏的，可是爸爸以前对我们说过一句反革命的话吗？没有吧，对我们最多的要求就是“多看书，好好学习”。哥哥告诉我，周宇驰在自杀前喊了一句反动口号，我只说了一声：“没意思”。在回忆李伟信的交代材料时，对周在临死前的狼狈情景的描述使我心里感到“不光彩”。在给黄向阳的信里，我提到了要把周宇驰的某些东西（如能力）上升到“超阶级”的地位，然后取之，变为自己的。我写道：对于我的父亲，我一直是很敬佩的，我也曾经站在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立场上揭发他、批判他，那时我是恨他的，并且竭力想象他怎样的凶残，使自己相信，但是效果不持久，我怎么也做不到永远恨他。因为我始终没看见过这些，这些不过是我的“假设”，“真实”的东西不是这些。

早在七三年底，我就曾写过“可叹华中骨，常在梦中会”的诗句，流露出对他的怀念。

列宁说过：“真理是具体的”，无论什么事物都有它的阶级内容。根本没有超阶级的“能力”，周宇驰的那种能力是专门用来干反革命的。过去大小“舰队”的成员们不是也都称赞过他吗？林彪不是还用他那只连中央文件都不肯签字的手给周宇驰、刘沛丰写了一封信，鼓励、感谢他们吗？周宇驰不就是凭着这种能力充当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最后落得个叛徒、卖国贼应有的下场吗？这种能力的内容是与他们反革命的目的相适应的，这种能力越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危害也就越大。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怀念称赞无产阶级的敌人、反革命分子，可见立场挪到了敌人一边。

从称“反革命分子周宇驰”到叫“爸爸”，从“恨”得咬牙切齿到“爱”得更深，从“坚决彻底划清界限”到想到“为他（们）争口气”，从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到要学习他（们）身上“超阶级”的东西，这是怎样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从要革命的立场转到了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立场，这是最根本、最大的变化。毛主席说：“世

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周宇驰是个死心塌地为林彪反党集团卖命的反革命分子，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对他的态度问题，就是对待林彪反党集团的态度问题，对他们一伙恨不起来，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也谈不上爱。不同他们划清界线，就不能成为彻底的、真正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为什么转变了？为什么我由“恨”退到了“爱”？父女之情解释不了，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单纯只存有私人关系，最重要的是阶级关系。过去，在同志们和组织的启发、帮助下，我把周宇驰等人视为阶级敌人，想到的不是他对我喜爱，而是他们要谋害伟大领袖，要让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立场对了，感情上就勇于划清界线，就恨。后来，思想改造放松了，原来不多的阶级恨更少了，资产阶级思想上升到支配思想行动的次数越来越多，终于，对他们由“斗”变成了“亲”，由“恨”变成了“爱”。“划清界线”要靠行动来“划”，不是单凭口头说一说或者一两次学习班就可以划得清的。思想改造不能一劳永逸，吃过去的“老本”是不对的。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存在，都对每个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刻苦学习，刻苦改造的必要性尤其重要。界线要划一辈子，毒素要清一辈子，同错误思想也要斗一辈子。

（三）

林彪一伙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歪曲成“整人”，这种极荒谬的错误对我的影响不小，给鲁莹的信里就谈到了：今日你整我，不知明日谁整谁？

我在写这句话时，是有糊涂和错误认识的。①认为这场斗争还不是整林彪及其死党；②顾北青曾转述了一句话，“谁人持政三十年？”我受了影响；③反映出我对政治的厌倦心理，对“整”来“整”去的路线斗争很不耐烦，对批林批孔当前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是不重视的。

路线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绝不是什么个人之间你整我、我整你

的争权夺利的小事。林彪一伙妄图隐藏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混淆阶级阵线，达到篡政的目的，故意将阶级的斗争歪曲为个人之间的斗争，无非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了整的“真理的化身”，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污蔑。其实真正要整人的就是林彪一伙，他们要重新在中国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要把千百万劳动人民置于死地。这是林彪一伙“贼喊捉贼”的拙劣表演。

周向红交待材料（三）

（一）

不久前，我在给黄向阳的信里提到了对现实抱有“反感”，在我们的信里，经常出现“命运之神”和“上帝”等人物。我们不信任任何教，却把宗教名词利用于我们的不可言明的言中。“反感”，是我们对现实感情的总和，“神”和“上帝”是用来代替某些事物的，可以使我们毫无顾虑地对着这两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人”发泄胸中的“反感”。

我对现实的反感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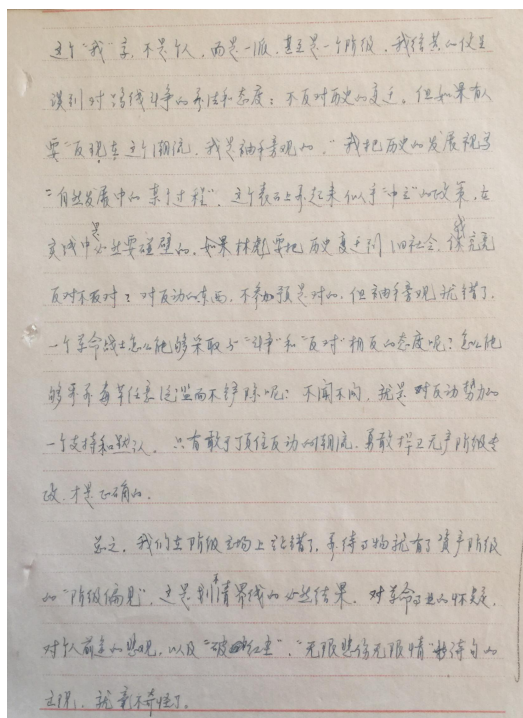
①对平反的和解放的干部，觉得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否定。好像九次路线中受压的人现在要整十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似的。②对空军新领导班子表示怀疑，对改变空军面貌的信心不足。③形势是否真的一派大好？批林似连我们一起批了。

说来说去，就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全面贯彻落实的情况“反感”，因为在我头脑中仍然保持了过去的看法。对林彪、林立果及死党吴法宪一伙把持空军大权时搞的那一套“看惯了”，对现在就“看不惯”。其实，又何止所列举的3、4点呢？站的立场错了，必定左右到我们对现实的很多看法。现在对几点“反感”将来发展到对一切都“反感”，现在用神来代替，将来就会“直言不讳”。所以说，“反感”是反动的开始。不迅速抛弃这种危险的思想感情，终究会被它引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矛盾是要转化的。

对现实“反感”也由于我们个人地位在九•一三前后来了一个彻底的本质上的变化，用我们的话来形容，就是“一落千丈”。如果从私益出发当然留恋过去的生活而不满现在了。

(二)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本是孔孟宣扬的反动剥削阶级思想，我却故意将其同现在比较，认为这是“符合现状”的。我解释道，治，领导；治者劳心，永远以脑力劳动为主，治于人者，是干体力劳动，即劳动者。后来，我和黄向阳还多次用过“治人们”一词。



除了“治人们”，还用过这样的名称：当今的统治者（阶级）。很明显，我们是站在被统治的地位上讲这话的。这个统治不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意思，也包含了阶级统治的。当今的统治阶级是谁？是无产阶级。谁是被统治阶级？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林彪一伙要搞资本主义，开历史的倒车，就属于被统治阶级之内，也包括了我们的父母。他们搞反革命被无产阶级专了政，并不意味着我们也同样。只要我们坚定地站在革命路线一边，积极参加反复辟的斗争，主动地划清了思想上的阶级界线，是会产生被统治的感觉的。可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划到革命的敌人一面去了，反过来还埋怨别人，真是岂有此理。

(三)

除了“谁人持政三十年”外，黄在信里还说过别人曾讲，“三十年后我掌权”，“三十年后军委扩大会上见”，这些话都明显地把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指向了中国共产党所

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我”字，不是个人，而是一派，甚至是一个阶级。我给黄的信里谈到对路线斗争的看法和态度：不反对历史的变迁，但如果有人要“反现在这个潮流，我是袖手旁观的。”我把历史的发展视为“自然发展中的某个过程”。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中立”的政策，在实践中是必然要碰壁的。林彪要把历史变迁到旧社会，我究竟反对不反对？对反动的东西，不参与是对的，但袖手旁观就错了。一个革命战士怎么能够采取与“斗争”和“反对”相反的态度呢？怎么能够看着毒草任意泛滥而不铲除呢？不闻不问，就是对反动势力的一个支持和默认，只有敢于顶住反动的潮流，勇敢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正确的。

总之，我们在阶级立场上站错了，看待事物就有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这是划不清界线的必然结果。对革命事业的怀疑，对个人前途的悲观，以及“破红尘”，“无限悲伤无限情”诗句的出现，就毫不奇怪了。

周向红交代材料：复员前

1973-12-22 至 1974-1-3

一、认识及看法

1 认识。我知道自己复员的消息是在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时许，是我科协理员徐际鹏通知的。

当时，他询问我有何想法。我表示，这件事并不意外，也是符合我本人心愿的，一定服从命令、服从分配。徐要求我继续工作。同意。谈话时间较短，约十几分钟。

对于复员退伍的认识。我脑子里的正确与错误的均有。去年（按：指1973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我与马爱英（按：传染科的同事）在25路无轨电车是说过。记得是这样讲的：

复员我是有意的，在传染科里工作，学不到什么技术，回到地方还可以弥补这个不足。但是虽然明知“在什么地方都要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因为家庭而脱军装，总归心里不舒服。有这样一种感觉：离开部队似乎在社会地位中下了一个阶梯，与留队的人相比似乎好像矮了一头。马同意，也说自己不想留队，一因紧张、枯燥、艰苦，二因业务水平提高不快。

2 看法

(1) 对政策执行情况的想法。我得知其他家庭有问题的子女除了南空的以外，并未处理退伍或复员，因此认为南空太积极，“左”，掌握政策不稳。

(2) 对医院及科领导的看法。最初，以为是科及医院决定我走的，故不满，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这么干脆就决定，而且自己也未实习完，未免太说不过去。对领导以前所说：对你与其他同志一样看待，并不有所区别；你父亲的问题是与你无关的，你的走与留，取决于你自己的个人表现。我报以嘲笑，认为是想让我好好干活，少给他们找麻烦。后得知我退伍的通知是南空打电话来决定的（按：实际上是空军先打给南空，南空往下传达的）。

二、与领导及他人的谈话

1. 协理员。我因医疗费问题经常同伊吵。他说应该实事求是，我说他不一视同仁，因别的科的退伍军人患有同我一样的病而特意给医药费（先是答应考虑），我们科就一口否定：“此病不是病”，很恼火，曾说过，什么叫病？看我能工作就否认无病？到快断气那天就晚了。你们怎么执行政策的？因为徐事事做不了主，讽刺伊是“传话筒”，无用，怕犯错误，总之，很怕、很气别人讲自己与周宇驰并提而论。

2. 岳主任。宣布复员后的某一天，我们在宿舍楼门口谈话，我哭了，主要是还是因为医疗费迟迟无音信，我曾说：凭什么说我不实事求是？！你们要诊断书，那就让我回家拿，我不是为了那几个钱，而是觉得领导接人待物不是一碗水端平，不给就不走。这两年多来，我无论走到何处，都是“你要相信党的政策”，“你与周宇驰是不一样的”，“重

在个人表现”。我不是不愿意退伍，因为愿不愿意也得走，我是觉得以前你们说过的话为什么与现实不符？！我表现不好吗？我工作不买力气吗？难道我自己“喜欢”万事均与周挂上钩？还不是领导决定的？！我身体不太好，贫血一度较厉害，HB 9.8，连上一层楼都心跳气喘，化验单也有，为什么不承认？不关心群众。什么“执行政策”，反正早晚得复员；什么“不一样”，我这次退伍还不是沾了周的“光”？你们倒好了，在这里舒舒服服，月底领薪水，回家孩子也在，我回去是什么样子你清楚吗？“455”太冷了，无情义。岳当时未表示更多的异意。

3. 院政委。我陪另一个退伍军人为了解决伊之组织问题去政委家里。我问政委：为什么让我走？曰：根据部队建设、科里工作及很多方面，这些你科协理员会加以解释的。我说，部队要保持的纯洁性，我是深知的，不就是因为我是周宇驰的女儿吗？有什么不好直说的？曰：否。我说：如果论“部队建设、科里工作”而决定我是不服的，我这一年来可曾请过一次病假或事假而影响工作的？你是否了解我的工作学习情况？传染科伙房战士不干活、压床板、打架、骂领导、公开违抗领导，却多么轻的从事，我与他们相比哪个妨碍了“部队建设、科里工作”不错，我学习中发言较少，但较谁？只能较主任、主治医生等个别人，我们科学习向来发言的人很少，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注意我一个人。

4. 夏尉华。此人乃同院同年退伍军人。宣布复员后我与其接触较多，去政委家也是与她。我曾叹道：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早晚要走的。因为没有拿到复员费，我们都很生刘东洲院长的气，是他让我们去领而又不通知会计室，我们在回医院的路上发了很多牢骚。埋怨领导说话不算数，坑得我们白跑了两趟，夏骂刘是“猪头”、“废物”，“恨不得拿刀零剐了伊，保证可以卖二十几斤猪头肉”。因为当天晚上要开欢送会并且会餐，时间定在17时半，我已答应参加。夏说：会个屁餐！我就不参加！咱们到那时把酒席给他掀掉，让你们吃！我说，“我可不敢。”对于她的骂及方法我是不敢使用的，虽然我心里也很生气，但我知道这些话若是从我的嘴里吐露，后果不堪设想。我与夏不算熟，加上她骂得很痛快，并未加以制止，只是带笑听着，很惊讶伊之“胆量”。我表示，欢送会还是得

参加，我与她不一样，吃不吃那顿饭无所谓。我们知道当天晚上刘副院长也要去的，准备好质问他一下，要是不认账，就骂他。夏说，“455”最冷冰冰了，需要你时讲好话，不需要你时一脚踢开，我早就看透了。我也讲，就是。那天岳主任早就议论了她刚到“455”时的情况，我还说，今年若不安排我走，明年（74年）提干问题就无法解决，卖苦力完了，上医生班了就让我走，早知道我才不干呢！党培养我读完大学，放着技术不用，干了一年卫生员，就走了？！如果在地方，一年能学到多少知识啊。

三、欢送会及会餐上

1. 欢送会上，我同夏刚自医院回来（传染科不在院本部），两个科的协理员就来“请”了，我说太累，歇一会再去。不依，我去了。我怕开这种会，心里不是个滋味，人家送来的糖我也没吃，坐了一会，眼泪马上就要掉下来，我就冲出去了。门口正遇协理员拉夏往里进，问我，答：胃疼吃药。吃过药后，返。会上未发言，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心情是沉重的，舍不得离开，且心里正因为钱的问题憋了一口气，别人的发言我也没认真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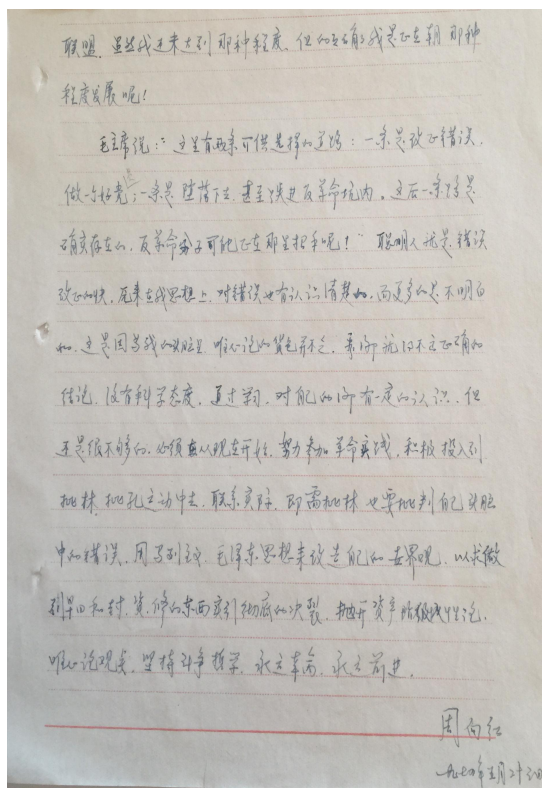
欢送会一会儿就结束了，怕饭菜凉掉。往外走时夏说“办事找不到人，现在吃饭人倒一大堆。”我觉得对，下楼梯时重复了一遍。

2. 会餐中。未动筷前我与下开始质问刘副院长，为什么不通知会计室而叫我们去领钱致白跑一趟。这事他疏忽了，不对，自然答不上话来。我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记得自己讲了这么些个话：复员以后就喝不到酒了，今天要喝个够。夏说：喝！来他个一醉方休！醉了以后就朝坑咱们白跑的那个“最恨”的人脸上吐过去！这句话约说了两遍，我们指的是刘副院长。他当我们的面讲得很容易，“医药费好解决，申请嘛”，“你们去领复员费嘛，什么时候都行！”结果我们真的着手去办是老碰壁。故觉得当天我们最“恨”他。因为那天可以说我喝醉了，脑子昏沉沉的，还说了些什么也记不清，但后来医院政治处处理此事时，差不多是这些话。

从我心里来看，我无丝毫将刘副院长或者其他同志敌对起来的意思，这个“恨”，非阶级仇恨，这个“骂”亦非政治谩骂，只是“质问”。讲过后，一方面由于醉，一方面由于问题基本解决，所以没有再进行这套幼稚的把戏。后来，医院政治处刘副主任找我谈话，很严肃地指出，这反映了我的世界观问题，中林贼的毒较深。我意识到自己酒后失言，想解释清楚，效果不佳，领导对我的辩解可能认为“不想认错”、“诡辩”，并宣称：如果我“不能很好地认识这个问题，明天（74.1.2）就不要走，什么时间想通了，想对了，什么时间再走。”这对我无疑是个警告。我想不通，为什么我只是重复了别人的话，“罪名”会落到我一个人身上？而当我来时，夏还装得没事一般，其实她已“揭发”了我，把一些本来不属于我的事情推到我身上。可悲的是，领导居然完全相信她的话。这肯定与我的家庭出身分不开。为了早日回京，为了迅速认识、改正我的错误，我做了较正确的口头检讨。也许因为在这以前我花了不少时间替自己辩解，故这个检查领导只是接收了，不能算很满意，也不至于差到哪去，因为领导毕竟把火车票给我了。

按照领导的分析，我的错误是无疑的了，但我对这个处理方法（按照领导意图，我在1日晚上向岳主任做了检讨汇报，并让她替我在两个科的交班早会上做检查，第二天我就要离沪，时间不允许）终抱不满：夏尉华的问题“她所在科领导找她谈一谈就行了”刘副院长讲。我觉得“人一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反正一辈子总得有这个称号：周宇驰的女儿。对领导的批评教育，我还是接受且感激的。

对领导追究此事的看法，我曾对马爱英、曹鲁鲁讲过，归纳起来是三个字：不服气；或者：不认错。想：小夏说得，我就说不得？当然，这都是政治处找我谈话以前的事情了。



离沪时于至今依保留的看法，就是对方法的不满。抵京后，在同原科主治医师杨健萍及战士李民乾的信中谈过。因为李本身对领导也有意见，我在给他的第一封信里怨气较大，说“455”在我临走前整了我，我要记一辈子。

四. 活动情况。按照日期顺序分述

12月22日

下午随科里同志到医院开会，会议的上半部分我同夏尉华未参加，我们一起去另一个退伍军人刘玉英（其父是高炮师的师长），那时她还没接到通知，她问我突然否，我说早就猜测到了，像我这样的出身的人，早不走晚也得走。后来我们又去内科看了一个住院的退伍军人魏民（其父可能是高炮三师的领导，同刘父一样十次路线斗争中有问题）。互相了解了一下情况，在谈论到医院为什么不办老兵退伍学习班时，据魏、夏分析，“是怕我们聚众闹事。听说26师的大兵复员时像发了疯似的，喝酒、打架、骂领导，把会餐的饭菜全掀了，根本不理领导那一套。因人多，也未作何处理就让他们走了。咱们医院西区教训，主要是怕咱们向他们提出条件和要求。”我对医院及其它情况不熟悉，对刘、魏以前也未讲过话，夏认识。我们找不到负责退伍问题的刘副院长，就去参加会议了。散会后，我同马爱英一起回科里，路经南京路时，给余翔打了个电话，约他明天出来玩，并告诉我复员了（他父亲是原“9·13”后司令部专案组的负责人，现在无职，余翔本人亦退伍，当时他属空四军汽车连，是司机，调去农场锻炼，我们电话就是打到农场的）。然后回到科里。上午曾发了几封信，告诉他们我复员了。

23日

九点钟以前，我去科里交班（交病房，退出医疗工作外），回到宿舍时，余翔已到，我、马爱英及余翔一块儿向南京路出发。中午在国际饭店进餐，下午去豫园，快吃晚饭时，我和马送余在上海北站乘车回农场后，在北站吃了一顿饭，坐车回科里。曾经去过“红光照相馆”拍复员证上的照片。

24日

在宿舍整理东西，看小说。

25 日

同夏尉华到医院。别人告诉我们刘玉英得不到通知后一整天没起床，老是哭。我们看见她后劝她要有骨气，不要求助于谁，走比留好。她说想离开“455”，不想退伍。后来我陪夏、李海涛（另一退伍军人）去徐家汇照相。李与我们分手，我同夏乘车去淮海路，逛商店后返回科里。

26 日

同夏尉华到医院。我本无事，她要求解决入团问题后再离队。去的路上，我们谈到一些考大学的具体问题，我对家里有问题的子女一律复员退伍表示异议，说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个人表现。她说，“我父亲看过一份文件其中讲到，对退伍军人的组织问题，组织上要给予主动的提出并尽量解决。”对其科里的团负责人等其他人谴责了一番，说他们是“笑面虎”，我因不了解没有在这方面说出较夏更多的东西。到了医院以后开始未找到政委，我们就在口腔科门诊检查牙齿。中午辰光，在他家里找到了政委（我与政委对话见前），一个钟头后出来。去了一下会计室，毫无结果地回眉州路（我们科）了。晚饭后，曹鲁鲁主动提出陪我去买皮鞋。我们一起乘车子到了金陵东路，随后又一起去曹未婚夫家（工人），拿到皮鞋后，看了几分钟电视我们就回科里了。

27 日因收到顾南青的一封信，伊要求我在这一天去 60 路汽车终点站接伊，照办。此时为 10:15 左右，11:30 他就走了，我们没讲什么话，只是相互询问了一下情况，我将我的计划告诉给他，并约伊下午三点钟再来。下午一点多钟，孙宝柱突然来到，他不知道我也复员，想问问我有什么东西带回北京没有，我告诉他我的情况，招待了他一番，约 3 点钟，顾复至，我没有让他们见面而把顾领到另外一个房间里。他问我孙是什么人，我说了，并解释我不能陪他的原因，希望他快些走。顾无法，约好明天（28 日）给我打电话，买两张电影票我们一起去。同意。顾即走。返身继续与孙谈话，他对我复员表示欢欣，我同样，不过稍掺杂了一些恋恋不舍的情绪。三点过一点，孙站起身要走，我送客，在路上听他说买

不到好烟，我们又改道去百货商店买了几包香烟，送他上车，我并未托他带东西。

28 日

这一天我借口收拾东西推辞了小夏去医院的邀请。实质上我在等顾的电话。晚饭后，顾仍无电话打来，我托马爱英替我接电话，就同曹鲁鲁一起去浦东她姐夫家，目的是送晒干的年糕片，让伊家里给爆一下，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回来。马说电话打来她接了，对方让我回个电话，说有东西让我带回北京。听之任之。余翔六时多到达眉州路，告诉我他也复员了，他很激动，说自己父母叮嘱后勤部首长太晚了，来不及挽留他，他对自己未能解决入党问题很生气、很着急。他让我同他们连队的复员战士一起走。同意了。后来我与马爱英一起送他到 60 路汽车站。

29 日

同夏去医院算总账，没算成，中午在淮海路吃饭，下午去她家里一趟，她找书还病号。17 时半我们赶回眉州路，参加了晚上安排的欢送会及会餐。之后打了两次电话到四军汽车连找余翔，他不在，上楼看了一下病号，回宿舍睡了，那天喝醉了。第二天马爱英告诉我让我明天（30 日下午 13:30 在）外滩等余翔，陪他买东西。说是余打来的电话，因余自知自己复员后天天不在连里，这个碰面推不掉，我决定去。

30 号

因为没赶上医院派来的卡车，我和马爱英、曹鲁鲁一块乘公共汽车去医院，在外滩与曹分手。到医院后，我领完复员费，中午同马、蔡海清（护士，战士）同去静安寺吃了一顿午饭，买了一点日用品，合了张影。二人事毕回院本部了，我在 13:30 分赶到外滩，与余同去南京路。主要是买东西，言论中心题目是马爱英。

31 日

医院让院务处梁副主任通知我：速去政治处。我估计会餐中放肆言谈激怒了上头，发了，想，我已退伍，且时间来不及，我还要上街，故未去，七点多钟，我同马爱英向南京路进发，在那里吃了早饭，上午开始我们连续游园，路线：豫园、向阳公园、复兴公园、

淮海路、人民公园、南京路。很晚才回眉州路。晚上八点十五分，顾南青打了个电话来让我出去。他是在我们医院旁一个工厂传达室打的，我们谈到快十点，一直在医院旁边兜圈子。那次见面讲的话极少，较拘束，且大部分是个人问题，他让我明天去复旦大学找他，我拒绝了。送他上车后，我看了一下表，时间是 9:45。我就回医院了。

1 日

上午在医院里照相，中午在杨浦区通北路吃饭，同行者：马爱英、余翔，下午我单独在医院政治处谈话。17 时半许，我拿到了自己的车票及供给介绍信后又和马、余乘车离开医院，在徐家汇买了十斤糖果，坐车在淮海中路下车，买了一些食品，徒步走到巨鹿路（多少号记不住清，空军招待所旁）余父的老战友家里，主任具体职务是铁道兵部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他家里吃了晚饭。我们到时家中只有其爱人及儿子，随后其女儿回来。饭罢，王亦返，同时到者另有二军人。我与马均是第一次去那里，不认识。晚上回去后，我找到科主任，检讨了自己，并（按政治处）要求请伊在第二天科早会上，替我做检查。岳接受。

2 日

活动简而少。照相，同科里同志及伤病员作最后的个别，欢送拉练的同志，然后坐车去北站。余无特殊。

需要阐明的是：1．我在宣布复员后接触的人均是以前不大熟悉，即使是原来熟识的人（如顾南青）也因时间比较紧，互相谈的比较少。2．我的“落后话”（即可反映思想的言论）也并不是在二十六日后说的，曾在这以前或多说少流露过。况且那时谈话的中心是随着我的要走而改变了。因此个人认为，我写的所谓“活动情况”，价值不大。真正值得我和同志们注意的是 29 日的晚上，也许应加上同协理员、岳主任的对话。3．我是深知自己的处境的，很多话并不是无所不谈，注意“影响”。4．个人认为基本上如实反映了。



1970年5月，广州中山医学院72届“南空”部分同学合影，前排左二为。前排左起：孙晶、周向红、陈兰英、李莉、鲁莹；后排左起：李薇、江新风、王东军、江新德、王伏峰、陈梅。

周向红交待材料：复员后

1974年1月3日至3月27日

一．同其他人的接触

1. 兄，周向阳。比较起来我们谈的最多，可以说，凡是知道的都议论到了。曾有两次我们晚上在人民广场散步。因为觉得在家里不方便，太吵了，当然也为了避开我弟弟。第一次主要谈的是“九.一三”以前，我们都在上海时，他曾把这些情况写给我过。我们认为，这批倒的人是“少壮派”，都是很有能力的（例如周宇驰、程洪珍等）。我们还回忆了九.一三以来的情景，叹息家中的书没有了。认为周直到最后也没向他透露两谋及“571

工程”对我们的现在是有利的，不搞政治多学点技术。向阳说：这批人直到死还认为自己是对的，可见世界观错了。我们对过去的生活是怀念的，谈笑风生。我们介绍了自己在学习班的情况，我说，我所知道的全写出来了，所以不希望我批判过的人再上台。对今昔地位，对于“权”的问题，有很多的感触，曰：一落千丈。发愁今后怎么办，他不愿意一辈子都在农场，那里什么人都有，大杂烩。我问他有无冒险精神。答：想接受些刺激而去担点风险，但事到临头，不知怎么办，总之有“精神”无“行动”。我们还说老实点好，不要像广州似的（广州空军有问题的人的家属全住在大院外一栋楼里，其子女甚狂，称：“571”是伟大的历史文献，等），还说谨慎些好。我说：我也这么想，何必干那种事呢？不让别人知道还没什么，万一上面有所觉察，岂不彻底完蛋？！

第二次。谈了个人历史，对我弟弟的不懂事非常遗憾；对父母的矛盾进行了分析；对当前的形势我们只知道很复杂，具体情报也没有。中央还有斗争，白相国、于桑的事就说明问题。空军领导班子能力不强，听说马宁很会走后门，现在的干部都怕犯错误，不愿意负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魄力不够。我说，现在人们老注视着咱们，真叫人不舒服，等下一次路线斗争开始，又会有一批新人物产生出来，大家的目光该转一转吧？！“九.一三”是十次路线斗争的总爆发，这两年多来斗争更加深入复杂了。这次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比主席预言的短了几年，四届人大今年能否开得成？还讨论了很长时间的个人问题。

听了黄帅的回信，我们认为不真实，根本不像一个小学毕业生的水平，批的倒不错，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我们认为在政治上他及其父母是捞到了一点资本的。

批林批孔。他有一次告诉我，王鲁宁（王飞之长子）所在的农场里一次学习会，翻到主席一段语录，其中引用了孔丘的话，有人问主持会议者：孔丘不是反动的吗？为什么主席还引用他的话？无人敢答。我们相视一笑。还谈到他们的指导员，讲话水平不高老出笑话，意思是某些人不懂装懂，说农场领导不相信他，不叫他值班，有些不满。反对走后门。顾南青来信讲大势所趋，不得已也提了申请，我们觉得可惜，对江腾蛟四女儿宣布同江断

绝关系，我们不太相信，且认为这样做效果不见得能好到哪里去，走到哪还要提江的，断不断都那么回事。认为顾的申请争取了主动，不管能不能拿到毕业证书，知识反正到手了。听说张春桥的女儿也申请退，我说春桥还挺积极呢。汪东兴和乌兰夫的儿子已退，江青可能要拿二人做样板，批得够厉害。批林批孔的全国运动深入开展后，我们猜测为什么几个老丈人不出来，比如文元、春桥、康生，郭沫若也只出来了一次，接见日本某代表团，并不活跃，好像也没表态。杨荣国的批孔文章倒有好几篇，中央是否意见不统一？反对走后门时几个中央首长都未表态，8号文件一传达，这个问题也稍微明白了一点，主要矛盾不可放过，力量要集中。

为了报户口的事，我俩曾去过司令部总值班室、门诊部于主任家，给管理局值班室打过电话，没有确切的答案。我们非常生气。与其像于主任所说的“管不了”倒不如干脆说“不管”。嘲笑于主任含糊其辞的胆小作风，在当今似乎有些代表性，我们又不是周宇驰，何必怕？！对群众的意见不加分析地采纳，也不是共产党的正确作风，其实就是怕犯错误。贺助理讲得很明白，“现在批林批孔正在贴领导的大字报，你少回来！”差一点说出“否则就会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认为领导不负责任，不坚持正确的东西，干部不管我们的实际困难，互相把权力推来推去，只有一个意思：你走！好像我们是大包袱。

空军的批林批孔运动搞得并不是十分理想，老容易受其它方面的干扰。领导班子团结也并不十分好，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说话、敢于负责的人。林彪的“不同心也要协力”有它一定的道理，不可能人民之间没有矛盾存在，问题是如何顾全大局？不过林彪的这句话是为了维持他那个一小撮人的所谓团结，以达到阴谋夺权的目的罢了，现在领导人员复杂的很，有刘亚楼时代的，有吴法宪时代的，也有“九.一三”以后新提上来的，各持己见，配合不好，保守得很。空军这次倒的人都是较有能力的，人家能管得住部队，说话算数，有人听。现在经过几次斗争，军心不稳，谁知道谁将来如何？谁知道谁正确？只有一条坚信主席。在听了批判“林彪是一个不看报、不读书的大军阀、大党阀”后我曾对向阳说，这个“报”、“书”不具体，林彪也不见得什么都不看，否则，关于政变的研究、历史的研究

如何解释？不看点书，这些东西一般人根本写不出来，反正如果我不看古书，这么多古味浓厚的话是不晓得的，况且又没有天生就知道历史的人存在。大概这个“报”和“书”是指我国的官方报纸和主席的书吧？可能还暗指了让秘书代签中央文件的事？一次向阳说，你看“核心中的核心”与“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这两句话如何？我未回答，他又接着说：差不多。

他还告诉我，某地有个中央监狱设计的很高级、很巧妙，墙壁都是塑料的，根本撞不死人，但还是有人自杀了，你猜怎么样死的？我说不知道。他说，有个人精神错乱，跌了一跤，眼镜片破碎了，就拿地上的碎片割破了动脉，所以现在不许犯人戴眼镜。我也未追问他是如何得来的这个消息，反正知道了只要想死，总归有办法。

3月23日晚上，我们谈论到现在的处境，联系到近来不许进大院、不让报户口、搬家的风声，预感到要出什么事情。他说：我总也摆脱不了这种感觉，我被他说得有些心慌，问：怎么办？他说：怎么办，反正咱们只有等人家来搞咱们的权利，最好能把一些信件烧掉。告诉我，他们农场的某领导人看见他收信较多就说了一句“周向阳的活动还挺频繁呀！”他说 其实我有什么活动？我说：没关系，他不了解情况，到时候他要盘问你，你就把真实情况，这些信是我代我妹妹收的，告诉他们呗，也没什么了不起。他说 那当然。（这些信的确是带我收的，因为刚回家时恐十一号楼收信不便，收不到，就让人家把信暂寄到西山农场，2月下旬开始我试图让别人往十一号楼投递信件，成功。）

2. 余翔。很多信息是他讲给我听的，杨彩章和杨达夫肯定解放不了，梁璞隔离反省。画家画黑画一只螃蟹，旁边注：看你横行到几时，等多得很。总政大院贴满了李德生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时的两派现在又出来了；现在中央的斗争很激烈，开四届人大筹备会时总理和反对派作面对面的斗争。主席讲李德生有野心，江青讲话，总政被一个新军阀统治了，李是野心家；总政有人提出这样的口号：打倒李德生，解放肖华。已倒了两个人（名字他当时说了，我没记住）；听说罗瑞卿也快解放了，干部过剩，那时批林批孔破格提拔，现在多得很呢，一个女的（空军，我忘了是哪个单位）连提了二十级，本来是二十三级；

去五.七干校的回来了，林彪、吴法宪在空军提的人也不可能全部打倒，“9、九.一三”以后也提了一批人，这些人的一部分现在都没地方安插，干部全满了；外交部在修订干部退休条令现在要动员退休。有人告诉他李德生乘飞机外逃了，下落不明，34师专案组撤换了，不行，要从头开始搞。北京医学院这批工农兵学员毕业时不给走后门入学的人发毕业证书，这些人不参加结业典礼，集体抗议，说 不发就不走，后来又发了。后门杜绝不了，反得这么厉害仍然有，有大后门、小后门之分；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讯号。

余与马爱英原为朋友，余复员后两人关系断绝，余与我谈话、通信的内容大部分是个人问题，我曾与他、向阳同去了颐和园、八大处，因为知道伊之出身，我们兄妹未讲更多的有关形势、政治方面的话，且伊并不爱讨论这个题目，他不过想知道些新闻罢了。同伊在一道，总是伊说的时候多，我本来就寡言，向阳是谨慎，我们经常在晚八时通电话，他还陪我去人武部一次。余经常给我借些书看，《奥勃洛摩夫》、《罗曼采罗》、《春》、《秋》、《三国演义》、《暧昧》、《飞碟》、《冰河》、《播火记》、《毁灭》、《布拉格之春》等。

余常来大院办事，每次几乎都在我家里坐一会儿，我也去过他家里五次左右，也在他家里吃过三次饭，我去后帮他给马爱英写回信，分析他俩的关系，看书、看参考（他曾告诉过我，我们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使用了“明和式导弹”；后来3.26听诗报告时他问我：为什么用了非说没用诗报告中讲没有用呢？我笑着回答：可能张咏梅诗报告的作者不知道呗！他明白地笑了），拉拉手风琴，谈论一下生活、歌曲。他最后一次到我家是3月26日。3月13日我们在西单碰了一次头，他给我借了一些书，让我陪他去电报大楼打了个电话，他认识一个广播电台的司机，然后逛了一下西单商场，吃了一次午餐，看了一场电影《火红的年代》。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对服务员照顾熟人的小后门作风不满，他说：谁都有权，他们认识的人就可以多给点饭。我回答：以后会发展到不认识的人得交给这些服务员小费喽？看电影时我们都觉得电影不像六十年代的事情，不真实（如“洋奴哲学”、学主席著作、上海牌小汽车等）。

他还曾经两次带一个名叫刘刚的人去过我家。这人也是大院内的，我不认识，也没听过，刘来我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言谈，3.26我曾经与他提过孙海明、张燕（张彪之女）的事。

3. 孙宝柱。我兄在上海农场认识的，我只是去看向阳时见过他。12.27下午他曾经找过我，也是今年复员的，是江苏盐城雷达三十一团的战士，六八年入伍。大年三十前一天，我和兄去他家，买了许多水果。他表哥在，和向阳一直谈煤矿的事，孙在一旁听，我在旁边看书，未参加。后来我们三个人从他家出来在室外遛了一大圈，谈到复员军人的分配，孙说他要走后门，否则没好工作。他的意见要挑一个工资多、干活少、有劳保的单位工作干，并问我怎样想，我说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根本没有他想的那么美。我的家庭出身也决定着我的分配，不会好到哪里去，我是准备分一次就去的，有个工作就成，但去“东方红炼油厂”我可要考虑了。他说，要分你不好的地方你就别去！我就这样！我说，我跟你不一样，可能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这段话也曾经对余翔讲过，他的意见和孙差不多。余和孙认识）。

晚饭在他家里吃的，向阳饭前与孙之父闲扯“义利食品厂”的生产情况，饭后又和孙谈话，我均在看书，没参加。晚上八点多钟我们回家了，孙送至车站，约我初六再来玩。初六我又去了一次，已快中午，他拿画报给我看，并送给我一个挂历。午饭在他家吃的，下午我们去中山公园玩了一会儿，谈了一些家庭琐事，在走到中山纪念堂（？）时我们说起了现在的形势，具体讲了些啥我忘了，反正很简单，最后我给他解释了“否定的否定”一词的现实意义：历史前进了，在否定前一段历史的基础上，今天否定昨天，明天否定今天，当然不是全盘否定……我也没讲得很具体。因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欠研究，可能在胡说八道。不知是真懂了还说出于礼貌，孙点点头。从中山公园出来，我们徒步向王府井前进。路上他问我，有人骂你吗？我肯定。他问：你怎么回答？怎么看？我说，我没回答。这是无道理、无道德的偏激行为。他们的心情我理解，表面上原谅伊，但心里绝不会原谅伊，因为我不是反革命。三、四点钟，我们在东风市场的西餐部吃了饭，然后在王府

井大街口分手。

因为我觉得他出身不同，没什么“共同语言”，不愿意和他多谈。尽管他在某种程度是很同情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跟他说什么过头话，否则太“傻”了。

4. 孙海明。空沪一院原政委宫健之子，在北大西语系读书，今年一月十五日毕业，我和向阳可能是十三号左右去北大看他的。我们在2路无轨电车经过的商场下车（想买点水果），正巧碰上了孙。他本欲去西单，知道我们俩的意图后折回学校。我们买完水果又乘车去北大，孙在门口迎接。后来到他宿舍，那时为下午2点多钟，来之前一天我曾打过电话给他，他不在。

主要是向阳与海明的谈话，他们以前认识，我是第一次正式见面，七一年放暑假回广州路经虹桥机场，遥望过孙，未讲话。向阳谈了自己在上海办学习班时的情景，孙谈到两年来的学习，说“这里人根本不管我，那次我去找XX汇报自己的家庭情况，他听了一半就说有事走了。你不听我也不说，后来没有人再来找过我。”他还说“‘十·一’（71年）时去大院到你们家，门岗盘问了我半天，把我的地址、单位、名字都记下了，然后告诉我：他们家都去观礼了，不在。我就回来了”他还根据向阳的询问介绍了北大的教学情况，以及他们接待外宾的情况，我以听为主。晚饭在那儿食。七点钟我们走了，他送出门口。

5. 江新德。江腾蛟之二女。现在丰台区物资回收处医务室当医生。我是去看顾北青顺便看一看她的，她和我在大学同学。自七二年八月九日分手后一直未联系。到她那里是2月28日中午12点多钟，她房间里还有其六妹江新路。由于时间的关系，彼此之间显得很拘束了。开始只是谈了她的情况，我告诉她，听说陈梅（陈励耘之二女）又被关起来了，她面带温怒：“活该！活该！怪她自己不谨慎，又不是第一次了，还不注意。”我印象中她们之间有书信往来，关系不错，不明白她为什么幸灾乐祸。她叙说了自己分配的经过，讲单位领导对她还是可以的；后来又回顾了一下我们都认识的一些人们在毕业后的情况，对其四妹退学的一事我们议论了一下，以弄清楚她的处境。我们憧憬了一下，顾北青说要自己一个房间，里面要摆得下四个书架。我发愁嘈杂及家务事。四点钟我从她那里出来。

现在回忆起来，那天竟没讲什么“话”。

第二次是陪顾怡青去取东西，时间是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点前后，顾北青、周向阳也去了，地点是她那个单位的党支部办公室。总共呆了没二十分钟，我们四人坐着，她站着，扯了一会儿皮，就去拿东西了，然后又推脱了半天（谁也不肯拿大衣）就走了。她送我们到门口。

6. 崔燕华。原空司汽车队队长王琢的老婆。有一次我嫌她和我奶奶说话的声音太高，说“看样子这一两年还死不了。”她悄悄地说，“九.一三”以前“你妈妈也这样讲过我。”我把可能要回原籍的事告诉她后，她哭了，非常发愁，四个孩子都不大，家怎么搬。还曾指着一个人说“这人在空军学院管你妈妈的。”我说“不知道”。她说“快啦（指搬家）！已经在我的老家找房子了！”

回家后我一直是不愿意和她搭话的，觉得她嘴碎、贫、庸俗、讨厌，她一见没人就老要讲话，我很烦她。

7. 贺铁军、贺宁军。原情报部部长贺德全之子。他们可能是在大年三十晚上到我家来的，或者是过完年的某一天，反正是春节前后，当时鲁岩也在。这两个人我都不熟，特别是铁军，宁军和我似乎是小学同学，记不清了，面熟。当然，这次他们主要是来找向阳的。

他们谈了很长时间部队和农场的事，我在一旁织毛衣，没怎么注意听。后来他们谈到了“九.一三”事件，我当时听铁军讲：以中央文件为准。他还讲了“九.一三”前后他在家情况，贺德全临走时讲的话，仍然是同往常一样。（我好像记得）贺把飞机失事的事情告诉铁军了，铁军就回部队了。后来我提起美国电影《巴顿》中的一句话白：“你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的嘴巴。”接着话题转入此电影，鲁岩和向华都异口同声地说道：无可奉告。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铁军和宁军、向阳好像还提到，近一、二年飞机摔的不少，我插话：去年年底（73年）在高桥（上海浦东）那里26师又摔了一架，一等的。宁军说（他从26师复员的）好几次了，可能你说的是第二或第三次。我们所说的意思中

有飞机在正确路线指引下照样摔的含义。后来又讲到回家的问题，他们都有出入证，而向阳每次要报临时户口，我是长期一些的临时户口。他们告诉我们这出入证是部里叔叔给搞的，并不费事。我们埋怨司办及门诊部为什么不给办，连回家也受限制，他们告诉向阳家在什么地方，向阳表示有时间去玩。九点多钟就走了。

8. 鲁岩。鲁珉之子。我刚到家的那天晚上他就来了，简单聊了一些，后来他来了几次，每次都是有事，送相片（我在上海寄来托他冲印的）、送信（鲁莹给我写信最初靠伊收转），还借我几本书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旗谱》。我让他带去看艾（其姐，即鲁莹）时带去一封信，一盒糖。

因来的次数不少，具体日期也记不清了，谈话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班，他在学习班待了一年，较详细地给我描绘了一番学习班的生活，鲁珉的精神状况；他在哪里整天都干什么，也谈了一下艾所在学习班的情况，告诉我一些事情。

（2）对黄向阳与艾交朋友的一事的看法，对他们三人小集团的组成活动的看法，我与小弟（即鲁岩）基本一致。我们认为在那种环境下，根本就不适宜这种事。这些人都太不谨慎，不知天高地厚，学习班里主要任务是学习马列，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老实实学习就算了，现在落得这样的地步，只好自认倒霉，纯是自找。

（3）个人生活习惯、学习、爱好、性格脾气。

（4）他们学校的新闻及打架的前前后后。

有一两次他来也碰上向阳在家里。自三月份开始，他可能就不来了，艾的信改为直接往11号楼投递了。真可谓：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没去过他家。

9. 江新风。江腾蛟之三女，现在东城区瑞金路百货商店当售货员。我和向阳是在阴历二十九中午看她的（随后去了孙宝柱家里）。到商店时她去吃饭了不在，我们就沿着马路散步，刚好伊食后返回碰上了我们。我们陪着她往商店方向走，我问了一下，她的“身份”只有领导晓得，大家都对她很好、很照顾她。工作也蛮好，我说。这很好嘛，她说今天加班，否则有时间陪我们一下。我让她回家过年时代问全家好，她让我们过了春节再来

玩，后来就分手了，总共不到十分钟时间。

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了，因为估计谈不来。

10. 顾北青。原广空参谋长顾同舟之长子。我们在广州就认识，这次他复员住在丰台，我们的会面加起来一共六次，2月28日、3月16、23、24、25、27日。

第一次2.28我去找他的，这次谈了很长时间他复员的经过，还有他在学院（他是广东工学院毕业的）办了三个月班的前前后后，他对自己的未来是充满自信的，自称“心高于命”。他说，我要奋斗一生，可不去做碌碌无为的人，研究历史“要到达这样一种程度：一闭上眼睛就可以回想起任何一个关键的历史情节。总之，要在头脑里成立一部较客观的、较完整的历史史册。”他说我精神不振，表情淡漠，是“冷血动物”，并念了这样一句唐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还说，广空现在要以前请客送礼的人赔钱，我算了一下完全赔得起（后来我写信给他，“天生我材必有用”——消极；“千金散尽还复来”——狂妄）。他还讲了一些我们当初在广州军区办学习班时那些人的下落，有人（他未讲。在后来的谈话中提到了一些，我竟忘了，因为不认识的人名字老记不住）提出：谁人执政三十年。我（顾指自己）听了以后吓了一跳，我只想多学点知识，绝无这个野心！这些人真不得了！后来他讲了一些来京半个月后分配的情况，估计不会理想的，说不行的话“安办”知道我还有要求对广州的权利。我也简单讲了一下海淀区的分配原则和我去开会的情景。中午12点多钟我们往江新德所在的单位走去，路比较长，我们主要谈了爱好和兴趣。他说应该对事物保持广泛的兴趣，自己的本行只要不忘就行了。在江那里待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就出来了，回招待所拿了一下围巾，径直往汽车站走去，在等车的几分钟时间里，他让我借书给他看。我让他下星期去大院，就说是西山农场的人来拿东西的（后来他果然来了，但没进来）。分手。

第二次是三月十六日。本来我和向阳约好一块找他，向阳迟到了，顾等不及就和我一块乘汽车来到动物园。路上他告诉我一个黑画，树林里隐见三只老虎，意为“三虎一彪”。在动物园内转了好几圈，他曾问我：你说有天才吗？我说有。他说我也这么认为。马、恩、

列、斯、毛主席的书里都提到过天才，这些伟人们就是天才。我说，其实就是天才条件，不晓得鲁迅对天才问题是如何讲的，我只记得关于“第一声啼哭也决不会是一首好诗”的话。顾说，鲁迅也没讲“没有天才”，我注意了一下马、恩、列、斯谁也没有写道：没有天才，都讲有天才嘛。我说，现在批判天才论，主要是批林彪所说的爹妈给的天生之才。没有经过实践就知道一切的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说这当然对。他还讲，人们老觉得咱们划不清界限，儿女情长嘛。王秉章的女儿在“九.一三”后写了一份血书给王，宣布断绝关系，王一看就晕过去了。现在还不知道又要写什么了呢！叫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父母了，哪那么容易就断了？！人们太急了，慢慢来嘛。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说，支左不支派这根本办不到，“一碗水端平”不过那么说说，实际上还是倾向于某一派的。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立了多大的功勋，不承认可不行！没有解放军介入主席的指示就无法贯彻落实。我说，看了报纸上的文章后，好像脑子里苏联天气总是黑夜或者阴天。原来对美国也是这样想象，乒乓球队访问的电影一出来，才彻底改变了。各国都有各国的长处，中国也不见得有多好（指经济而言）。他说你这全是宣传的结果，不见得苏联经济有多差，报纸、电台终归只讲缺点，反正大家相互攻击，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真正找到答案，只有让历史作证。我们一致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比欧洲落后了几十年，强调自力更生固然重要，但不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样不进口，结果最后还是要吸取别人的经验。对于这个差距采取不承认主义是不行的，应该努力赶上。总认为世界上中国最好这种想法是不合乎客观的，中国还很落后。中国的老百姓很容易管理，顺民多，驯服的很，说一不二，很容易满足，与外国人不同。

我们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还遥遥无期，我说自己担心主席百年以后，中国重演克里姆林宫的悲剧，如果这样那共产主义的实现起码要推迟几十年以至于一百年。我问他：共产主义就是和平幸福、人人平等……那该多好！顾反问，你说共产主义社会好？否定共产主义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你敢说共产主义实现后历史就不发展了吗？所以共产主义也不是人类发展史这最完善的历史阶段。我答不上来，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大概人类历

史也走向灭亡了，物极必反嘛，无需发展所以地球要还原。顾说，历史的发展可能可以证明社会主义不一定就是达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好比登山各有各的角度，各自选有自己的出发点，反正历史总是要发展的顶峰总要达到，这个顶峰就算是共产主义吧。人各有志不能强勉，人家非要这么走，你也不能强加于人。我们认为要想让别人对你的经验感兴趣、甚至采纳，就要有事实。社会主义制度解放生产力还大有潜力可挖，都说要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后来我们又去了天文馆看天文表演，17:30 出来买了一点糖果，就到紫竹院坐了半个钟头。在那里顾谈到顾同舟以前让他读历史书，先读《太平洋战争史》，再读《欧洲战史》，后者复杂，等。

快要离开动物园时，他谈到了学习班的收获，我们认为能过一段学习班生活会给人思想上带来很多益处，一定的知识，学会弄懂了我们原来不会、不懂的东西，不愧为“学习班”。在学习班里。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定的锻炼和磨练，是对我们世界观的一次检查。我们应该感谢学习班，因为在那里我们失去只是过去，得到的却是将来。

人不可一世太顺利，这样没好处，社会经验也不丰富，只接受一方面的知识的人是单纯的，争取每个方面都去探索一下，即便是走到何方也无所畏惧。当然，免不了坎坷一番，会有精神与肉体的痛苦出现，不可无曲折，曲折不尽也不妙。这主要是谈到顾南青一直未进过学习班时所引起的。

当谈到历史会给每一事物下结论时，顾引用了卡斯特罗的话（？）：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谈到出国，我就说 自己很想出去看看、取经。顾说我现在不出国，我要干一番成绩后，以光荣的身份出去，现在算啥？人家瞧不起你的。

3月22日顾怡青到京，住在江新德那里（一夜），23日上午她按照江新德的主意来门诊部找牟春英，借口要书找到了我。我听了她叙述的来京原因（顾北青的弟弟、顾怡青的哥哥顾南青在复旦大学读书，别人给他200多元钱托他买表，表买好后，顾南青并未立即

给别人，正在这时那两个人怕毕业（四月下旬毕业后表的事不了了之，就向党支部汇报了。南青说什么也不给表，只说钱在烧信时不慎烧毁，系里开会帮助他，他只把两块表放起来，什么也不说。恰好怡青复员去上海玩，南青让她向北青要钱，否则就死）。就同她一前一后出了大院，在中关村的一个亲戚家里找到了北青，半个钟头后我们坐车到了颐和园。在城隍庙停住了脚步商讨南青的事该怎么办。大家都埋怨他糊涂，不该为两块表败坏自己的政治名誉，最后决定钱先由我垫上。那天顾怡青还告诉我，广州的十级以上干部子弟组成了持有梅花图案章的团体，怡青曾持过此章，这次离穗前交了，好像是中山医学院的丁克铃收了（丁盛的女儿？我不认识，也许听错了）。XXX 及其他人（我都不认识，是些小孩）守在竹丝岗把广空政委龙道权的上臂用枪打伤了，当时没抓住人，后来抓将起来关在大牢里，其中的主谋是广东省高等法院头头的独生儿子，其母自其被关起来以后整日啼哭，其父无法，宣告无罪，全部放出。又有小孩偷了弹药仓库，还偷了准备开晚会的几十公斤鞭炮，会也没开成。广空特乱，中央发布了8号文件以后，广州仍在反走后门，派性特强，到处都可见标语、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术语，如火烧、油煎、炮轰等再次出现。湖南现在提出“打倒林、卜（即卜占亚）反革命路线”，街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许世友到广州后一次视察南海舰队，一艘鱼雷快艇向许所在的主舰开炮，未命中，派人查寻，艇上所有人员均穿潜水服逃走，下落不明，也没抓住。

顾怡青谈这些时北青叮咛伊“这不是广州，是主席居住的首都——北京，你要注意点！”听顾怡青偶尔透露的风声，似乎这次外出是“避难”来了，避什么“难”我也不问的，可能与梅花章有关？我是早就抱定主意不参与这种团体活动的，更明确一点，是不搞反社会主义祖国的活动。我想，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别人要干什么我管不了，实际上这可能是“无声的援助”。

五点半我们分手了，他们在中关村下车，我回家了。

二十四日上午，顾北青、顾怡青、向阳和我，九点钟过几分在天文馆汇合了，北青、怡青与向阳是第一次见面，随后乘车到达丰台，没去北青住的地方，四人直奔江新德那取

怡青的东西。在公共汽车上北青和向阳一直谈话，我隐约听见几句好像关于什么机械飞机之类的事情，未注意。下了汽车至江新德那的一段时间里，北青和怡青重复了一些昨天对我谈到的新闻，还讲道：许世友到广州后的第二天就让秘书到一个（可能是已故的）民航副局长家里请他们的家属到许家吃饭，拉拢人心。不仅仅是大人物之间，他不讲点好听的，不请客送礼就站不下脚。那次视察南海舰队吓得他够呛，恐怕只是警告一下。丁盛立场九.一三以后转得很快，中央讲中央是信任你的，让他放下心来，搞好批林批孔整风运动，丁老头子听了心里挺美，不料几个月后一听说中央来电话了，预感到不妙，没想到是八大军区对调，一下子就瘫倒沙发上了。广州军区是四野的老底子，这么多年了，这一下连秘书都不准带，老头子怎么能舒服？且广州是我国南大门，外贸中心，搞什么不行？南京算什么！从边疆调往内地，等于贬职，老头子气得要命，底下的人当然不愿意让丁走喽，可是要服从命令啊！许世友得意洋洋到了广州，让海军的几炮轰得不轻，八大司令对换是为了打破各个军区的小独立王国，因为底下有一部分原来有意见的不敢提，这次一调，不同意见提出来了，斗争的盖子也揭开了。现在每次路线斗争的周期越来越短了。

从江新德那儿出来，我们在顾北青住的招待所里一直待到下午2点20分左右，开始没有钥匙，在室外呆了半天，想办法从后窗跳了进去。大家坐在房间里纷纷发表对顾南青买表危机之意见。我们三人都劝北青去上海一趟处理这件事，因为我们怀疑南青已经失去理智会干出什么意外的事情，北青自己不同意去。南青给江新德信尾说如果解救不及时，三月三十一日见他的遗书；给我的信中也提到了自己“去见马克思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还说“要离开这里”。最后商定了先把钱寄去，各自写信劝他，后来谈到了“政治”一词，我们念出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政治上不讲良心，讲头脑。北青说白相国可能是林彪留下来的死党，一句挖出来了。南青讲要“争这口气”，我们都认为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口气不值得争。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一起去邮局给顾南青电汇去了250元钱，然后步行到东风市场，在西餐部吃了饭。进餐中主要谈了西餐餐具的使用方法、家庭琐事，似乎不记得有什么特殊

的东西了。后来我们又走到中山公园，路上谈到了看书，向阳讲了一段雨果的作品（《九三年》）中一段有关人性的描写。后来我们和他们分手了，约定明天（25日）再出去玩，集合地点：天文馆。

三月二十五日。我们先去动物园了。我和怡青，向阳和北青，虽然走在一起但谈话并不一定在一起。我记得怡青告诉我，有人说林彪的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北青问，咱们（除向阳）在广州大军区办班时，于（厚德）主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讲的是下滑多少米后坠毁？几十米？我说好像讲是一百多米，一侧机翼擦着沙包坠毁的。北青说，依我看根本不可能，三叉戟下滑这么远，它本身就自动……（我忘了，且不懂）装置，完全可以控制下滑。而且什么油没加满，三叉戟加满油可以从北京——莫斯科（或者乌兰巴托）飞一个来回，就算未滿吧，不会在温都尔汗就用光了。怡青讲，有人说林彪下飞机后逃走了，躲在蒙古或者是苏联的某个森林里，她还怀疑飞机的残骸是否真如此。我说，坠毁一架民航三叉戟这肯定是无疑的。我们笑着重复了一遍山海关机场工作人员揭发的林彪逃跑时上飞机的狼狈情景。我说，那个汽车和什么玻璃碎片，也可以讲是飞机撞汽车，也许是催得太紧汽车撞飞机。怡青说中央四号文件（就是上面有许多照片和影印件的那份，七二年七、八月发下来的）去年才给她们看，她问我什么时间看的，我说72年7-8月。中央文件我们总是先看的，因为处在一个特殊的形式学习班内。后来谈到了李伟信的供词，我们都很恨他，恨他贪生怕死，认为要么一条路走到底，要么干脆不介入，半路出家且原因是怕死，并不是幡然梦醒的结果是两边都瞧不起他，恨他，两边不是人。怡青说“不成功，则成仁”。对他们是合适的，李伟信屁也不是。北青还说，本来很多事上面是不知道的，李不死，交代了很多事情，帮助他们弄清了很多问题。我说，直到现在，外逃飞机上有多少人中央也没弄清楚。北青说：根本弄不清！当时那么紧急，后来飞机又摔了。我们觉得程洪珍是很精明的，竟躲在树丛后面未上飞机，虽免一死，但现在的处境还没死舒服。

后来谈到历史，认为历史是最不好写的了，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变幻，一会儿讲这个人好，一会儿又否定；秦始皇是个暴君这点肯定，但他有着进步的主要一面，孟姜女的故事

也没人敢讲了。现在只能写某一段历史，谁也不敢写整个历史时期，写历史也是跟着政局，为当前的形势所需要、所服务。我说。活人在变，死人也在变，现在如此、将来如此，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还讲到李先念历来两边不得罪，滑的很。说到走后门，大家说，哪个人没走后门？主席的女儿不走后门也不会当上解放军报的编辑，北青说，原来是上层人物走后门，后来这种权力逐渐“下放”以至于引起群众反对，以后这种权力还得上收。

北青和怡青谈到了某些政治笑话，七一年传达中央五十七号文件时，广东某一农村要求每家必须派一个人去听。一家两口，老头病卧，老婆子去了，回来后老头问老太婆怎么回事，女的说：林彪和毛主席打起来了，林披了一件姓马的大衣不还，还偷了三只母鸡跑了。怡青认识的一个人叫赵军下乡帮助（广东）农民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有人听了中央文件后对赵说：哇！（广东的口头语）中央又出现了一个（孔丘）？！又问：是孔老二大还是林彪大？赵无法回答，那人自答：一定是孔老二大！林彪才是他的徒弟，他隐藏得这么深，现在才揪出来。

我们曾说过，现在什么都有林彪的份，什么东西搞坏了都划入“错误路线干扰”。意思是要对如何事物一分为二，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向阳对北青讲起了王鲁宁农场的那件事，俩人说，主席还在不少文章里引用过孔子的话呢。主席在“论教育”中就讲过，孔子当过吹喇叭的，干过……是个教育家。现在又不是了，谁也不去翻一翻主席的这篇文章。北青说，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孔子教育的不可能全是下层人，必然会有不少有钱者去学习，如果他不（在大部分程度上）依赖贵族，他的学说就不得确立。孔子的话也不是全部都毫无道理，仍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成份，他能在那个时候就发现这些论理还是了不起的。但他那个反动的方面就决定了他在当今的被批判之地位。后来又谈到了唐诗、元曲、明清小说、传奇，屈原的《离骚》。

然后我们离开了动物园乘车去颐和园，车上北青和向阳谈不完的天气，但一会儿也闭嘴了（在人多的地方“莫谈国事”这点谁都清楚）。在颐和园内吃了午饭，然后租船划入

了昆明湖。

在船上，我们听北青讲述了原301医院院长被拘留的前后，其子看完57号文件就率秘书、警卫、炊事人员营救，和其子本人回部队后的一些片段。

北青和向阳还讲了林彪警卫员的情况。据他们讲，那天从北戴河楼里逃出，后面8341的摩托车跟了上来，警卫员和秘书想跳下去阻拦，林立果以为他想叛变，就趁他跳车一瞬间朝他开了一枪，没打死。在医院里他醒来后人家让他交代，他问，我要是说了还能不能继续担任这项职务？北青说的人们是如何回答他的我没听清，反正后来他躺在床上就开枪自杀了。因为等他讲出来跳车的原因后，中央57号文件已经发下去，无法更改，所以57号文件上的这一点依然是错误的。

林豆豆为什么后来也自杀？她也干了不少事，检举以后就很后悔，一死了之。

林豆豆到底死没死、为什么死，我是不知道的，各说不一，不过那天我还是听信了北青的话。

上岸后，我们从长廊的东头一直走到西头，一边走一边仰头观看上面的图案，并争取说出每一幅画的历史故事。5点左右我就回来了。

记得这一天在动物园时，我和怡青还说过主席曾有这样的语录：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经林彪同志……，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候主席要这么讲，还有关于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当时都肯定林彪讲的对，为了反对多中心论即无中心论，为什么现在又要批判，仅用是个“暴露过程”恐怕行不通。

3月24日，我把自己的大衣带去给怡青穿了。

3月27日，我又将棉衣给怡青送去。

北青告诉向阳有关广州梅花集团的大概，向阳说这样太危险，，如果只是一个人思想落后问题还不大，如有纲领的集团，就是抓起来扣上帽子你也没办法，说你是反动集团嘛。北青说，我也这么说，他们纯粹是胡来，小孩不太懂事。我告诉北青最近恐怕要出什

么事情，最好（如果去上海的话）劝南青把一些信件烧掉，小心预防为妙。北青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是“庸人自扰”，烧信倒是可以的。

3月26日上午，我在家里烧了许多信封和一些不太重要的信。

3月27日的上午9:20，怡青来电话，让我10:30在天文馆等她和北青，我去了。原来怡青要去香山玩，等我们到了香山，已是中午时分了。那天我把26日余翔到我家讲的情况重复了一遍，后来仨人说起了广空的一些事情。谈到原广空政治部主任查全伦，也谈到了他们的母亲和我以前去顾家的情况，北青说六九年周宇驰从他们家里搬走了一车书，很多绝版，我说，不知道，你们家搬家的事我都没听说。

北青说，龙道权对我们家的书一直是垂涎三尺，曾几次竟借了不还。现在他可如愿以偿了。我们谈到了在广州学习班时出的洋相，大家都很开心地进入香山公园，随后转入了登山运动。我在上山和下山时一直充当“开路先锋”，北青和怡青在后面走，谁都很少讲话。下山时在多景亭休息了一会儿，我们谈起白云山，我想不起来怡青讲了一句什么话，北青让伊注意点，我还说了一下周宇驰的嗓子唱歌好。后来我们就扯到什么血型、人类、广东话（仨人都会），不值一提。

在回家前我们曾坐在公园里通往玉华山庄的路口及静翠湖边聊天。怡青先谈其自己在医院办学习班时人们对她讲的话，因九.一三前她曾和其母来北京给林立果送来了主席71年巡视南方时的讲话，医院讲她“有罪”，她不服。北青说有个姓孙的人复员前到学院去找他，告诉他很多事（什么事他没讲），临走前说了一句：十年后广州见。可能这人是叶群妹妹的儿子，其父无事（指未倒）。邱会作的儿子口才极好，只拿一本《共产党宣言》滔滔不绝讲了两天，别人找不出一点不正确的地方来。怡青曾悄悄告诉我，•她们医院有个姓随的护士是司办打字员随XX的妹妹，和曹里怀发生关系了，曾专门来北京打胎，影响很坏。•

北青他们讲起了去年在医院探望母亲的经过，我不免也说出我妈妈的处境大概不咋地，我们只知道伊在空军学院，再稍微详细一点的情况就勿晓得了。

在我们一整天的谈话中，凡涉及到自己家庭的过去总少不了几分怀恋的情绪和口气，“过去”对我们来说印象太深刻了，在“彼此、彼此”的人物之中谈论一下过去恐怕也是常见的，一直保持带着新眼光去看待过去的人，少见。其实我们怎么样讲都可以，也就是说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认识我们都是具备的。头脑里并不是只有一种思想，但似乎以老眼光、老口气谈话更自然一点，大概也就是所谓“共同语言”吧？！因为我们的老印象中他们是“父母”，而言谈里很少提到“反革命”，所以立场就容易不稳。

二．通讯地址及内容简略

.....

13．黄向阳，又名项阳，北京市 216 信箱。

我开始和他通信是在今年 2 月份前后。一天鲁岩拿着他的信给我，我们就这样开始联系了。春节我问候了鲁莹，因为她还能和黄讲话，因为他们是朋友，我也就捎带着问了黄好。黄知道后就起了与我通信的念头。开始我们是每人一接到对方信后一个礼拜再回信，一个月我们只能写 2-3 封信，后来他让鲁莹告诉了我一件事，黄想让我和其三弟认识（其实早在去年，十月或十一月份黄的弟弟们就都从——纸上，黄介绍的——认识我了），写的信就多了。有一次我写了一封 11 面、9 张纸的信，为了回这信，黄每个星期写两封，他还把三弟的信寄给我了两封，我寄还一封，还有一封没来得及，就进学习班了。

我同他是什么都讲的，他亦如此，说有一种“在你面前解剖我自己”的感觉。我们可以说已经互认了兄妹，我叫他“冬哥”，即“D 哥”，他称我为“红妹”。

14．鲁莹，即艾、A，地址同上。

自我毕业回“455”医院后她就写信给我了，那还是七二年底的事，我们的通信关系是被这次我突然进学习班打断的。写信很多，“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基本上这次回京后我们的信是接到对方的信就回。

三．具体通信内容

1. 对父母问题之认识

我曾经和顾南青、我哥哥说过，“九.一三”后，大家对林家父子似乎已经不感冒了，而唯对自己的父母的崇拜和爱戴却加深了，他们同意。

对周宇驰，“九.一三”以前我是欠“研究”的，后来，我力求“客观”。

对父母的看法是否正确也意味着我们的立场的正确与否，记得我是这样写给项阳的：

对于自己的父亲，我是很敬佩的。曾试图把他所具备的东西，如……提炼出来，上行升到超阶级的地位，并尽量学习它，使自己也具备这些东西。

对周，我也痛恨过，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批判过他，那时我所达到的程度是不亚于他人的，但时间一长，似乎也淡漠了。说真的，我现在想他想的少了，那么多活人还想不过来呢。如果没人问我还没什么，一旦有人问“周宇驰是什么人？”我将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叛徒、卖国贼……；但是我心里却始终保持着过去他留给我的印象。我也企图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把周想象得多么凶狠，非常残暴，但也不过是一时，因为这些都只是我的想象而已，实际上他并没有在我面前那样过……“假设”过去了，“真实”的就重现，我怎么也不能像群众那样长久地、深深地恨他。

我曾和别人说过（是谁记不清了），我只要求自己首先不常常怀念他，把他的形象淡薄下去，剩下的问题以后慢慢解决，如果我不能永远仇恨他的话。其实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实际上我现在已经是这样对待他的了。

看了黄的回信，我单方面认为差不多，但仍有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毕竟一个是原党政军的高级干部，一个不过是普通的中级干部，他好像在回信里这样写的：

我也恨过他，是他把我们搞成这个样子。（可能太自私了吧？）愤怒一过去，剩下的是更深的爱戴。我印象最深的是，战火硝烟、长征路上骑马、文件、繁多的回忆、肝痛的折磨、慈祥的微笑……。

如果有机会，我曾想过去探监。

一次，我告诉艾有关她妈妈的议论，她回信说多少天以来，我满耳都落满了这样的话，

你父亲、你母亲……够了！我不要听了！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如今我什么都无所谓了。

“无所谓”，这也代表了思想，人已经死了，不像其他子女还有个牵挂，不时地猜测着自己的父母今后的出路，定什么性，如何处理，身体情况，而这一切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

顾南青对自己的父母是极崇拜、尊敬的，以至于不许别人稍加评论。从顾北青的回忆和怡青的言谈中这也是共有的。我想不仅仅是我们这种人，可能人人如此吧？因为父母在儿女们面前生活的表演多于政治的表演，盲目崇拜是难免的，大概又是中了孔孟之道的流毒。

2. 论学习班

我对以前三次学习班评价是不低的，甚至还常常怀念、感激它，因为我感到还是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的，但它只保证了我两年整的时间。如果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必须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修正一番的话，未免有点可怕，当然，这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如何。

我觉得像我们这些人，尚年轻，正该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等在学习班里把思想改造好再出来不现实，应该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阶级社会嘛，我们又不是活在真空中，不会面对两种思想的斗争而丝毫不反映入脑的，纯与不纯是相对的。如果老在学习班，就像黄与艾似的，真正可悲了，“养老的地方”我曾这样称呼过它，我也咒过它，因为他曾经使我的朋友陷入了危机，因为他的“无止境”。

黄向阳他们在学习班里的什么三人小集团，我是不同意的。学习班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开始“规规矩矩”我认为还是应该做到的，只要不是原则上的错误，不必加以破坏，对学习班的感受我告诉给黄向阳过：

在学习班里，只要人家稍有一点不注意，我就认为他们没执行政策，对“他们”总是有点不服气，好像非得主席亲自来做工作、发表演说，“党”来给我们办学习班才会服气，似乎党的政策比我们现在所感受的要好，到了出学习班的前一天开始，这些想法也就没了。

尽管可以通信，但毕竟还是在学习班里，鲁莹很盼望自由，对她周围的人讨厌的，

起码这些人限制了她和黄的接触，黄和艾都讲过这种生活“度日如度年”，我也体会到了。现在，我劝过他们，不要性急，慢慢熬吧。这里也有一个不言而喻的暗示：不要过分地暴露自己，只要能出来，什么都好说。

我哥哥曾对我描述过他待过的学习班，打人是常事，高兴怎样对待就怎样，只要你有的一点异议表示。他说，一次一个人故意找他的茬，我哥哥说“如果我理他的话，这顿打是免不了的，我装作没看见，他也就不好说什么了，更不能上来动手。”“我一次打也没挨过，可能是由于我的老实”。听了他的讲述我简直对这种学习班感到恐怖惧极了，由此也产生了并不是所有的没倒台的人都讲政策；并不是每个学习班都令人放心的请你相信党的政策，放心。而且我哥哥所在的那个学习班又不是普通级别办的。

我和接触过的家里有问题的子女一致这么认为：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非常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也是好的，问题在于具体落实执行的人们。我说“现在的人们常常偏航”，也是对某些人们的不满。历史证明。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们表示，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必然的，但正如黄所讲：很多问题我想不通，不敢细细往下想，怕钻牛角尖，怕想成反动，并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点矛盾我们都不会有的。如，论一分为二，对孔丘和林彪全盘否定，无处不受批判，过去的“成绩”不谈（当然也不可能谈的）。还有，“你们与死党是不同的，是有区别的”，“重在个人表现”，为什么我们纷纷复员？部队没法改造我们了？在广州时，有个首长曾在讲话中肯定过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的成果，大概伊讲错了？等等。从我心里讲是不想搞什么“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为XXX翻案”，这毫无意义。等于宣告自己的灭亡或即将灭亡。我只是想搞明白。

对于在学习班受到有关政策方面的教育，黄是怀疑的，曾在信里骂过“放他X的狗屁！”

“怀疑党的政策”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七一年底，关于落实政策的“愿”许诺得是很多很好的。李先念讲：“你们同大家一样，谁说你们低人一等？谁要是这样说，你们来找我老李，我第一个不答应！”首长这样讲对我们的安慰、鼓励、教育很大。我们是决心努

力工作，接革命的班的。我们一直追求一个不高的目标，和平常人一样地生活，但我们一接触别人就感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异样的眼光、异样的口吻、异样的方法，使我们不得不常常这样意识到：我们的父母有问题！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黄向阳在信中讲到，今后只满足于一个良民，不想在政治舞台是扮演什么角色，争几句台词，而甘愿像个打杂的一样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还问道，在对待革命的问题上我们不会有分歧吧？也不会瞪着发红的眼睛仇视现实吧？我的回答的是肯定的。我说自己良民恐怕也当不好，公民就可以了。黄还讲，这辈子在政治上不失足、不丧生，足矣。我呢，对于所谓“不是流芳百世，就是遗臭万年”这种“雄心大志”是不太感兴趣的。“甘愿做人民的老黄牛，希望人们也用对牛一样的待遇给我们。可是现在往往是牛高人”。这是我对于不能争得和旁人一样的权利的叹息，事实证明我们是不可能完全同别人一样的，我们脑子里的流毒比其他人多，这种毒素经常出来作怪，左右我们的感情、立场、观点。

对于环境地位，我们是不满，又有点无可奈何，鲁莹抄了一段海涅的诗给我，意思是过去还可以，而现在却不行了。我们的不满是因为觉得我们是无辜的，年龄不大却老要被这个问题纠缠不休。

顾南青在给我的信里曾经这样叹道：谁不知，手中亏权！他指的这个“权”不是政治权利，是痛恨他不能按照心愿到某个地方去，譬如到北京。这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观点，不过也有些对自己地位不满的意思。

我们不想恢复过去的生活，也认为根本不可能恢复。于是对将来的生活产生出各种设想，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开辟一条幸福的道路。关于这点我、黄、鲁是说了不少“好话”的。我们是不想叫别人看我们的笑话的，对于摆在面前的较大困难，我们称它作“危机”，例如，关于搬回原籍的问题一出现，我就本着尼克松精神“奋斗”。我是不想去的，搬到那样一个地方我认为是可怕的，如果非去不可也准备“艰苦奋斗”。

“我们现在是走着一条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也不同于无产阶级的路”。这反映出我们思想上的激烈斗争，矛盾重重。怎么办？迅速选择一条路，不是彻底革命就是反革命，中

间道路是不存在的，而选择的日期也就是在今天。

我们在信里常提到“命运之神”，也借此发泄一下胸中的不平。黄写道：父母的罪过，我们已替他们忏悔了，万物之主太不公平，命运之神也是“势利眼”……我一直痛恨（过去、现在、将来都如此）那些曲解主席指示的人，……这也是一种“偏航”。而在这种偏航中我们就要触暗礁了！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关于这句话我曾给黄这样写过。有些话因从一个坏人嘴里说出来，即使是对的，也说成不对。治人的人永远是劳心的，中国是个农业国，如果不是农业国，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也仍然是劳力者，劳心与劳力也不是绝然分开的，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人民群众加入国家管理机构，比较而言，仍然是劳心者决定政策。后来，我们在信中就使用过“治人们”这个代名词。

黄和艾，对学习班处理他们俩的事是不太服气的，尽管做了检讨，他们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道德败坏。艾写道：这种感情的意义，那些人是根本不理解的，一夫一妻的公式也是解释不通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黄的父亲给他改名一事，黄是这样解释的，“那时父母还没有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烂透了”，所以这朵“向阳花”就问世了，鲁珉以前因为工作关系“接见”过他，至今仍感到光荣。

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以来，黄及艾所在的学习班当然不例外，艾在几乎两个月前写过一封信，很多关于批林批孔的话，我只草草一阅，早就没印象了。不过好像她并没有表示什么不正确的态度。我问学习班现在搞些什么活动，黄略含讽刺口吻地介绍了一下，而这种口吻在我们的信中则是常见的。

为了谈更多的问题，我自三月中旬开始先后写了几篇日记寄给黄，有两篇（《论看书》、《论死》）没寄出，我就来学习班了。日记的特点是琐碎冗长，有论服务态度，论美，还有一些儿时记事。这些东西写过也就忘了，个别几句话有一点印象，已经不是我的东西了。

我曾写过，所谓“向红”的红色，达到鲜红的程度有点不可能，太淡了也不好，只要

一般化、不醒目就行了。要赶政治上的“时髦”，这话并非反意，而是半开玩笑的。这表明了我对自己今后政治上的要求。我们要求自己永远不被历史发展所摒弃。

黄向阳在信里告诉我：

解放以来的四次路线斗争，早就出了一批不小的势力，虽然大部分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于我们这些人，上面是很注意的，多少有点怕。最近中央看了一部意大利拍的苏联电影，内容是十月革命以来到勃氏统治期间被打倒的人的子女生活思想情况……为什么看？显而易见的。现在有些人高喊“三十年后军委扩大会上见”，“三十年后我掌权”，可谓野心大矣！我虽然是这个势力中的一分子，但我绝不想（加）进。“我很担心这些子弟组成一个什么团体，若反现在（我很理解这个重点号）这个潮流，我是袖手旁观的。”我亦如此。（却被人们拟为“此地无银三百两”，呜呼！我说不出话来！）这是我的真心话。……

“”里的话是黄引用我信里的话。

我也写过：我何尝不想上进？却常常被一瓢凉水浇下。

黄说，现在“四大家族”的子女都没有动，我和弟弟们都会复员，现在还办不到，我们好像被吊在半空中，这个滋味不好受，……你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月25日在动物园顾北青说过，林彪实际上很节省，把钱都换成美元了，吃的也不奢侈，吃素、小窝头等，怕新陈代谢快后寿命不长。他的家里也不豪华，立衡、立果回家吃饭叶群还跟他们讨伙食费，叶群还化了装去卖废报纸，很吝啬。其实其他政治局委员家里哪一个也比林家的摆设好。

部队揪“5.16”，查来查去追到上面去了，于是就不敢查了，这个人可能就是林彪。后来“5.16”分子也逐个都放了，此事不了了之。

我哥哥讲过，电影演员赵丹和白杨在学习班就等于养老、软禁，反正你要自杀也没人阻挡，这辈子也别想出来了。白杨还曾写了一份较厚的材料交给哨兵，上面知道后命令退回，根本不要。赵丹出不来，就是因为江青的缘故。

我曾经在给黄向阳的信中写过：

人们老是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划不清界限”，《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

“……”

（大意是，人们的社会存在、社会地位、经济情况可以改变人们的社会意识，大概同路德的话差不多：我既然站在这个地方就不能不这样做。原文一点也记不下来了。）

那些马列主义者难道忘记了吗？不是你们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位上的吗？我们现在的一切不都是你们造成的吗？能回答你们问题的正是你们自己！

我的意思是埋怨别人既不把我们这些人和别人一样看待，又提出高于别人的要求予我们。

3.16 我对北青说，某些话被批判，真正的问题在于这句话出自谁的口，话可能倒不一定错，要看谁说的了。还说，在高处的东西不一定就高。在低处的东西也不一定就低。

3.16 同北青在动物园时我说自己，恐怕再过几年这棱棱角角就要磨平了。北青说有一种物质，哪怕是外面磨得再圆，只要一击碎仍旧是以一个多角体（四方）而存在。所以，外面要这样，不要在生活中屈服，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其实目前这些事情也算不得什么，今后外面独立生活，困难更大。我说“外圆内方”是吧？这实际上指有些事情自己心里明白，有的话心里也有数不一定说出来，不一定表达出来。

说到王洪文被选为国家副主席，北青说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主席提名时很多人都不同意，包括总理，作了好多工作才同意了，现在早已搬入中南海里，恐怕行宫亦已落成。

我们议论到（给黄的信里），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是很容易的，因为有权，这种可能性随时存在，我们是一碰即倒的。说到政治生命，黄认为目前政治生命几乎没有，也无所谓珍惜与否。我认为要从“零”开始，这个起点原释为“工作”，现释为“出学习班”。

黄曾在信里这样解释学习班，像挤海绵里的水一样，又开始随着批林批孔运动而揭发林彪及其死党的“克己复礼”新罪行，立新功，致使他们出不了学习班。

江腾蛟没有多大本事，不过暂时利用，真正的核心还是林立果和周宇驰。空四军的作

风就是江腾蛟的作风，而又很突出地反映在李伟信身上了。

广州搞得有点过火，不注意策略，顾同舟、查全伦、米家农太爱咋呼，沉不住气，弄得有人要告状。原本力量不盛，斗争激烈，团结也不紧。

据说王飞是花岗岩脑袋，死顽固，事过两年多什么都不讲，胳膊也被打折了，有什么用？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做的，你不讲别人也讲，对自己没好处。朱铁生跳楼自杀了，伊爱人挺可怜的。

回北京后曾碰见过朱铁铮老婆两次，第一次是某天下午在南门岗，她问了我几句有关复员的事情就走了；第二次是春节后，在海司附近，她问我有没有领过节的东西，我说没有，领不领就那么回事，不在乎一点东西。她会意，随便扯了几句，分手。两次都有我弟弟在场。

三月二十七日十时，我出了南门岗后在铁路医院门口被一个穿军衣的女同志叫住，攀谈了十几分钟，此人不认识，面熟而已。她告诉我了一些关于王飞女儿王燕宁的事，如何复员，干什么工作，拿多少工资。问到我的目前情况我简略告之。伊似乎有些不平，让我去人武部讲理。因谨慎，不便多言，恐其去之不速，最后她终于走了。曾议论了一下关于死党搬家的事，她说有贺德全家。

我说这些人算完了，翻案根本没意思，林彪也被批得臭不可闻了，历史的结论已下。北青认为自己的父亲“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结论不存在，让事实来证明才行。

北青说广空有人指责几个处长围着他母亲（张）转，张是“太上皇”，可谁让他们转的？发号施令你不会不听？我妈妈确实挺能干，净帮着父亲出主意，书也看的不少。我的观点与其不太相同。

周宇驰在临自杀前呼喊“林立果万岁！”中央文件可能删去了，太死心塌地了，已经连命都保不住，马上要完蛋，还喊这个多没意思？！好似自我嘲讽和安慰。

鲁珉早就想到下面去，离开空直机关，搞点具体工作，在此事太多，怕诸事牵连。周宇驰对林立果讲了，回答是要安心，调动问题暂不提，同时对其坚定性已予以怀疑。

鲁珉有个好老婆，精得很，救了他一条“命”。这种人关键时刻就靠不住了，很会拨拉自己的小算盘。

林彪很会挑选人才，这帮人工作能力和活动能力都很强，可惜走错了路，才越多，陷得也就越深，多少人受牵连，害人不浅。当初一个个神气活现，现在不知道啥样呢。周宇驰幸亏死了，否则还得受罪。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不这样做已不行，什么跟人要跟对、跟到底，政治舞台不容易下，罢休不可能，只有破釜沉舟，决一死战。这玩意，你死我活嘛。

周向阳的证明材料

“九·一三”事件后，党组织上给我们办了学习班，从思想上、政治上挽救了我。当时我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揭发交代了林彪一伙的一些罪行，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和鼓励。出学习班后，由于我思想上存在着“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放松了思想改造，以至于在思想上有了回潮，同林彪一伙及其死党的界限又划不太清了。甚至还传播散布了一些政治谣言，攻击了一些中央首长，又犯了新的错误，经过组织的教育，我把我的错误言论向组织上交代一下，接受党组织的帮助，提高认识，使我的思想提高一番。

一. 对林彪死党周宇驰怀有敬佩、留恋、惋惜的心情。

这种思想在我和向红的谈论中占了很大的成份，我们主要有以下几个错误观点。

(1) 认为周宇驰成了反革命并不是由于本质坏了，而是跟错了人，要不也成不了反革命，他跟林彪搞反革命政变活动是出于被迫的，是骑虎难下的。

(2) 觉得周宇驰并不是全坏的，应对他做所谓的分析，也就是向红说的是超阶级的分析。我们通过这些分析觉得周宇驰很有才干，虽然是反革命的才干，但终究是才干。我们

还认为他要是没才干也不会挑他当林立果的老师，甚至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方说他的工作能力、会团结人、待人接物等等方面，我给向红写过一些关于“九·一三”前后北京的一些情况的信中就很明显的流露出对周宇驰的怀念。向红她还曾写过一首诗给我，内容也是怀念周宇驰的，我只记得第一句是什么堂堂帝王貌，第二句的意思是现在被人唾弃了。第三句是夸他有才，第四句好像是什么“常在梦中会”之类的。诗早就给我毁掉了，因为我怕让别人看见了不好。

（3）对周宇驰的自杀这种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做法不是愤恨，而是理解同情。

对周宇驰这个林彪死党在飞机迫降后的自杀行动我们认为这是必然的，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错误的认为这叫做一条路走到底，即使碰的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的什么政治家的品质，还有留恋他的想法，觉得像他这种人是死硬到底了，不可能向人民低头认罪的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他活着也得受罪，还不如死了的好。还错误的认为他们这些家伙的打算是要么流芳千古，要么遗臭万年，不会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还认为他比李伟信要好，不怕死。

（4）我和向红还谈到过对他的印象，一致都觉得不坏，不是一个凶神恶煞、满脸横肉的人。不是蛮不讲理，觉得周宇驰过去对我们很好，教育有方，从不打骂、以理服人等等，现在失去了他，好像精神上少了一个支柱，遇到什么事也没人给出主意了。有怀念他的幽情。

（5）对革命群众对周宇驰的有些批判感到不对，认为不符合实际，是硬把一些罪名加到他的头上。

比方说我听我奶奶说大院里一些保姆对她说周宇驰生活作风不好，乱搞男女关系还和别人私生了一个小孩的话时，我就说这纯粹是造谣。因为周宇驰早就做了绝育手术了，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了。我还说一个人政治上一臭其它皆臭。政治上一倒其它皆倒，向红也认为我说得对，是这么回事。

以上这些是我和向红最近一个时期的对周宇驰的一些错误看法。我们彼此在一起谈论

的就是这几个观点。经过组织上同志的帮助我初步认识到了这些看法的错误，主要在于我没用阶级分析的看法来看待周宇驰这个死反革命分子，用的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观察分析他的，所以得出了以上的错误结论。

二. 对林彪及其死党的一些看法

(1) “九·一三”事件以后在事实面前我认识到林彪的反动本质和丑恶嘴脸了。知道他是一个叛徒、卖国贼。但是由于以前周宇驰这个死党向我们灌输的流毒没有肃清，同时看到报刊上的一些批判文章，便有一种认为批得不全对的想法。

比如报刊上有一篇批判林彪散布的“不同心也要协力”的文章，说这是错误的，我就认为不是如此，我曾对向红说过不同心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协力。比方我们为了一些革命的需要结成同盟，同盟的成员并不都是一条心的，但是暂时的目标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协力的话。

还有一次看到了一篇批判林彪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话的文章。我曾说过在有的情况紧急的时候，就是得不理解也要执行，要等到理解再去执行就晚了的话。我只从字面上去理解这句话，而没有从林彪的反动本质上面联系起来看这句话，因此认为这句话是不能算错的。

还有一次是说到林彪是个不看书、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时，我和向红都觉得这又不符合事实了。我们整天看书看报还没有知道什么“之乎者也”和一些典故呢，怎么林彪他不看书就能知道这些吗？

类似这些话我们可能还说过，总之一句话就是觉得现在有的批判文章写得太极端了，不注意一分为二，看了不能叫人服气。向红和我都有这种错误的看法。

对这次批林批孔的一些提法我和向红谈过，也是认为一批孔，就把孔老二说得什么都是很坏的，一无是处。我说原来主席说过的一些话里面还引用了一些孔丘的话呢，主席还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遗产应当批判的加以继承的话呢，我的意思是觉得应当一分为二的看孔老二的言论。现在经过一分析我又错了，这种对一些文章不

服气的情绪是因为我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我现在认识到这些情绪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解党的政策，对“九·一三”之后我们的处境感到不满而产生的一种抵触情绪，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后果是很危险的。

由于这种思想在作怪，我还有过一些对颂扬秦始皇感到不太赞成的想法，觉得秦始皇是个地主阶级的代表，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称赞的地方。

我和向红还有顾北青还曾议论过李伟信和程洪珍。

对李伟信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想法就是这个人很怕死。顾北青说，他原来觉得这个人很滑头很世故，并说对他态度印象一直不好，我说这个人很油，并说程洪珍早就向周宇驰反映过李伟信的不可靠。顾北青说 李伟信还不如死了，现在是两个方面都说他不好。虽然我们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的确觉得像李伟信这样一个那时候是那样紧跟的死党最后竟没死，是怕死的行为。瞧不起他。对于程洪珍我们都说他这个人很精明，顾北青还说他虽免于死但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

对于他们那个“小联合舰队”的人我们都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就是觉得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才干。“少壮派”这个词是顾北青用来称呼他们这些人的。

三．我们在3月25号一起去动物园去玩的时候还议论了一些中央首长，传播了一些政治谣言，这些谣言有以下的一些话。

顾北青说十次路线斗争在派别上是文派和军派的斗争。另外他还说现在上头挺乱的，总政在给李德生贴大字报，并说是江青同志讲的总政现在被新军阀统治着。

在谈到走后门的时候，顾北青说中央现在还没一个统一的认识，有人同意搞，有人不同意，他还说了一句什么周总理面对面的同反对派作斗争的话。

我们还说谁不走后门，谁都走过。顾北青说 不走后门她（指王海容）怎么当上部长助理的，我说那肖力原来还是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呢。

我们还说张春桥还把自己的女儿送去上大学了呢。

顾北青说走后门原来只限于中央一级的人能走，现在连一些小干部都走起来了，这是

什么权力下放了。

顾北青还说张春桥原来自首过，是被一些人供出来的。

后来又议论到江青同志时我们都听说她到延安以前是演戏的，我说江新页在“九·一三”以前曾对我说她原来抄赵丹家（我在学习班里已向组织上交代了这件事）时看到了一张赵丹和江青一块演戏的一张剧照，后来我又告诉他们赵丹现在完了，被关在上海市专案组了，从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进去了，一直到现在还没出来，恐怕这辈子是出不来了。顾北青说他要是出来的话江青怎么办。

后来说到李先念副总理时顾北青说这个人是中间派，两边都不得罪，九次路线斗争和十次路线斗争都没有他的事。

还谈到最近郭沫若怎么不出来了？我说他以前是尊儒反法的观点，所以现在不大出来了吧。

在议论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的时候我说 听说是主席提的名，顾北青说有好些老师都不同意，朱德气得一天没上班。

在谈论到林彪一伙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都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化了时，我们都有一种不服气的情绪，认为政治上、思想上坏就坏，干嘛还提生活是呢，顾北青说九·一三以前中央政治局的每个成员都在广州造了一座行宫。

顾北青在和我们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一种对顾同舟怀念的心情，他经常给我们讲顾同舟对他怎么好，怎么培养，等等怀念他的话。他也认为顾同舟挺有才干。他也存在着同我们一样的一些错误认识，所以觉得挺投机的。我们彼此在一起的确是一谈到各自的老子和以前的生活就津津乐道，一讲到现在感慨万分。

我和向红还有这么一种想法，就是对目前对我们的处理感到不大满意，认为这是虽然有主席的英明政策，但基层的人执行的不得力。我还给向红写过一封信里对眼前的前途悲观失望，说什么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之类的悲观失望的话。

总之现在我初步认识到我之所以又犯了新的错误，根源是对党的政策不相信、不理解，

有不求上进的想法。因此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林彪、周宇驰在我们头脑中散布的流毒又重新泛滥起来，使我们看问题时站的立场偏了，周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特别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头脑里占了很大的统治地位，而缺乏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事物。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了。这次对我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训，它使我认识到我们这些人的思想不经过长时期的痛苦改造是不能提高的。想不进步也不后退，做个粉红色的人是不可能的，这好比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决心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认真改造世界观，彻底肃清头脑中林彪及其死党周宇驰散布的流毒，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周向阳 74.4.13

此材料系我队周向阳亲笔书写，供参考。西山农场机务队党支部 董文郁

（此处加盖“北京市海淀区西山农场机务队 革命委员会”公章）

周向红给周向阳的信（一）

亲爱的哥哥：

在没有得到你的新地址以前我就开始动笔写回信了。看了你的信叫人感到说不出的难过，真不是滋味！当然，最叫人不畅的是你在回家后的第五天里就把向华的“庐山真面目”揭示给我了，他的表现在他的心里是从来不曾出现过的，“不坦白”成了向华一贯的品德，他没有自知之明，还不能懂得要透过许多表面现象认识自己是多么不容易，而又是多么重要！谢谢你呀，谢谢你能把真实的情况反映给我，看来对于他是没有希望了。

他给我的信我已经让你带回去了，都看了吗？我所知道的情况，除了信中所述之外就一无所知，我一点也没有怀疑向华欺骗我，可是现在却意识到，糊涂的人生观终于已经完

全左右着向华，使他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一条危险堕落的道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表现对唯一的亲人们隐瞒着。

“为什么活着？”向华不懂。他就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好吃的食物，好风景区我没接触过，活一天算一天，究竟对除他以外的人有什么用，有啥贡献？他既说不上来，也做不出来。有人养活他？行！欢天喜地地接受别人出于关心递过来的所有东西，甚至可以说出许多不连贯的感谢的“心里话”。他还没有能力搞什么“物质报酬”，我们也不要求他这么做，即使他在将来有能力的话*要求。我们（包括你喽）需要什么呢？需要在感情上心心相印，思想上息息相通，真正了解的只有我们*剩下的寥寥无几的人了。可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向华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呢？

我总觉得，向华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很大程度上与家教有联关。爸爸很少管他，特别是近几年工作那么忙，老在外面跑，对他不了解，而向华对爸爸也不理解，互相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所以，即使爸爸有时冲他发一顿脾气，也不是什么“长效磺胺”，而雷阵雨一过，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家里另外两位女同胞对他采取迁就的态度，结果到头来还受到他的鄙视、讥笑、*骂，经济上依赖家庭，精神世界却在外面另寻乐趣。我放暑假时对向华说过“你的出生是多余的，因为本来想打胎打掉你后耽误了……”“九.一三”之后，我确实有一种争口气的思想，让大家（指认识我的人）看看，周宇驰的女儿也不是什么孬种，别人能做的事情我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或做不好的事我仍可以做。究竟为谁争气？为我，也为他。要是我的这些一看就知道受过“高等”教育、正面指引过的行动能减轻罪行就好了，他在我心目中并不是一个什么凶神恶煞、蛮不讲理、一肚子坏水的人，应该实事求是啊！

周向红给周向阳的信（二）

小艾不来信了，你问问伊。韩玉芬在学习班检讨了，在全院，宫的态度好，解放战争时期又立过功，因此回来的把握大。

什么手套，你根本就没给过我，别糊涂了。医院政治处无人知道衣服的事，我打算再等一个阶段，等管事的那个人回医院再问，也可以问京，他已出来。上海冷了，今年不会复员了。今年拉练是摩托车拉练，听说不要“455”了。病号叫我谢谢你，挺满意。通信基本保险，什么照片？是他的？

最近（一个星期吧）又写了一些诗，请评价：

①任凭严寒风雪催，

怎奈四海已久留。

长叹出门无故人，

后悔少饮家乡水。

②月淡星稀夜已深，

残光斜洒梦长沉。

欢乐不减当年盛，

添得悲泣几多声？

给一个老飞——楚人写下的：

③生来不是作诗人，可笑白纸空无迹。

只因回味当年事，曾几何时月已西。

耳畔闻风声声急，心怀北国无限意。

谁道万物终无情，不过将情于他人。

写去后对方未回信，谢天谢地！我不让他写，偏不听，得罪他就好了，不写了。

另只此亦是：④吹来东海阵阵风，送去江南秋日香。

终究不是家乡土，如何砌得故居墙？

信我闲步浦江岸，携友共游郊园行，

记起楚友诗三首，兴然提笔不成章。

⑤热风戏面睡意浓，自由匾下趣无穷

⑥百花过尽意难平，隐隐橘香诱我情。

敢疑千年然古事，敢斥百世富贵情。痴女不知新夏贵，书罢睡去晚霞红。

遨游人间黄河上，徒死不悔沙土间。风过云散不复来，辉天烟消宇宙中。

当年匆匆离乡去，何年狂欢于家中。帝族终念醇酒美，长梦初醒泪纵横。

写给南青：

⑦闲时只作书写事（指我），意欲空怀愁满楼（指他想兄、我）。

自古少年易多情，多情少年梦更稠。

套曹雪芹之语：空对着，寂寞板墙屋顶瓦，终不忘，世间生存骨肉亲。述母。

回忆终为旧时事，灯下慷慨与谁同？叹已

望你埋头学习，努力钻研，丰富脑 C 的“内容量”。

妹：红

73-12-5 PM

哥哥：

《春》看完了吗？余索取矣，别人要还的。

希望你能请假送回来，不，送到小余那儿吧，北医，7 号楼，116 号，你记得吗？最好能在一、两天内，他们催得挺急的。

R

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p. m 2

今天 D 哥（按：指黄项阳）来信，将向群（按：指指黄项阳三弟）的第二封信寄来。他同意和我建立通讯关系，先“不用‘爱’字的框住”。我尚未回信，因为余来时打断了这一项工作，不过我准备同意这样。唉，我像个未脱衣服的人又戴上了结婚的彩球……

小余若问你其它的书：一本美国的，一本何家槐的《暧昧》——北北*说的“典型小市民作品”，你就说在你那（实际上在北北那）儿，还未看。别的不用多说，我的意思你领悟了吗？

红 又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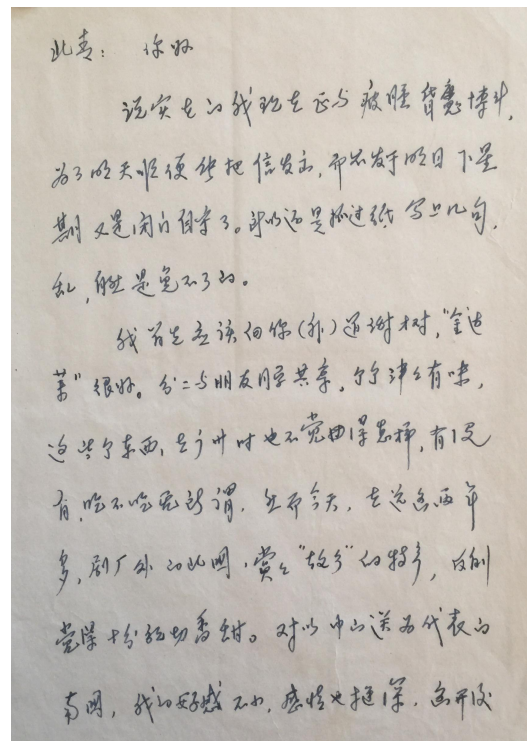
74.3.26. p.m. 4:30

周向红给顾北青的信

北青：

我在此要对你的信加以评论。

沉默在你看来是有意义的，而辩白是无意义的行动，我管不着你的举动有意义否，反



正我的信，你没予以否定和反驳，没有断言为“无意义”（起码没有明显的踪迹）那就“饶”了你，你声明“保留”的权利，从未有人剥夺，我也早做好了你“高傲的沉默”的准备，甚至是唯一的准备，你回避作正面的回答，我只认为“你是没理了”，你根本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常常抓住别人的某一点而大肆反扑——例如牛虻的问题，我下面还要谈的——有时还“无理狡三分”——例如硬说动物园的企鹅是别的什么动物，只不过与企鹅很相似罢了，∴如果你有理，本能地会反唇相讥即便你会节制自己，“本性”也不可能不发生作用。“保留”？

请便，不过我怀疑大概又是“韬讳”一类的把戏，我“发怒”时，并未认真考虑你会发生

什么转变，我不过把想要说的说了出来，让你知道我的态度，（气愤的）感情，提醒你一下，不要太……什么了就行了，什么意义不意义，这就算我的意义吧！

“我想我们……是好朋友，知心朋友……”且住，我可担当不起“好”字，更不敢“知心”了，我连知面朋友也不是。马上就有半年了吧，自那时起，至你写出那几句话的阶段内，我们算什么呢？知心？互不了解，知音？不绝如缕，友好？可我为什么还会骂你？！

“为什么不可以呢？”多么婉转声色的责备，好像倒是我不愿意似的！还有了“如果这是有益的话”。我又不明白了，什么叫有益和无益，大概你是在指我已经有朋友“一说吧”？

“我的朋友”可从来没规定我不许和别的人往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也是管不着哩，再说谁也不是“没头脑”，朋友就只有一种吗？可能是你的独立之见解也，为此，我又得“退避三舍”矣！

美国一个人曾说过：他写东西是自由自在的，他写时——如果他很会写的话——就像铁尔顿打网球那样，或者就像邓卜赛斗拳那样，那就是说，他把全副精神投入进去，绝不像玩票者那样，一面表演一面看自己怎样表演。”人与人的关系，也可以这么理解，不能不自然地教条式地预言好将来的背景！比如是一般呢或者知心，然后脱离实际的主观前进，怎么能不碰钉子，所以我说，我们可以在目前下的保证只有四个字：同甘共苦。而不应该是什么“好”呀，“知心”呀一类不真实的词牌名。当然了，以后的“阶级”也不可能上升到几个月前你的想象高度上，关于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因而没有重复的必要，我们认识了，就已经产生出一种帮助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尽努力去做了，最后再看看，前一段的结果如何，简言之，结论应下在事物的后头，好，或否，至于有益无益，也得看我们在“向上”“问题”“有益无益”了，这就是我的一个大略的“友谊观点”。

你说，“牛虻和琼玛皆为作者虚构之”，除了散文一类的新闻报导及自传或回忆录外，你能说什么文学作品里的主配角是真名，不虚构呢？艺术本身就包含了很大程度的“虚假”成分。照你的谬论，萧长春，高大泉，周挺杉，江水英——等等，都失去了让人民学习，模仿的价值喽！根本不对，“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文艺创造

的原则。不否认《牛虻》这书不是无产阶级的，而主角也并非革命者（我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作者也不一定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个原则却早是在广泛应用着的，虚构的东西是有一定的（甚至可以是很雄厚的）社会物质基础的。“宝玉”还是假的呢！而《红楼梦》的政治意义和艺术价值——同时都被今天肯定了。我不用废很多的话，你自然是个心有灵犀的人，然而，这否定一切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不承认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滑头，无非是达到“堵住嘴”和“躲过去”的目的而已。具体落实到《牛虻》一书上，作者是否被一个不叫牛虻的牛虻所启发，因而挥笔写出了《牛虻》的历史，现已无法查清，但我们可以从整个创作过程里，从章章页页中，从字里行间上，体察那遥远的境地和并不能指为“生疏”的感情，领略那个时代的风雨，为他所吸引，激动，以致最后会信服，在辽阔的疆土上确实有过一个牛虻，有过一个琼玛！谈到“模仿”完全是个自由的问题，你以为世界上都是“各自为政”的吗？每个人都有完全独特的一套，委实没有什么统一的东西存在？多的很咧！文字本身就可以证明，否则大家真的会老死不相往来呢，通过什么交流一切必须交流的东西，好像我们也不用劳神写什么信了——可笑。

七二年八月，你的信曾愤怒指出：“问题是谁也不是在斗室中生活”!!! 既然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颇有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滋味，再伟大的人物也得服从时间的安排，请记住）为什么总强调曾经两三次提到的现实生活？我一直觉得我挺现实，我没有躲得老远，摆出一副惊魂未定的长久姿式，我没有“益”“情”，没有……总之是实事求是的，那么，是你不现实吗？这倒可能对，回来吧，实属应该、必要，我站在“现实生活中”向你友好地招唤，期待着。

“怀疑广州人是否穿裙子”，显然是愤怨之余，不甘放弃地讥讽之词，你在瞎说，害的人白辛苦，裙子老早有，我在的时候就根本未“绝迹”，近几年在江青同志倡导下的“服装政策”引起的，难道对广州无影响，你得注意，内销之类的商品，买“裙子”大概莫多嘴了，你们男孩子在生活方面实在没有长处好效法，失败>成功，你一定又在发怒了，纯粹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我早就习惯于冷战，习惯了你“故作镇静”的厚脸皮，前面

又讲到了那个唯一的准备，可以告诉你，南（按：指顾北青的弟弟南青）把你的信当然转寄了我，∴他莫名其妙，——怎么可能忘记？！然后便又遵循了一次“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原则，很老实的寄去了，你开头第一句，“奇怪吗？”也不奇怪，要了解：我们之间的互通有无是较及时的。

那么现在写时，我也没有发怒，而是心平气和，纯从上面看出来的，去丰台等车。

向红，二月二十七日

来信地址：广州东风五路七七六 陈长江（按：此行是专案人员注明）

北青：你好

说实在的我现在正与疲睡昏魔搏斗，为了明天顺便能把信发出，而明日不发于下星期又是闭门自守了。所以还是抓过纸写上几句，乱，自然是免不了的。

我首先应该向你（补）道谢才对，“金达莱”很好。分二与朋友同学共享，个个津津有味，这些个东西，在广州时也不觉得怎样，有没有、吃不吃无所谓，然而今天，在远离两年多、遥远的北国，尝尝“故乡”的特产，反倒觉得十分亲切香甜。对以中山医为代表的南国，我的好感不小，感情也挺深，离开后一直怀念，我倒是期待总有一天能重返故“院”呢！让的经历，也正像妃子所说：今个儿去这，明个儿还不知道上哪儿呢！我不知道“今天”会生活多久，因而也不清楚明天何时来到。一块毕业的三百名左右（部队）同学当中，怕也只有我一个人被命运失宠，真的能谓之：流离失所矣。但我不怕，我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暗送现在，欣迎将来，我要抓紧时间“战斗”——必将是一场无上境的艰巨而伟大的战斗，你说对吗？

你回家我共交给你两项任务，那天“谈犹酣”，没及后一项（我还希望什么时候再谈谈，很有意思的故事），你来信时汇报一下吧，解决了没有？

五月份要开运动会，南青能来吗？退役或属难免，哲（按：指顾北青大妹妹哲青）、

怡（按：指顾北青小妹妹怡青）老吊在哪儿？我觉得还不快点将后事定下来，心也好放下。

对了，我上次说写了“失业者之歌”你断言必又是“下滑线”（按：指情绪低落），不见得吧，我取出一首词你评评，当然没啥文采了。

（采桑子）

芳春不满弄空弦，

日日惊变，

处处春灿，

还来他日白衣恋。

万物初醒动争先，

物笑我惭，

人忙我惭，

春风最恼我清闲。

向红，三月八日 pm10■

北青：你好。

刚收到你的信。

昨天给你打电话，可能你已经知道了，对于那个结巴老头儿的职务所在，我不得不考虑，以后是否还敢给你打电话？毫无办法。

……我说你是糊涂，又怕伤害你的自尊心。什么“为人民服务”？“任务”是你问我有什么事儿，在那封被你称为“怒发冲冠”的信里最末一段，我跟你啰嗦什么？！真该敲了你的头！除了衣服，我提到了钱问题，现在H（按：指我在插队的弟弟向华）处连续4个月不开支，生活费解决不了吃大哥的。他们的经济大概划不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中去——老亏损，把今年的钱分给去年的工分，叫人想不通，还是高楼下的大寨呢！不然我

也不会问你这事的，别怪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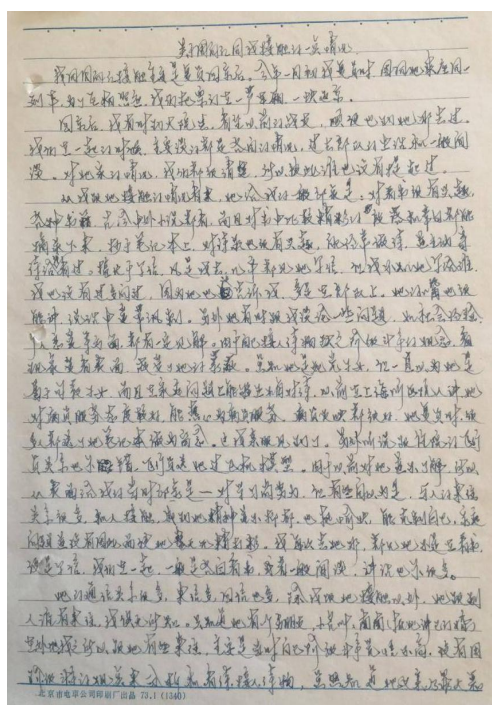
我说，除了“门槛（Kan!）”和“鸾”及谈谈书外，你还应该再给点什么东西叫我开开眼界才对。

词念对桑和（按：此处语焉不详，因此信已非原件，系他人手抄的钢笔字，估计是办案人员亲为），会意便可称之为“歌”，你要不同意我看叫“失业者之词”亦无关紧要，差不多都是诗词，十几首呢，我只有文字，作曲少的可怜，还不及小“克里斯朵夫”呢。

下次你再给借些书，有“罗亭”和“简爱”最好不过。

R 七五，三，十七

余翔：关于周向红同我接触的一点情况



我同周向红的接触主要是复员后。今年一月初我复员时，因同她乘坐同一列车，微凉互相照顾，我们把票订在一个车厢，一块返京。

回京后，我有时到大院（按：指空军大院）去，看望以前的战友，顺便也到她那去过。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主要谈的是各自的情况，过去部队的生活和一般闲谈。对她家的情况，我们都很清楚，所以彼此谁也没有提起过。

从我跟她接触的情况看来，她给我的一般印象是：对看书很有兴趣，各种书籍，古今中外小

说都看，而且对书中比较精彩的段落和章句都能摘录下来，抄于笔记本上，对诗歌也很有

兴趣，能经常作诗，还主动寄给我看过。擅长于写信，凡是我去，几乎都见她写信，但我不知她写给谁，我也没有过多问过，因为她也没告诉我，多是在部队上。她的嘴也很能讲，说话中常带讽刺。另外她有时跟我谈论些问题，如社会经验，个人恋爱等方面，都有一定见解。由于自己接人待物缺乏阶级斗争观念，看现象爱看表面，故受她的蒙蔽。虽知她是死党子女，但一直认为她是可教子女，而且在家庭问题上能够正确对待。以前在上海听医院（按：指“455”医院）人讲，她对病员服务态度较好，能热心为病员服务，病员反映都很好，她复员时很多人都送她笔记本作为留念，这我亲眼见到了。另外听说跟住院的飞行员关系也不错，飞行员送她过飞机模型。由于以前对她并不了解，所以从表面给我当时印象是——对学习尚努力，但有些自以为是，与人的往来关系很多，和人接触，感到她精神并不忧郁，也挺愉快，能克制自己，家庭问题并没有因此而使她整天无精打采。我每次去她那，都见她不是在看书，便是写信，我们在一起，一般是各自看书，或者一般闲谈，讲话也不是很多。

她的通信关系很多，来信多，回信也多，除我跟她接触以外，她跟别人谁有来往，我俱无所知。只知道她有一个男朋友，小名叫：南南（据她讲已订婚），在外地。我之所以跟她有些来往，主要是当时自己阶级斗争觉悟不高，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和看待接人待物，虽然知道她父亲乃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林彪死党，而觉得她是孩子，与其父罪行无干。另则她也是复员军人，况且过去在家时也认识她哥哥，而且她在医院传染科工作时有一好朋友叫马爱英跟我关系也很好，所以我对周向红态度也比较热情，又处于一般同志友情，而且一路复员，所以回家后，仍有一些来往。我同她哥哥一起游玩过颐和园、八大处，她要我帮她借书，我也答应了，我借给她的书有：三国演义、春、秋、海涅诗集、奥勃洛摩夫、飞碟等。

她有时主动写信给我，问我分配情况，我也复以回信。另外在我同马爱英的关系中，我请她帮我出过主意，因为她们互相比较了解。

我们过去在一起谈过话，纯属一般闲谈，无主题和重点，所以现在也记不清了，聚

文网仔细回想，她在同我的谈话中没有明显的右倾言论，有时只流露出对分配的担忧，因为自己的家庭包袱而感到苦闷，别的我没有发现。我们所踢的都是过去部队的事及一些私人问题。据我想她在我面前之所以比较稳重，讲话比较注意，一则因为我出身与她不同，所以感情和思想也必然不同。她要谈的话我会必不赞成，二则因为她还要在我面前以正人君子出现，使我不能认识她的真面目，继续欺骗我。而我也被她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而她也时常在我面前谈论什么理想，要为革命和共产主义贡献一切等，使我当时觉得她的心胸还是比较正直，有时我还想她父母是死党对党犯下大罪，但她是子女，美做坏事，是无辜的。所以也就感情用事，盲目地相信她，有很多事情都跟他讲了还有一些不应该听信的小道消息，自己也对她散布了，这都是很不应该的，也是错误的，是值得自己好好反省的。现根据自己的回忆，把我同她过去所讲的一些话，整理如下：

- （一） 她又一次跟我讲：集体宿舍铺位取消，哥哥也不让回家，难道她也有罪，还说大院要把她们死党家属迁回原籍。
- （二） 又一次我去大院买春节供应军人的大米，她看到后说了一句：我们在院里住的还不如你们在外住的。
- （三） 我曾向她说过：中央和军委开了批林批孔大会，江青写信批评了空军，因为批林批孔不深入。
- （四） 我还跟她讲：中央斗争也很激烈，在四届人大筹备会议上，总理面对面的跟反对派进行了斗争。李德生也有问题了，总政的大字报很多，田维新、黄志勇都有问题了，挨了批判，总政又倒了一批干部。

以上几点是我同她在一起所讲的，供领导参考、盘查。

余翔 1974. 5. 22 ■

顾北青：关于周向红在和我接触中谈论到的一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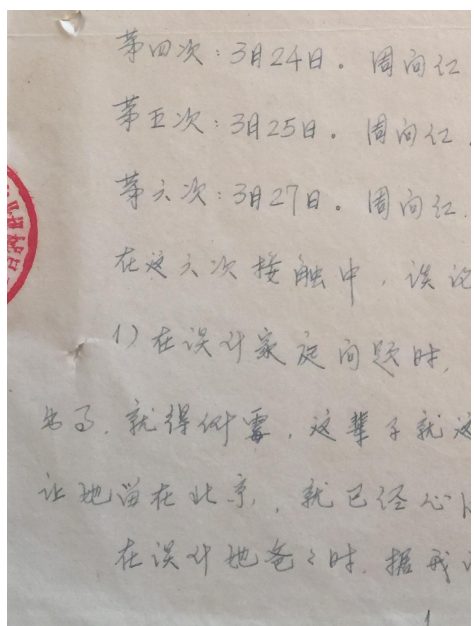
我复员到京后，从2月28日到3月27日，共和周向红见面6次。具体时间如下：

第一次：2月28日。周向红和我。

第二次：3月16日。周向红和我。

第三次：3月23日。周向红、我妹妹和我。

第四次：3月24日。周向红、周向阳、我妹妹和我。



第五次：3月25日。周向红、周向阳、我妹妹和我。

第六次：3月27日。周向红、我妹妹和我。

在这6次接触中，谈论了如下之问题：

1) 在谈到家庭问题时，周向红说：反正家里一出事，就得倒霉，这辈子就这么回事了。并说：只要让她留在北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在谈到她爸爸时，据我的印象，她总认为她爸爸还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

当时我也把我自己对家庭问题的看法对她谈了。

我曾对她说过，我希望我爸爸改正错误并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并且还说我相信他能改正错误。

我还对她谈过广州军区学习班的人对我妈妈讲现在挽救我爸爸很重要。因为他工作能力较强，挽救过来后，还可以为党做许多工作。同时，还说他在学习班里表现较好。

我也对她谈到过我妈妈。我说：听别人说，广空的几个处长居然围着我妈妈团团转，我感到十分有意思。看来我妈妈还是一个挺有能力的人呢！

2) 3月25日, 我们曾谈到过李伟信。记得我当时谈了对李伟信的看法, 我说: 我见过他一次, 但过去总觉得他太世故。我对他的印象是: 狡猾, 怕死。

这时, 周向阳就说: 那时候, 我对他的印象, 也不太怎么样。并说, 他曾听到过他爸爸向林立果建议不要让李知道得太多。后来, 周向阳说: 这家伙什么都知道, 这次没死, 提供了不少东西呢!

周向红说: 我对他的印象一般, 反正现在像他这样的人也好受不了多少!

3) 3月25日, 在谈到程洪珍时, 周向阳说: 程洪珍很狡猾, 临上飞机时躲在小松树后面, 于新野叫了他几声, 他没出来, 后来飞机就没等他。程洪珍这个举动还是明智的, 他要是一上飞机, 也就成叛徒了。

4) 3月24日下午, 在空办招待所, 周向阳说: 赵丹和白杨, 都关在上海警备区, 我看这辈子是出不来了。是呀, 要是出来她怎么办呀! ?

我说: 肯定是要照顾影响的。

5) 3月24日在东风市场, 我说: 当时我没想到王洪文这次“十大”能选上副主席, 我想他可能先进政治局。周向阳说, 当时上海猛给他提高威信, 大会小会都讲, 他是最有希望的。听说提他当候选人时, 开始连总理都不同意呢!

6) 3月24日, 我曾对周向红说: 听说张春桥有个女儿在复旦大学上学, 是走后门去的。周向红说: 那有什么可奇怪的? 我后来又说: 过去我听说他是叛徒。周向红说: 到底是真还是假? 我说: 听说是有人供出来的。

7) 有一次(时间忘了), 周向红说: 在广州时, 她和李先念的女儿在一个学校, 听说她爸爸让她谁也别沾。我说: 他在这方面还是很谨慎的, 这几次路线斗争他都没事。

8) 有一次我妹妹对周向红说: 许世友到广州后第三天就派秘书到原广州民航局长(已去世)的家里拜访, 后来又请吃饭。刚到广州, 肯定要拉一些人才行。

9) 有一次(3月24日?)谈到走后门问题时, 周向阳(周向红?)说: 是呀! 不走后门, 哪能当部长助理?

10) 3月24日,周向红曾说:现在反对派不少,听说总理面对面地和反对派斗争。

11) 2月28日(3月16日?)我曾对周向红说:广州有些干部子弟十分猖狂,他们竟然说:谁人执政30年!当时我听到这话吓了一跳。周向红听完后,冷冷一笑。

12) 3月16日,我曾对周向红说:9次路线斗争倒的基本上是地方的,即文的,10次路线斗争倒的基本上是军队的,即武的。而且十次倒的一些人,许多是比较年青有能力的人。周向红当时也说有同感。

13) 3月25日,周向阳说:他曾去过林彪家。他还说叶群特抠,连林立果回家吃饭还要交饭钱。我说:听说林彪特抠,每次发了钱,都换成外汇存起来,也不买什么东西,家里的摆设也比别的政治局委员少,是吗?周向阳说:我是晚上去的,没看清。这时周向红接着说:反正客厅里就是一些沙发之类,后面我也没细看。

14) 3月25日,我曾对周向红说:听说以前在广州给每个政治局委员都盖了一座别墅,就跟行宫似的。周向红说:广州当然不错了。

15) 3月16日,我曾对周向红说:将来这历史是不太好写的,路线斗争这么复杂,现在在是好人,谁知以后还会不会了呢?反正我是看不出来。周向红说:那就别写呗!

16) 2月28日,我曾对周向红说:过去别人抄给我两句李白的诗,写得很狂。周问:什么诗?我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周问:什么意思?我说:既然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么,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有所作为。我还说:只要有条件,我一定可以在我的专业范围内大有作为的。后来,周向红给我来过一封信,写到:“天生我才必有用——消极。千金散尽还复来——狂妄,这是我的理解,对吗?”(大意如此)

17) 3月16日,我曾对周向红谈起在广州时,有人经常对我冷言冷语地说些不中听的话,但我当时都没管他,任他怎么说我吧!卡斯特罗说得好: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周向红听了,付之一笑。

顾北青 1974.4.27 ■

顾北青：关于周向红在和我谈话中谈论到的 一些问题的补充材料

1974. 5. 13

一、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看法：

在谈到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看法时，周向红问我：关于这次路线斗争，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说：“我看这次路线斗争，就是中央里军派和文派的斗争。”而且这次斗争是十分激烈的。

接着我问她：你的看法如何？

周向红说：我过去很少考虑和分析这方面问题，但现在变多了，经常自己考虑和思索一些问题，我也曾自己想过这个问题，我的见解与你是差不多的。

我说：你看，第九次路线斗争倒的主要是地方上的，即文的；而这次倒的则主要是军队上的，即武的。看来，路线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斗争。我真看不出来，谁敢担保以后不会再上当受骗！

周向红说，这样未免太不自信了吧！

我说，我可不敢说大话。

后来又谈到了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和有问题的人，我说：这次倒的人当中有不少都是比较年青，有能力的人，

周向红说：是不是所谓的“少壮派”人物？！

我说：大概如此，反正差不多。就算是“少壮派”吧！

二，关于李伟信：

3月25日，在谈到李伟信时，我说：我过去对李伟信印象总不太好，觉得他有点太世故了。而且这个人又狡猾，又怕死。

周向阳说：这家伙知道的事太多了，这次没死，肯定向中央提供了不少东西呢！

我说：那还用说？！

周向红说：哼，他那个人呀！

周向阳说：我看，他当时要是真死了，中央也许有很多东西就搞不清楚了呢！

周向红说：他没死，现在也好受不了。

我说：现在他想死都死不了了了呢！

我妹妹说：我看他现在倒不如当时死了舒服呢！

三、关于“走后门”：

3月24日，在谈到“走后门”问题时，我说：过去“走后门”的只是些高干，现在只要有点小实权的，都可以“走后门”，这样肯定是不行的，而且群众意见也多，我看将来“权利”还得收回来才是。

周向红说：当然要收回来了，现在就正在往回收呢！

后来，我说：其实“走后门”要看怎么说，并不是什么都叫“后门”的，不走“后门”，哪能当部长助理？！

周向阳说：对上边来说，有些事根本就不能叫“走后门”，是正当的。

四、对李先念同志的议论：

3月16日，周向红曾谈到她在广州时，和李先念的女儿在一个学校。并说：她爸爸告诉她谁也别沾。这倒是很聪明的。

我说：这几次路线斗争，李都是没什么事的。在这方面，他还是十分谨慎的呢！恐怕在中央里，他也算是一位中间的人物了。

五、关于“反对派”：

3月24日，周向红问我，你看这帮人（指十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和有问题的）什么时

间才能出来？

我说：我看恐怕得到4届人大以后了。那时中央可能就会有具体的政策下来，这帮人表现好的有的就该安排一些工作了。

周向红说：听说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不少呢！4届人大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开？！

我说：当然了，我看斗争还是十分激烈的，看样子今年上半年是开不成了，怎么也得等批林批孔运动告一段落才行。

周向红说：听说总理面对面地和“反对派”进行斗争呢！

六，关于“天才”：

3月16日，周向红问我：你说到底有没有天才？

我说：主席不是说过，“天才无非就是聪明一点”吗？看来天才还是有的，否则，怎么理解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等革命导师们杰出的活动呢？难道把一般的人放在这个位置上，他都能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吗？我看未必吧！马克思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领袖不少，但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科学地总结了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别人为什么就不行呢？当然主要是靠实践，但如果没有杰出的能力，也是不能将实践上升到学说的理论高度的。

七，关于历史变迁：

3月16日，我曾对周向红说：历史是不好写的，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随着当时斗争形势的发展，对于各种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就会随着改变。所以说：不光是活人在变，就连死人都在变呢！比如说：秦始皇和孔子，现在评价不就正好反过来了吗？

周向红说：那当然了，写历史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嘛！

八，关于“谁人执政30年”：

2月28日（或3月16日？）我在同周向红谈论广州的一些事时说：广州现在有一些干部子弟，很不像话，十分狂妄。他们有人竟然说什么：“谁人执政30年！”我当时听了以后，吓了一跳。说实话，我看这些人早晚会走极端的，要么就颓废下去，要么就走向反

面，这是必然的结果。

周向红听了，冷冷一笑。

（注：1973年6月的一天，广东省委的一个干部子弟，叫孙鲁冀的曾对我说：我问你一件事。文化大革命时北京曾流传过一句话，你听说过没有？

我问：什么话？

孙说：谁人执政30年！

我当时听了以后吓了一跳，忙问：这是谁说的？

他笑了笑说：那你就别管了，你听说过没有吧？！

我说：没有。你到底是听谁说的？

他说：没听说就算了。）

注：此材料系在原有材料基础上，本人认为应当加以补充或修改的一份补充材料。有的问题原有材料不须补充的，均未列入。

顾北青 1974.5.13

周向阳的证明材料

“九·一三”事件后，党组织上给我们办了学习班，从思想上、政治上挽救了我。当时我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揭发交代了林彪一伙的一些罪行，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和鼓励。出学习班后，由于我思想上存在着“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放松了思想改造，以至于在思想上有了回潮，同林彪一伙及其死党的界限又划不太清了。甚至还传播散布了一些政治谣言，攻击了一些中央首长，又犯了新的错误，经过组织的教育，我把我的一些错误言论向组织上交代一下，接受党组织的帮助，提高认识，使我的思想提高一番。

一. 对林彪死党周宇驰怀有敬佩、留恋、惋惜的心情。

这种思想在我和向红的谈论中占了很大的成份，我们主要有以下几个错误观点。

(1) 认为周宇驰成了反革命并不是由于本质坏了，而是跟错了人，要不也成不了反革命，他跟林彪搞反革命政变活动是出于被迫的，是骑虎难下的。

(2) 觉得周宇驰并不是全坏的，应对他做所谓的分析，也就是向红说的是超阶级的分析。我们通过这些分析觉得周宇驰很有才干，虽然是反革命的才干，但终究是才干。我们还认为他要是没才干也不会挑他当林立果的老师，甚至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方说他的工作能力、会团结人、待人接物等等方面，我给向红写过一些关于“九·一三”前后北京的一些情况的信中就很明显的流露出对周宇驰的怀念。向红她还曾写过一首诗给我，内容也是怀念周宇驰的，我只记得第一句是什么堂堂帝王貌，第二句的意思是现在被人唾弃了。第三句是夸他有才，第四句好像是什么“常在梦中会”之类的。诗早就给我毁掉了，因为我怕让别人看见了不好。

(3) 对周宇驰的自杀这种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做法不是愤恨，而是理解同情。

对周宇驰这个林彪死党在飞机迫降后的自杀行动我们认为这是必然的，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错误的认为这叫做一条路走到底，即使碰的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的什么政治家的品质，还有留恋他的想法，觉得像他这种人是死硬到底了，不可能向人民低头认罪的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他活着也得受罪，还不如死了的好。还错误的认为他们这些家伙的打算是要么流芳千古，要么遗臭万年，不会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还认为他比李伟信要好，不怕死。

(4) 我和向红还谈到过对他的印象，一致都觉得不坏，不是一个凶神恶煞、满脸横肉的人。不是蛮不讲理，觉得周宇驰过去对我们很好，教育有方，从不打骂、以理服人等等，现在失去了他，好像精神上少了一个支柱，遇到什么事也没人给出主意了。有怀念他的幽情。

(5) 对革命群众对周宇驰的有些批判感到不对，认为不符合实际，是硬把一些罪名加

到他的头上。

比方说我听我奶奶说大院里一些保姆对她说周宇驰生活作风不好，乱搞男女关系还和别人私生了一个小孩的话时，我就说这纯粹是造谣。因为周宇驰早就做了绝育手术了，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了。我还说一个人政治上一臭其它皆臭。政治上一倒其它皆倒，向红也认为我说得对，是这么回事。

以上这些是我和向红最近一个时期的对周宇驰的一些错误看法。我们彼此在一起谈论的就是这几个观点。经过组织上同志的帮助我初步认识到了这些看法的错误，主要在于我没用阶级分析的看法来看待周宇驰这个死反革命分子，用的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观察分析他的，所以得出了以上的错误结论。

二. 对林彪及其死党的一些看法

(1) “九·一三”事件以后在事实面前我认识到林彪的反动本质和丑恶嘴脸了。知道他是一个叛徒、卖国贼。但是由于以前这个死党向我们灌输的流毒没有肃清，同时看到报刊上的一些批判文章，便有一种认为批得不全对的想法。

比如报刊上有一篇批判林彪散布的“不同心也要协力”的文章，说这是错误的，我就认为不是如此。比方我们为了一些革命的需要结成同盟，同盟的成员并不都是一条心的，但是暂时的目标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协力的话。

还有一次看到了一篇批判林彪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话的文章。我曾说过在有的情况紧急的时候，就是得不理解也要执行，要等到理解再去执行就晚了的话。我只从字面上去理解这句话，而没有从林彪的反动本质上面联系起来看这句话，因此就认为是不能算错的。

还有一次是说到林彪是个不看书、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时，我和向红都觉得这又不符合事实了。我们整天看书看报还没有知道什么“之乎者也”和一些典故呢，怎么林彪他不看书就能知道这些吗？

类似这些话我们可能还说过，总之一句话就是觉得现在有的批判文章写得太极端了，

不注意一分为二，看了不能叫人服气。向红和我都有这种错误的看法。

对这次批林批孔的一些提法我和向红谈过，也是认为一批孔就把孔老二说得什么都是很坏的，一无是处。我说原来主席说过的一些话里面还引用了一些孔丘的话呢，主席还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遗产应当批判的加以继承的话呢，我的意思是觉得应当一分为二的看孔老二的言论。现在经过分析我又错了，这种对一些文章不服气的情绪是因为我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我现在认识到这些情绪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解党的政策，对“九·一三”之后我们的处境感到不满而产生的一种抵触情绪，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后果是很危险的。

由于这种思想在作怪，我还有过一些对颂扬秦始皇感到不太赞成的想法，觉得秦始皇是个地主阶级的代表，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称赞的地方。

我和向红还有顾北青还曾议论过李伟信和程洪珍。

对李伟信我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想法就是这个人很怕死。顾北青说，他原来觉得这个人很滑头很世故，并说对他态度印象一直不好，我说这个人很油，并说程洪珍早就向周宇驰反映过李伟信的不可靠。顾北青说 李伟信还不如死了，现在是两个方面都说他不好。虽然我们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的确觉得像李伟信这样一个那时候是那样紧跟的死党最后竟没死，是怕死的行为。瞧不起他。对于程洪珍我们都说他这个人很精明，顾北青还说他虽免于死但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

对于他们那个“小联合舰队”的人我们都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就是觉得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才干。“少壮派”是顾北青用来称呼他们这些人的。

三．我们在3月25号一起去动物园去玩的时候还议论了一些中央首长，传播了一些政治谣言，这些谣言有以下的一些话。

顾北青说 十次路线斗争在派别上是文派和军派的斗争。另外他还说现在上头挺乱的，总政在给李德生贴大字报，并说是江青同志讲的总政现在被新军阀统治着。

在谈到走后门的时候，顾北青说中央现在还没一个统一的认识，有人同意搞，有人不

同意，他还说了一句什么周总理面对面的同反对派作斗争的话。

我们还说谁不走后门，谁都走过。顾北青说 不走后门她（指王海容）怎么当上部长助理的，我说那肖力原来还是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呢。

我们还说张春桥还把自己的女儿送去上大学了呢。

顾北青说走后门原来只限于中央一级的人能走，现在连一些小干部都走起来了，这是什么权力下放了。

顾北青还说张春桥原来自首过，是被一些人供出来的。

后来又议论到江青同志时我们都听说她到延安以前是演戏的，我说江新页在“九·一三”以前曾对我说她原来抄赵丹家（我在学习班里已向组织上交代了这件事）时看到了一张赵丹和江青一块演戏的一张剧照，后来我又告诉他们赵丹现在完了，被关在上海市专案组了，从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进去了，一直到现在还没出来，恐怕这辈子是出不来了。顾北青说他要是出来的话江青怎么办。

后来说到李先念副总理时顾北青说这个人是中间派，两边都不得罪，九次路线斗争和十次路线斗争都没有他的事。

还谈到最近郭沫若怎么不出来了？我说他以前是尊儒反法的观点，所以现在不大出来了吧。

在议论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的时候我说 听说是主席提的名，顾北青说有好些老师都不同意，朱德气得一天没上班。

在谈论到林彪一伙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都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化了时，我们都有一种不服气的情绪，二位政治上、思想上坏就坏，干嘛还提生活是呢，顾北青说“九·一三”以前中央政治局的每个成员都在广州造了一座行宫。

顾北青在和我们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一种对顾同舟怀念的心情，他经常给我们讲顾同舟怎么好，怎么培养等等怀念他的话。他也认为顾同舟挺有才干。他也存在着同我们一样的错误认识，所以觉得挺投机的。我们彼此在一起的确是一谈到各自的老子和以前的生

活就津津乐道，一讲到现在感慨万分。

我和向红还有这么一种想法，就是对目前对我们的处理感到不大满意，认为这是虽然有主席的英明政策，但基层的人执行的不得力。我还给向红写过一封信里对眼前的前途悲观失望，说什么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之类的悲观失望的话。

总之现在我初步认识到我之所以又犯了新的错误，根源是对党的政策不相信、不理解，有不求上进的想法。因此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林彪、周宇驰在我们头脑中散布的流毒又重新泛滥起来，使我们看问题时站的立场偏了，周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特别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头脑里占了很大的统治地位，而缺乏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事物。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了。这次对我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训，它使我认识到我们这些人的思想不经过长时期的痛苦改造是不能提高的。想不进步也不后退，做个粉红色的人是不可能的，这好比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决心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认真改造世界观，彻底肃清头脑中林彪及其死党周宇驰散布的流毒，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周向阳 74.4.13■

此材料系我队周向阳亲笔书写，供参考。西山农场机务队党支部 董文X

（此处加盖“北京市海淀区西山农场机务队 革命委员会”公章）

附件（按：照片）：

周向红给黄项阳的信（1）

.....

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大局已定，想翻案吗？必然遭到“螳螂”的绰号袭来。

项阳，我好像觉得你的字变得更好、更流利了，是不是近两个月来写材料的结果啊？

小艾的还那样，字与字之间空挡很大，是有点“首长”的味道，不像我的，学习班可不是练字、玩弄笔墨的地方啊。

我的诗在你的诗面前可不能叫“诗”了，只能称其为“押韵的话”。文汇报批判豆豆写的“爸爸叫我怎样写文章”，措辞激烈，颇有一看之价值。不过我的那几段押韵的话，没有感情冲动是写不出来的。诗是感情在外界的一种表现方式，是内心世界的冲动的痕迹，就跟心电图一样，我本来是打算学文科的，可是为了穿军装，毅然与艾同志南下了，否则我现在大概还在复旦过着安稳的学生生活。我一点也不喜欢学医，和许多人一样，吃闲饭不好，拿钱少不好，最好就是离开人世间，寻求世外桃源的乐趣，这是做“黄粱美梦”呢！还是实事求是点好。

回答你的“？”：3日到京，分配工作无音信，待通知，北京缺医生，由于我听天由命思想的支配，不太关心（也无法关心）这件事。

另外，我不知道你们的小集团是否已解散，声明一下，我的这封信可不是什么申请书。思想上可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了。

你比我大十一岁吧？从你那里学习一些东西，再好不过了，这也是我给你回信的目的中最主要的。

地址问题很难弄，要么写信给小弟，要么写信给我哥哥（放心，他绝不会拆的，我们之间十分信任）北京西山农场机务队向阳收，落款写“216信箱”他就明白了。

就写这么多吧。祝你好！阿门！

向红

七四年元月二十九日 4: 10p.m

周向红给黄项阳的信（2）

我称呼你什么好呢？“项阳”？似乎不大礼貌，但却不能再叫什么“付主任”。那么暂时叫名字吧，如不妥，请纠正。

真有意思，为什么你也叫向阳？当我还在广州办学习班时就听说了向群的哥哥叫向阳，不过也借此得出结论：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比如我叫向红，但我的心决不是红色的，也不一定倾向红，像西哈努克当年一样是“粉红色”的，还有你和我哥哥，恐怕不一定扮演着葵花的角色吧。

还用得着介绍吗？想必小艾谈过不少有关我的事情吧？对于她来讲，不需要对你保什么密的，可以说，实际上我们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真正的直接联系，这还是第一次。说道交流思想，我可有点为难，太不自然了；与其打着旗帜向目的地进发，还不如到了那再把旗帜树起来。不过我想，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是吗？到那时，交换意见（我只能说交换看法之类的“活思想”中词，我恐怕难以胜任）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和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了。

谈到命运，不禁深感不幸，就算我们过去做得不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已经下到底层了，同几亿人一样都站在同一高度的阶梯上，可为什么我们就享受不到和别人一样的政治待遇呢？为什么就满足不了这一点也不过分的要求呢？对于社会，我们只有努力贡献的份，而无提出其它要求的权利，永远治于人了！大概发生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人们的注意力就会稍稍转移了。有规律在先，等五年吧。

马列主义著作你都读过哪几本？对于你的世界观可曾产生了影响？

就知识来说，我懂得极少，站在无边知识海洋前，真是目瞪口呆了，何况现在现存的一点东西也毫无条理地摆在脑子里，根本谈不上系统，常常想多读几本书多好啊！或是早出生几年上过去的高中和大学。钟志民的“与工农结合”思想，我是不接受的。执行着的东西不一定就与个人的天性产生了共鸣。

还有一点说明，为什么我没地址。我家住在十一号楼，无法投递没信箱。我由于家里太窄的缘故，住在十号楼的集体宿舍。不过目前暂时房间里只有一个“上帝或平民”。信

如果寄到向阳那儿，他就必须经过 2h 的跋涉回家送信（不过现在我那近二十个通讯地址的信全是他接受的）；寄到小弟那儿的话就必须同伊讲好：什么样的信是写给他的，什么样的信是转给他人的。信封上千万别写“转项虹收”之类的字样，这会把事情搞坏的。

另外，你是否可以把我们建立通信联系的事告诉小艾一下，我刚刚给她发的一封信里没有写。

Red 1.30 晨

周向红给黄项阳的信（3）

冬哥：

你好！你是一名天主教徒吗？

尽管你在信的末尾签名为“冬洞”，但因考虑到晓艾是这么称呼的，我亦如此，唯恐不适，似乎不大尊重，所以没有迎合你的这个“暗示”。这样行吗？要么干脆称“老黄”算了。我随便选择了。

冬天出生的却叫“春光”！是不是刚出生的两月内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当春光明媚之时，一个动人的“代号”组合而成了？“‘冬洞’不好听，虽然有一定的纪念意义，“残冬”太晦气，“立春”又很土气，我若是给第一个孩子起名，除大名之外，就按英语字母排列：A、B、C、……不，C 应砍去，现在提倡计划生育，事真多。

看来，当一个人尚未彻头彻尾烂透时，也不是一点好事都不做，一丝革命气味都不存在了。提起我父亲（我不晓得你是否认识），胡思乱想总免不了，不知为什么，“九.一三”以后我对林家父子是一点好感都没了，但全转到父亲身上去了。我也站在革命立场、人民的观点上批判过他，揭发材料写了不少，可是，我又独出心裁地将其的特点提炼了一番，变成“超阶级”的东西，时时回忆，汲取益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嘛，全盘否定、

全部肯定的做法根本不对！例如，批林彪说他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一点知识也没有的大党阀”，他若不读孔孟之书，如何给豆豆、老虎提出“……”之词？阶级偏见太严重了，现在人们总不容易走上“正道”，动不动就是“偏航”，反动的知识也算知识嘛！不知道孔子说什么，就无法批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宣布为禁看的书我偏偏对它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千方百计地寻来一阅。我以前很爱看港报，上面的任何东西都是“新闻”，而咱们的报纸？以前我也能写上一、两篇呢，现在嘛，多听听收音机也跟得上“形势”，熟能生巧嘛。况且，那股神秘的味道也很令人向往和留恋，平淡的生活，没有激动、欢乐、悲愤及冒点小小风险的生活，我最怕！如果一个人没有感情的话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我想这种人恐怕根本不存在，你说是吗，冬哥？

（早就该另起一行了）我想知道，以前的生活你是否能称它为“世外桃源”呢？这玩意儿也并非“永久牌”的，作为一个片段，一个插曲那还是允许的。看起来，追求“山中桃源”，或“室内桃源”尚有丝希望，虽然我们过去的地位、环境相差很大，但都还算不错，我不知你是否已满意；反正按照程洪珍的话就是“没志气”，“没理想”的我是已感不赖了。我的“雄心大志”向来不足，一个人的精力若着重在此，这人才没出息呢！我羡慕别人渊博的知识，我留恋往日数不清的书籍，至于什么“小洋楼”、“小汽车”、“小家庭”我基本抱着来之欢迎，去之不惜的态度，否则，还干别的事情不？岂不是在感情上自讨苦吃，也许这就叫做自我安慰吧？总之，应该有一个不超乎客观世界的理想和态度，抛弃空虚无踪的幻想。这，对吗？愿望分两种，一个理想，一个幻想；前者为可实现，后者为不可实现。这，也对吗？

我的首条幻想，成为一名男性！奇怪吗？我瞧不起妇女（当然包括自己）的很多方面，我趁还没“定型”之际，抓紧时机把男性的优秀品质糅合进去。女朋友一个不少，男朋友两个不多。坚持“我行我素”。对于什么将来如何在丈夫面前“温柔、多情”之类的举动，我是不考虑打下什么基础于目前的，该怎样就怎样；是啥样就啥样。要我假装那可办不到，“对不起，我不会那一套！随你便，爱不爱由你！”喏，这就是我的态度。

男同志都有些什么优点呢？豪爽，求知欲望浓，上进心强，有事业心，有毅力等，这些我都很欣赏、佩服。

不知是我“先衰”，还是由于你的“风华正茂”，反正我感觉到实际上年龄差别比感觉上的要大，也就是说，好像你大不了我几岁（但我绝未忘记尊重你），对于你写的信，我不以为“放肆”，说“平易近人”吧。对命运之神的摆布，我们最好暂时听话，不是他把我们联在一起了？唔，那就不分离吧。我可不是反悔向你“学习”口号已喊出，正相反。命运之神应“他”，还是应“她”？

告诉你，我看书的习惯同你差不多，常浮于表面，能浮想联翩的机会只是偶然，速度很快，惊（某些个）人。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同你比拟的，多吃十一年的咸盐哪！

看朋友的信是一种享受，看书是我的休息。另外，恐怕我加上还有些“流寇主义”，总不愿定居在一乡。前几年，我过得很满足，以后呢？难道永远待在这个黄土之乡？你如何认为？年龄有别，心理状态就有区别。

在书的面前，我不吝啬自己的感情之泉水，不顾“表情肌”的“抗议”而长时间地使用它们：时而咯咯欢笑，时而咬牙切齿，还有泪如雨下的时候啊。作家真了不起，写得多好啊！这证明我“进去”了。以上这些我又怕它们。万一工作起来受影响，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来不得一丝不严肃和开小差。

“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给别人与自己的回答。天晓得我以后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做出什么样的事，真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你的难题真难啊，美术字我又写不好，“希望小京能把字写的跟我一样吧！”

七四年2月6日.23时

周向红给黄项阳的信（4）

冬哥：（你以为我这辈子没跟人叫过哥哥！）

我的问题多着呢，大概比“小问号”还多得多呢。我死了以后，只要你尚健在，那么我们将在梦中“交谈”，“？”继续出现，你能回答得了吗？不过如若你把对我的印象淡漠，恐怕我就不仅仅是在人类中消失的简单问题了。

你知道，我的信大约是写不完了，暂停！

哦，那么握握手吧！

向红

74年2月9日.p.m

周向红给黄项阳的信（5）

敬爱的冬哥：你好！

不期然而然。致使我“勃然大怒”的不是亲切的“红妹”的称呼，而是信尾藏在菊花叶下面的一段“又及”，不妨重抄一遍，免得您“不认账”：“我违约提前回了信。因为不愿剥夺你的‘享受’，可又要苛（克？）制自己的欲望。下个星期天后再回信吧。……”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又是什么？从中得出几条看法：1.当干部多年已习惯了发号施令。2.是一个很圆滑的人，甚能辩护自己。明明自己违约，又说“不愿剥夺”别人的“享受”，难道还想捞到个“谢谢”不成？！3.虽然比我大十一岁，但在冲动的感情面前，自抑能力不太强，尽管你写出“可又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一席话，但我发现，你克制的并不是自己，而是我！当然，我很感激你的“秃笔”的功劳，使我享受上了，但面对随之而来的欲望——提笔疾书，扬扬几大篇地回信——我深深感到不容易对付。怪罪起来你我都是无辜的，在那几十双的“注目礼”中，什么问题不要再三再四地想？为了冬哥的处境，我想还是听你的（一半）话吧。星期五把信再寄出去。

（你称之“姐姐”者我呼之“阿姨”也。假使以前看见你，在众人的压力下肯定得十分不情愿地叫你一声“黄叔叔”，然而幸亏没叫你占去什么“便宜”。这两个异姓“姐姐”我自然是不认识的，但我佩服这种人的，不过冬哥，我所欣赏的不是像“凤姐”的泼妇，而是有内秀的人，不轻易说废话，很爱钻研、好学习、善于将自己的感情隐于内而不是流于外的人，我很佩服、喜欢和这些人谈话，争论问题。对于长辈们的谈话，我老想（偷）听，其高深的见解、沉着的态度、冷静和迅速的思考及幽默的口吻，一向为我所喜欢，常常模仿，话又得说回来，以上这些长处还没长在我身上，我嘛，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女性罢了，因此，你对我谈不上什么“尊重”，即然已有准备了，那我就不杀这回马一枪了，就是要打你的“无准备之仗”。倘若已“森严壁垒”，那我就先“按兵不动”吧。）

同意你的观点，异姓中除了爱情，还有纯洁高尚的友谊存在，这已被历史所验证，在质量上，友谊低于爱情，在数量上，爱情大于友谊。对吗？

看完你的信，觉得作者好像活生生地站在面前。小艾某些方面的进步还多亏了你的影响和指教。提到认妹妹，我决不会是第一个。小艾早已成了“亲爱的妹妹”了。不过细论起来又不大相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无非就是把以前的“行”化为“迹”在洁白的纸上重复一遍，不就是司空见惯的“热烈地吻你”、“热烈地拥抱你”之类的话吗？写就写呗，对于你们的事，我早已发表过“评论员文章”，夏日时停止。本月十七号，岩从彼处带回一封信，其中又再次让我讲讲自己的意见。昨日回信已寄走，谈了一部分（因为有你的信，未敢多写，怕超重）。以后你看吧，不宜重复。冬哥，你知道我是个“反对派”就行了。况且我以前的信，艾同志大概常交你“审阅”的。我对你的希望，（也许是无理和办不到的）是简明扼要地谈谈自己的打算，小萍的态度，艾虽已长大，但我老觉得她幼稚了一点，很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性格还不十分稳定，难免耍小孩子脾气，她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目前，首先要教会她不要再重复冒险的事情，让她平静的前提是你的老练，应该控制自己。不要再制造新的矛盾了，“反动小集团”的帽子给她套进去，显得过分地大、重了，她才十八岁半哪，我愿意自己的朋友干有把握的事。

我即希望你幸福，也希望她幸福，没有偏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朋友的朋友的关系，请放心，我同样是忠实于友谊的人，不会出卖别人，不容忍自己的幸福无恙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张宁式的人物毕竟不会再成为我们的朋友。

这封信里，我的“？”少多了吧？很惧怕你会用对待向群的方法对待我，当然，这决不会是因为缺少知识，而是由于我的“没完没了”+你的忙。如果你已手心发痒，我这里“脚气灵”早已准备就绪；假若你的手离我的脸只有咫尺，我们还是就此握握手吧，消消气！敬爱的洞哥，你的皱纹是不可避免的生活痕迹，这只是外表，我总觉得自己有一个心永远不会老的长兄，为此骄傲自豪。你是卓尔不群的，是有前途的人。

写得较乱，可能与你的心情及来信有些分歧，请谈谈。

你梦见我什么了？你在训斥我、或在教我一件事？要不然就是我调皮了。虽然小艾前几天给我两张“遗像”，我已认识了你，但对你的印象尚不能算深，未在梦里相见。你在梦里是否追打我了，每次醒来总感到身上疲乏、酸痛。（今暂停，明日再写。2.22. a.m. 12时）

付主任从未提到过你，更不要说什么两谋了，我一点也不承认遗传，你太过谦了，你的父母没有很好地教养你们四位兄弟，那我岂不是成了“白痴”、“没教养”了吗？你还让不让我存在了？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此话可为大错特错的？我总觉得，符合现状，大多数的人不是劳力者吗？治于人，现状力求“无产者治人，有产者治于人”。你们学习班现状都干什么呢？批林批孔很忙吧，难道你们每天都学习吗？我也祝贺你荣获双打冠军、单打亚军！你的手风琴还发出优美的歌声吗？我一点也想象不出你们当时是怎样在杨柳成荫的小路上，在柔软的草地上，散步、谈心、唱歌、跳舞、照相。可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我恐怕做不出来。你们当时不觉得有压力吗？我共办了三次学习班，哪次也不轻松！是的，你的弟弟们要比你红，我觉得你们家里的那位“伯父的女儿（或是叔父）”不像干部子女，她比你大吧？那么你叫“姐姐”喽？我真觉得她“土气”，后来，我就“佩服”

她们了。转变得真快呀！开会发言批判上了。我们几个小傻瓜还半信半疑呢，毕竟年龄大点，就世故点。

给人们带来轻松快感的文艺C（按：指细胞）绝未在我身上繁殖生长，恐怕倒是你和小艾生长了一个文艺上皮cCa（按：指癌症）。小艾极善于表演民族舞蹈的窈窕姿态，你也曾陶醉过去吧。至于我很欣赏悠扬的西洋乐之王小提琴的演奏，现在的琵琶、箏的独奏，常常感动。我喜爱乐器，不爱跳舞，别人给新兵的我起个“小大人”的绰号，当然为我所接受。回忆在宣传队的生活，主要放在朗诵上，一碰上艺术性很高的“产品”，我感情就同涛涛的南海一样奔腾不息，不由自主地……最可恨的是，人们为什么不承认“博览群书”是一项神圣的职务呢？！

啊，冬哥，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啊？！以口问心，究竟图啥？心曰：“忙忙碌碌、吃穿穿、生生死死，往复循环。”这真是，破红尘望断人间路，凝墨下欲做空中景。怎得志？险做阶下囚；路茫茫，不见迷归梦。艳骨难逃终做土，无限悲伤无限情。

但愿我们的友谊使你愉快，借来红妹一片心，驱走愁绪一丝云。

红妹

1974年2月21日

a. m. 11:50

b.

周向红给黄项阳的信（6）

冬哥：你好！

万分恐怖地看到了“那件事”，我忍不住要将这一切告诉给你，毫不保留，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认为自己出乎别人和自己意外地信任你，你要知道，我是不轻易低下高昂了近二十周年的倔强的头的，更不曾称一个人为“哥哥”，一个与我无血统关系的人。

现在我需要写三封信，一个是小艾，另一个是男朋友，还有你。我觉得真正有必要的是将一切告诉你，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整个大楼，不，整个世界多安静啊！似乎只有钟表和人们均匀的呼吸声。不！此时，我胸中的浪涛犹如大海的潮水，十分有力地、一下一下地拍击着我的心脏。不将此说出来，我不可能入眠。但也许你看完之后会皱着眉头，说一声：不至于！不管你说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时间和纸张的限制，我简单谈一下，以后再说吧。

去年七月底，我认识的一个人提出了……要求，首先要明确，那时我是不爱他的。无法向别人倾诉的我，第一次从孤僻的性格中觉醒，我太孤单了！唯一的人是我哥哥。向阳的回答是同意，他们认识。这种感情的初次袭击，在一个未满十九岁的女子面前太强烈了一点，恐怕难以战胜，经过了一个月毫无结果的考虑，我同意了，理由是“他可怜”。我没有用应该花费的时间谈谈自己的内心想法，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向谁求援？这个人只有 21 岁，比我大 1y(按：即英文 year 的缩写，指岁数)我们相识才四个月整，关系就完全变了。他的父亲也有问题。当面，至今为止，从未说过一个“爱”字，更不用提“具体的动作”，这些东西，我不愿意看到，因为“我不爱他”！考虑到我的诺言，良心上的责备时时扰来，我以很平淡的来往维持着这种“一厢情愿”的关系，虽然“同属天涯沦落人”，但我总觉得与他谈不来，他所欣赏的与我所留恋的东西在感情上距离很远，为了 2、3 个问题我不惜纸张地争论过，这就像拳头打进棉花里一样，反应只是一味地退避。然而我一点也没有“胜利”的感觉，在我面前他显得跟弟弟一样，顺从、谦让、吹牛，搞一些叫我看十分不自然的小动作——宁愿自己当小弟弟。且放下他的面貌和身材不谈。

严格地讲起来，我是有过几天和几 h(按：小时)爱过他的，我承认只是冲动，是体内激素的效力。然而他对于这一切（有的我未掩饰，有的掩饰）似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直到这次回京后，我才将一切全告诉给他。在沪期间，10.1 和 12.31 我们见过面，其它时间我都不出去，躲避着他，很少写信给他。当时的实习医生繁忙的工作是一个学习的极好机会，可也成了我的十分合理的借口。“摊牌”的结果又是怎样呢？他把缰绳抓得更牢了，

回京后的信中，我让他原谅我的疏远和冷淡，并明确告诉他我并不爱他，现在只是以道歉为主。

冬哥，我一向把自己往“说话算数”的方面培养，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答应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的求爱。当我们沿着恋爱的方式向纵深发展加强相互了解时，他越来越喜欢我，我越来越不喜欢他，不可避免的分裂在 12.31（我复员离沪的前 2 天晚上）晚九时许发生了，我不理他，恨他，说他“一点也不好”，同时，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也有责任，恨自己的无知，恨自己的无能，我心里的确有一个“远大”的目标，我一定要爱一个自己真心爱的人！这个念头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因而它也许是平凡的，贫乏的语词使我一直无法描述出自己未来的爱人，洞察事物能力的低弱，常致使我束手无措。然而，“远大的目标”并未实现，也许会永远不能实现！？这一个多月来我的感情波涛从未平息过，彼伏此起，只有在给他的信里和哥哥面前才不同程度地流露出来，而在你和艾的心目中，我的这一神圣权利似乎从未动用过呢！

眼看着自己从成年一步一步地走向中年，这滋味还不知道怎么说得情况呢。我感谢一切人的好心，予以好报。但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爱情”的产生没有带来安慰和幸福，发展下去，不光束缚手脚，同时存在分裂的可能，别人们（包括艾与你）都在以全身的咀嚼着爱，吸取着力量，我不然，当成了一个包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幸福，我还未满二十岁就将自己的感情上的自由失去了，实在叫我难受。这不是心甘情愿地结合，似乎有谁强迫一样。寂静时，我暗暗发问，难道就这样老下去了吗？！他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他发誓不再会有第二个女性得到他的爱情，自然，他是满足的了，可我呢！！？

我也许过于讲良心、谈善意地痴情了，问题是：现在还不能说大局已定，也不能说相反的话，我假使决定不拒绝他，那就是九匹马也拉不动，不论自己怎样把自己真实的感情永远压在心底“爱”他！可是，我如果拒绝呢？他怎样？我如何？我的第二个恋者得知此历史，又会怎样看待我？！我自由了，幸福了，他却按照自己的誓言一辈子孤独下去，良心上过不去。家里人只有哥哥同意。论长相，也许我胜过他，但这是次要问题，他妈妈原

就同我有矛盾的。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两家都有问题：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命运。可我最近也意识到，相似命运的人在思想上不会是一致的。

亲爱的冬哥，别以为我“喜新厌旧”吧！别以为我被“黄家公子”的头衔迷惑住了。我只见过你弟弟，不能说（全面地）认识了。我很依稀记得的，不过是一张年轻的脸庞，不能承认爱上谁了。以上我说的，全是在不晓得“那件事”之前发生的，变化的，不过这种被爱称之为“直截了当”地作法，使我的内心再也无法向密友和冬哥隐瞒什么了，还是讲出来的好。再说，就是以后和你弟弟认识了，我也不能（谁也不能）保证我会一见钟情，不过先是把以前肤浅的好感变为一些较具体的友谊，以后的事情就很难预料了。也许进，也许退之。对艾，我是保密的，觉得她小，浮一些；对你，我认为时机不成熟。如果一通信就谈论这方面的事，恐怕也不太好。现在我决定告诉你们。

我很感激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也许过于直接地将一切都指了出来：你们的意思我懂。使人伤心的是，我老以诚意去帮助别人，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爱情可怜别人，而自己，又有谁来安慰呢？对人生，我学会了冷笑，对自己，学会了苦笑，尽管它们本质上都是苦的，而形式上依旧为“笑”！！

我与他都不愿意食言，但……冬哥，你能回答吗？一部分也好！别在“不好讲”了，告诉我吧。过去我隐藏的大概很深，需要发自内心的见解！其它问题目前尚不够关心。

R 妹

40, 2.24. 1—— a.m

周向红给黄项阳的信（7）

敬爱的冬哥，你好。

你的信终于在我手里了。我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等这封信整整等了几天哪！

一连看了好几遍，我的眼睛湿润了，视野模糊了。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才能表达清楚在这很短暂时间里出现的复至感情……冬哥，相信你，你也相信我吧！让我们手挽手、肩并肩地勇敢地“向伟大的目标”共同前进吧！通过我们的奋斗，来争取幸福，请你放心。对于这个“无价之宝”我永远珍惜，哪怕环境再恶劣，或者我如何绰绰有余，我永远忘不了冬哥给我的帮助和鼓励，这是任何别的东西换不去的。

我心里最过意不去的是给冬哥带去的烦恼。这件事出现的太不是时候了，不，也可以说很及时。在这一次小小的考验面前，我的勇气不够用的，多么需要别人的帮助啊！现在，我再一次握住了你伸过来的温暖的手，触到了你火热而真挚的心。啊，这有多么好啊！是的，我们相识晚了一点，未能早一些相互了解和帮助，否则，我们也不至于碰上连你也难以回答的难题。但我想，这样的经过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恐怕以后就不会发生了，吃一堑长一智，这样先“甜”后“苦”的味道尝一次还不够吗？

还是先回答你的四个问题吧。

其一，当时我明明知道不爱他，但希望以后会爱他。经少半个月的尝试宣告：这种感情使之升华太难了。于是乎放弃了绝大部分的气力，不再往这朵“花”上浇水了。我的信他倒是收了不少，而心呢？一直未得到。有时以为自己是很“爱”他了，可是这颗炽热的心一直未离开过我的身边。正是因为努力失败的缘故，我才浅浅地明白了，承认了以前不愿意想的事：我没办法爱上他。不是对他丝毫没感情，否则我也会丝毫不予考虑了。他不是也一度自称为我的朋友爱人吗？我哪里对他“食言”！？谁值得食言，谁不值得，我还是较明白的，根本的问题是我还以为自己会爱上他，或者已经爱上他了。

其二，有了第一个答案这也容易一些了。分裂，这是我做好的最坏的一个打算，现在已经发生了。爱情之火自然是他点燃的，也算得上熊熊了吧？可惜的是我只站在火堆旁，并未投身进去。

周向红给黄项阳的信（8）

.....

我这个可怜的“反对者”，到今天还不知道是她先爱你，还是相反。算了吧！

你那里有我的什么相片呀？我同你一样，“不喜欢照相”。过去别人给我照相颇有点“恳求”的味道，我嫌没意思，还不如看看书。现在没书了，照几张，亦无妨。只是理想的太少。我会结盟？嗯，也可能，不过照相的事我还是站在一旁欣赏的多，谁知道呢。我没资格去那么高级、环境秀丽的学习班，我最高级的是“省”，而不是“中央”。

单个教练的滋味可能也尝过，71.12.10 - 72.2.13（？）三个人“保驾”，广州的冬天很少到0°，可是我的心都结冰了，木得没纹的脑子里汁液耗尽……

革命，多么庄严的字眼！我同你没有什么分歧，不过你要知道，因为我的脑瓜子里什么乌七杂八的东西都有，好像是个大“染料铺”，红色的最多，这是肯定的，恐怕也是永远的。我佩服男性的优点，问题是“伊拉”并未成为我的东西，还不姓“向”。我同样的也瞧不起小市侩们，说心里话，我怕以后会陷在小市侩的包围中，整天在那个充满了油盐酱醋的味道、除了吃穿花钱就没别的事好说的令人窒息的环境里，实在是太可怕，恐怕会休克的，缺氧的。我们要奋斗、要革命，虽然两年前开始，革命的阴影不时的在我们头上盘旋，我相信自己还是同90%的人民站在一起的。同时我又感到，用不了几年，我们也会同最普通的市民一样的。高人一等？我还不承认，从我的外表、工作作风，确实也一直被上司视为一个“好同志”。但我实在还说服不了自己安心地去习惯未来的“艰苦生活”。天哪！我可能是用词不当，我不怕吃苦，我是真说不清楚。冬哥，我的这些话中孔老二和林贼的毒太深了，你说呢？我现在除了在“哥哥们”眼中，其他人眼里会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我一向痛恨装模作样的人，我“天生”如此，不会偷懒，我还不厌世。希望自己向上，尽力而为，特别是有了你的帮助、鼓励（以后可能需要加上向群他），还有艾，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同志，我们手挽手、肩并肩，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目标不能到

达？反动派的行列我是不加入的，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对现在的，我总有点“反感”，“谁人执政三十年？”我很担心这些子弟们会聚集成一个什么团体，若反现在这个潮流，我是袖手旁观的。

对自己父母的态度是革命与否的试金石。你呢？“他们”是谁？是指学习班的“治人们”吧！？“上阵”，什么阵呢？阶级的阵营吗？还是只是和“几个人”较量“败下阵来”，怎么个败法？什么罪名？你的意思含糊得很，我看不懂。矛盾呢！既要坚信“革命的必胜”，又要“拼着力做去，胜过他们”，他们是未变质的好人吗？难道“他们”和当今的统治阶级又是两码事？当然，看我们热闹的人有的是，我亦早已下了这个决心。只是我不明白究竟谁是“他们”？值得敬爱的冬哥如此，我要弄明白。尽管我非常信任我的冬哥，但手携手后，也不会闭上眼睛去上路的，盲目地前进决不是咱们的主观愿望。我发现咱们（不知道你看了下面的话后是否同意这样写）虽有革命的愿望，可是对现在的处境及周围的治人们的态度不够“正确”。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脚下走的路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我这样的认识对吗？我等到挨批判。

对自己父母的态度，我很想知道一下别人是怎样的，我还是先谈谈自己的态度吧。我，XXX的二女儿，向来佩服父亲（废话！人人几乎如此！），”九.一三”后，我彻底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认识了他，我也恨过他，批判过他，不过他要是在生前讲一句“反动”话同我，那我会更“有的放矢”，更有“持久性”。现在对他，我是想的少多了，因为那么多现实的问题还缺少解决的方法，那么多活人还想不过来，“死人”嘛，暂放吧。我想对他，我是很典型的“一分为二”的态度（即所谓“超阶级的东西”），一切都坏也不是，但他的立场是错误的，故最容易的方法是把他拨拉到资产阶级一边去，假如别人不来询问，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倘若问，则毫不犹豫地回答：反革命、叛徒、卖国贼……云云。这当然也是最正确的。为什么我总不如“工农兵群众”那样仇恨“这帮人”呢？我一闭上眼睛，银幕似的的脑海里这一个个人的面貌，仍是他们过去的样子，我“骗”自己，想象这一具具焦尸，，不行。我编造的画面只有人民大众才会相信而偏偏自己不信，眼见

为实，但很多人都死了，这是真的。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这个“命”怎么来革法呢？一个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一个是“迫不得已”，因为后退是“没有出路”的，而参加革命行列，强迫自己口是心非地说出另一个阶级的语言，而在实际上仍是替没有成功的“571”叹息，幻想着有一天……甚至暗地策划……冬哥，后一种实际上不是革命的，归根结蒂是反革命的。我还以为，留恋过去的奢侈生活是对无产阶级思想在物质上的叛变，也是思想上叛变的基础，能生活得好一点，这是每一个（包括全国每一个）人期望的，也可以说为此奋斗的。什么叫有意义？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这只能叫做有“意思”吧？当代的意义无非是投入进革命的大熔炉里，脱胎换骨。口头不会满意的，只有用行动。例如知识青年们，我是决心、并有准备去过（比过去）艰苦的生活，至于到底怎么样我还不十分清楚，你能开导开导一下“糊涂”

.....

总之我啰嗦了半天，是想听听你对这件事和自己父母的看法。不过，我有理由怀疑你的：你的相片：“和我唯一一张跟父亲珍贵的照片保存在一起的”，这“珍贵”二字，是因为“唯一”，而是因为……？

我还有这样一种感觉，不知你有没有？学习班的组织者和教育者虽是代表“党组织”来任职的，对他们总看不惯，心里别扭，因为他们是直接干涉我们言论自由的“罪魁”，“我们相信党的政策，相信革命会胜利，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但是你凭什么这样……”似乎非得主席亲自来发表演说词才能使我们“心服口服”，“党”亲自来给我们办班才能让我们里外都“规规矩矩”似的。我办班时，总认为“这些人执行政策不好，”“热爱党和祖国、热爱主席”这成了我们是革命接班人，是要革命的最强有力的证据，最好的自慰。这些你有同感吗？

又及：

还有那件小平的事，我不十分理解，为什么一定要“主动”才行？可能我那个“最好

的办法”非最好也。

我怕是又想得太绝望了。（我还未告诉艾。）

农村，这是两个致我的政治生命于死地的字眼，因为什么青春、理想、幸福、自由、愉快都不会有的，能否糊口还是个问题，老天爷！我还未羡慕过“农家乐”呢。我一直认为，给自己种庄稼、打粮食是在他们眼里高于一切的，而那么多的土地，种上了口粮，未必就不能再多种点；打下的粮食上交、卖给国家也未必不可。但说来说去自己最重要，其它的东西不过是一个装饰品罢了。真真可恶的农民意识！大寨花何日开遍？猛烈的海风，带有咸味的沙土，这些当年的“致敏源”又会再现的，我怎么能老靠着“抗过敏药”生活，头痛。

回到北京后，我是不去幻想怎样当个医生、怎样上班、同病员打交道的，这些都没用，枉费心机，人家的思路与你不同吗，“工作”早就安排好了，希望、绝望两者斗争着、厮打着，现在更激烈了。原我是打算分配我什么工作就去什么单位的，除了遥遥相望的房山县东方红炼油厂以外，听说李先念有一个讲话精神，讲咱们这些子女都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锻炼，没吃过苦嘛。北京市委似乎也有这个精神，即全部去农场。我只要不改掉行业，再差能差出北京去吗？可是疏忽了堂堂的“空直机关”的权利，岂能容你？！我疏忽也好，不疏忽也好，人家要动手的话你也只能任其摆布。不知怎么回事，老有一种乌云压顶的窒息感，心自然是沉重的，情绪也烦闷极了，几乎又是彻夜未眠（我弟弟回家来了，睡觉不方便“谢谢”他们，这种局面很快就要结束了），脑子紧张地活动着，好像设立了一架电子计算机，好几天没祷告了，现在心里不分佛、伊斯兰、基督、天主教地乱哄哄响成一片……。

我知道，你又要大皱眉头，其它的事你没法管，那件事你是能管的。为什么信的内容老与我的心相违呢？我想不通……啊，头真痛，天已经亮了，我需要睡一会儿。

红

74. 3. 4. a. m. 6:37

周向红给黄顶阳的信（9）

亲爱的冬哥，

你的来信收到之前我已将一切都想过了，结论竟与你极相似，真是怪哉！不错，我想得太多了，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矣。这能怪我吗？那只手每隔一段时间就伸过来搅动一番，可恨之极，眼睁睁地看着它往来，而没有力量阻止它。

还是先回答你的问题吧。妈妈在什么地方？也许在空军学院，可能是空军班，我们与她毫无联系，究竟现在如何？勿晓得。同二世（按：指我哥哥）跑了许多地方，为的是查清我们到底归谁管，因为司令部办公室说“人死了，归门诊部管”，而门诊部又否认，说要请示上面。在没有得到答复前他们是不闻不问的，我们像个球，悬在半空中，落到哪边都被踢回来，成了个“无头案”。为房子、也为报户口（现在他进来都是很麻烦的）。六九年及六八年空军组织人去“五七干校”时不管本人同意否，全部迁至黑龙江，事先根本不征求你的意见。当然，现在“决定政策的人们”又调换了一批，而且有党的政策在上，大概不会……可这批人有不少是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过的，打定主意整人，只要有权是办得到的。消息是向华说的。他插队的伙伴里全都流传，要知道这是一批空军干部子弟呀，使人怀疑之处：人，（指在班者）先不出来，家先搬。有人猜测在半年内行动，我也不清楚何根据，早不走晚走呗。晚走的话如果向群来信的话（到现在还没有），如果我们建立了友谊的话，我怕太折磨你和他的神经，我自己可以忍耐一切的。要是先搬家，护送着只有我们三人，奶奶我让她去哈尔滨亲戚家，这倒没什么。冬哥，只要兄弟不动，我也不走，且也不会让我一人走的，正如你说的一样“没什么意义”。还有一点自慰的，大院其他干部子女也未分，我决心等（实际上是耐心等三个月，三个月对我们这些人是算短的）。

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我只看了前三次。战斗，那还用说！问题是我们的对手（永远？暂时？）力量太强大了。不知此次是逆行还是顺水，若为前者，再冷静、果敢也白搭。是吧。

那也只得宣告投降了。迪克有一个有利条件，他所在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只要你有钱，那你就有言论自由。他还能演讲，还照样可能以“副总统”的身份坐专车到处跑。他有一个党的支持，……我们差的太远了，无法比拟。但他的战斗精神（我一向赞成对任何事物一分为二去看，这不叫反动。我们又一致了。）我们必须学习，这是无论哪个阶级都需要的，当然首先要具备一个冷静的大脑，客观地判断，不走极端。对“实事”采取“求是”的态度。如果真的回老家，我只算“迫不得已”。在自己的名字前面永远保持“战士”的称号。天性是不允许我逃跑的。冬哥，武装部的门你恐怕未踏进过吧，我好静，最怕人多，一看见那么多人头晃动，烦死了。人多嘴杂，哪里顾得上你？且去问的话叫“亮相”差不多，这也是“不在乎”的一个因素。我听你的话去跑一跑。还有，“粮食供应证”在我这里，也就是说户口在我这里，不经我的同意谁也拿不去，因大院不给落户口，武装部是不收的，他们让我落到工作单位去。今年海淀区干部子弟一千多（几个大院都在此），分起来老慢的，反正人人都想去好单位，有的啰嗦呢！谁（到了这个时候）还管什么“不正之风”、“反潮流”，“我”字当头的人“么老老”。

亲爱的冬哥，你想得不错，可是你没有考虑到如果向群和我只是一般关系呢？那时候我回原籍，谁来“救命”呢？下面我有点不敢写了，反正，但愿能呆在京城，“伪造危机”也好，“吓唬老百姓”也好，我都愿（和弟弟）承担。

人在精神世界里是应该树立一个形象的。俗话说：有个依靠。我现在只有（也只能）依靠你了。就目前环境来讲只能从纸上获得“圣旨”，虽然很不能使人心满意足，却也实在难得，二世至今才刚刚晓得要搬的事。“念天地之悠悠”，只有你了。也许，在大家正在挣扎的情况下，我会如同一块石头系在你身上，使你也往下坠，这真是天大的罪过了！回我的长信，我请你尽量不去想后来的几封信，仍按照信的内容来动笔，此事暂不提，有变化我及时通知你。这点想必你放心的，为了回长信，你的信2次/周是可以的，但不必打“持久战”，因班长已经提醒你了……，对艾的转告我告诉她，我的信（只要礼拜一能收到你的信）基本定于一寄出（p.m），三的a.m使你收到。这次虽无“指示”，但我定的时

间已到。信纸是这样的吗？这种信纸我只看到东风市场有，0.35一本，是上海出的，西、东单无。王府井及前门未注意。你是要样子吧？让朋友买？上海我也有“朋友”，不需要什么东西。前途莫测，买什么呢？这封信不敢有什么“？”你不要太辛苦了。信首，你无论用何种称呼，我都在信中深深感到你用一颗兄长的心爱护我，写上“可”字就不必涂抹了。日记是以前写的，故在这种气氛中显得不伦不类，因为是写着玩的，不寄，就成了历史资料了。

祝我们虚惊一场。

红妹 3.8. 下午

周向红给黄项阳的信（10）

.....

书是永远看不完的，我真发愁。我想对作家们下个通知，“请你们写得稍微慢一点”，我也想对边防检查站的人命令道：把各国的书放进来！可惜这些话只能当梦话说说。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书迷，“悠悠万事，惟此惟大”。书也分许多种，我最爱看小说了，而且外国的小说更喜欢一些，但俄国人写书太啰嗦、太细腻，他年我若为俄皇，一定要让作家去造机器，这样俄式机床就不会又大又笨了。大概是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缘故，或者是因为离我们很近，外国文学作品堆中有不少俄国人的书。唉，说起来也惭愧，我才看了几本（外国）书啊？还摆出一付评论家的神态，真羞煞人！

作家是很伟大的人哪！难怪列宁要在发给他们面包的命令上签字。他们要感动我是不难的，那么多作品当中，我又喜欢曾经历过辛苦与危难的人写出来的东西，这里面也有他们的血和泪，这是真实的描述，深广的概括。我怀疑一切，我不相信现在这个世界真的如广播员、印刷厂所讲的那么美好，而又没有人能从另一面告诉我另一面的东西，于是我不

自觉地在外国图书中寻觅，看看那些人们又是怎样分析世界的。我一会儿看看书，一会儿抬头看看四周，或者找其他人聊聊，我既不想凭此生活，也无人督促我，虽然这办法十分原始，却也还合个人的口胃。

看书的目的就是学习。我佩服看得进、记得住政治书籍的人，他们可以把书中的道理同自己的思想糅合成一体。而我无论怎样也达不到他们的程度。我没兴趣，只求表面了解，不愿花费一半看小说的精力来研究其中的哲理。在政治上，我永远逆着学习，顺着前进，也就是说，手里拿着直切的答案，回头翻看历史史册，这是很不好的，要想不落后，不过时，就要永赶政治上的“时髦”，应该承认，我会控制自己。可是在书面前，我的这种能力就消失了。真奇怪！人家看我十分喜爱看书，也许会询问几句书的内容，啊，我看书的速度是十分快的，小弟看见我看书老是笑：眼球左右（横排）上下（竖排）活动，一只手托书，另一手只做好随时准备翻过一页的动作。我分析了一下“快”的原因：①书太多；②时间太紧；③引人入胜；④平淡无味。正是因为快，我连作家的姓名、性别都很少过目，只记得书名还有其中的情节。囫圇吞枣者，向红也。

列宁说《怎么办》这本书好，我也看了一遍，因时间充裕，从头到尾看了二遍，纯粹作为故事看。这是一本令人心烦而不紧凑的书，因这次抱着“不是看故事”的念头去看，竭力捕捉导致列宁夸奖的思想，显得十分费力，越看越糊涂而老忍不住翻一页。第一遍后脑子里的东西都互相换了位置，那个乱就不用提。我合上书闭目养神，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没有列宁的那种思维能力，我看不懂。一赌气，“干嘛用别人的眼光看事物，我就不信我看不懂这本书！”我硬着头皮又翻开了第一页，好像有人命令我似的。我渐渐觉得这本书并不是如同第一遍的印象那么糟，也不是同前言讲的那么好，究竟是什么？我忘了，你要知道，年纪一大，记性也差，况且我在世界上的职务并不是看书，而是“卖苦力”。

对广泛事物都有兴趣，并对此同别人交换意见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为了自己的缘故，我“气忿”为什么小说读的进，政治及技术书看不进，莫非记忆力真有选择性？也

正因为我爱看书，因此憧憬着自己当个作家，写实，写自己经历的一切，学巴金、曹雪芹的样子。可惜我缺少生活的丰富体验，缺乏写作技巧，缺乏一个作家所应具备的一切美德，特别是耐性和毅力。于是，我又把注意力转向写杂文的人，我又喜欢上了鲁迅的作风。爸爸不是讲过我的性格泼辣、尖刻吗？对！我就学鲁迅！呜……！轰隆隆隆，轰隆隆隆！一天之后我成了医科大学的学员，而现在，我就成了医生了……。

啊，已经快十点了，做完了这个“梦”，该去做那个“梦”了。待谈！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

是啊，人总是要死的。为什么死，这成了我们关心的问题之一。记得六七年我偶读到这领悟。事隔七年了，记得当初还写下一篇心得，如今也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但至今还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要像诗句中的讲的那样去死！为这，爸爸还说了我一顿，“一个十二、三岁的毛丫头，老想死？！还是想想你怎么活得更更有意义，把学习任务完成搞好吧！”真的，我考虑这个问题是太早了。

谁都热爱生，听说上吊的人在窒息一瞬间是非常后悔的，因来不及只得死去。“回光返照”大概是死前后悔、惋惜的集中表现，但也是徒然挣扎罢了。

似乎自从知道了诗后，我的心灵上就烙下了这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开始了死的向往。

“死是神秘的，晦暗，不可捉摸的空洞，不可预测的无限。死是安宁的，幸福的，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可怕。死的净土上，才有永恒的、不变的世界，没有纷扰、也没有痛苦，有的只是绵绵无极的死的展开，生的消灭。”

“啊，这真是个令人向往的去处！我多想去（像逛公园一样地）游览一番然后再回来呀！”这简直到了病态心理的程度。

活的很自由、美好的人，是不会想到死的。我想这个问题最多的时候，也就是七一年底七二年初，那时因意识到吾之死并非“照汗青”也，故此念弃之。我老是幻想着，自己死了后会如何纪念，有多少人悼念我。一次竟提笔计算，结果是寥寥无几，失望地将笔一丢：这几个人？我才不死！等人再多一点吧。（“哈哈”，你看到此处必定会发笑“真是

小孩子脾气！”）于是迈步走出室内，在亚热带阳光的直射下，我感到了四周的生物生机旺盛，“为什么要死？难道我不如那些植物？让它们来取笑我？！不，我不死，决不！”我感到了“不死的幸福”，这幸福使我热泪盈眶。（你会想——红妹神经失常？！）这样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人为地将死神与“活神”（可有？我想不起伊的真实姓名来了）放在一起看他们搏斗，像古罗马欣赏角斗士的厮斗一般，享受野蛮的快乐。

希腊神话中的死神是穿黑衣服的老太婆（我没记错吧？）这使我十分沮丧（我特别反感老太婆的嘴，因此决定，如果明天我将变成老太婆，那么今晚即死去）。我脑海中愿意把死神装扮（她接受吗？）成冰姑娘的美姿。我认为死并不是衰老的标志，应是它的后果，“死尸是人类之冰”，这是雨果的话，我很欣赏。人若想死，其心必已结冰，死之前，心已死，那时他已不再想如何生存了，而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死。死——冰——白色，故应该是冰姑娘那样，苍白、冰冷、残酷。你说我这想法不对吗？你会说，死是地狱呀，是黑暗之都，难道就没有天国吗？有。

确实，要死得值得，平白无故被汽车压死，或坠落失足于深谷，或错误服毒，或偶然遇难，这都不能说“死得其所”，居里是让马车压死的，人们因纪念他的死而继纪念他的生平。

为信仰而死，是伟大的，当然包括什么政治信仰都有。人，应该坚定，将一条路走到底，所以我欣赏赞叹 zh（按：指周宇驰 u）之死，而决不欣赏赞叹 L（按：指李伟信）的投降。贪生怕死的人是最可鄙的！

我要继续生存下去，我知道死神近三年来一直在我身边打转，企图抓住带走我。我将会在今后同她做殊死的搏斗。我并不是孤军作战。青春是无敌的，即便是死了，也要对得起祖国——亲爱的祖国啊！我决不背叛你！

我不死，这是无疑的了，但我想“研究”LDD（按：指林豆豆）之“死”，她为什么……？

周向红给黄项阳的信（11）

亲爱的D哥：

我原以为，“向红”的大名不过只有你与向群知道，哪里晓得林（按：项阳二弟）与滨江（按：林的女友）都知道了，你怎么搞的，“问我好”，啊！万分感谢！看来我不可能知道这个为什么了，真是莫名其妙，打了个被动仗，俺也来个“礼尚往来”吧，说我很感谢这些友好的表示。不过，我得瞪你一眼……

耍脾气？呵，我不会的，你看了我的上封信就会明白的。向群做的对，那个“决定”，无论什么内容我都是赞助者，好像我已经写的很清楚的了。况且冬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对你重复一遍完全是多余的，既然我是非常相信你的，那你也该（已经这样了，对吗？）很相信我。你的胆子真大的吓人，明明人家讲“等一等”，你却来替他求爱了，还把我的（“你的”）信寄去，你尝不出来这里会有压力的味道吗？唉，你犯“错误”喽。“有必要”？什么必要呢？为了事情成功吧？我已经正确对待了，对吗？不错，“红妹不是一个不通人情的人”。

对于你的第一个回答，某些方面与你近似，但因为二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一个是高级，一个是走卒），所以有些地方也有差距，这是必然的，“不愿用笔写”，好吧，我尽量不引诱你在信里谈这些问题，或者毁掉。对于敢不敢说或写，并不能说为此存在或不存在，说或写出来。不过使这种思想的存在方式又多了一种。如果事情闹大了，多了一个“揭发”你的人及材料罢了。哈，我会揭发你！你相信吗？我不信！一切都化成清烟消散了，我们的信里不过只谈“爱情”罢了。

说真的，至今还没有一个咱们这样的人在政治上认输而叫我遇上，有没有人说过“破罐子破摔”的话呢？有！但不过是“口非心是”，其实个人的表现仍或多或少是要上的，是不甘心毁灭的，这，也相互影响和促进。

哈姆雷特骂其母好像是在其游戏中进行的，我记错了？为什么问？不过一点小事，简直不值得一提，免了吧。

同我一样的低？你那里晓得，我的信纸“多来西”，好几种呢！没啦。你写出来了，我转，我意见如何？你不是说听我的“话”吗？怎么忘了？出尔反尔。再问问艾。

哎，差点忘了，搬家的风未断，我准备在万一情况下住招待所。

如伊通知到，速告之！

哎，差点忘了，搬家的风未断。我准备在万一的情况下住招待所。

同样想见你的红妹

74. 3. 23

a. m. 10

问你，已判此死刑，今日烧信。准备烧掉，但今天忙了点，故

伊通知到，速告之！冒“风险”寄去，见后！我 pm 再写一封信经 D 看。明 a. m 寄出，等我的回复！！

周向红给项阳的信（12）

亲爱的 D 哥：

已收到我的信了吧？说起来好笑，本想在那张信后面再写上点东西，才是北京时间 10:30，距离奶奶取牛奶的时间还有 60'，我每天让她 11:30 发信，时间上讲是来得及的，所以我忙在信纸的左下角写了几个赖巴巴的字，其中有两字：“见后”，但写完就“忘了”。我面前堆放着一百多封信，还有二百个以上的信封，虽已烧了几十封信，但必须抓紧时间完成，以防万一于是乎连同其它的四封信封好，交给了她，这个“见面”就不是见纸后面

了，而是以时间的前后论的。不过也好，让我充分地思索了一下，省得写的没头没脑、乱七八糟的。

既然你已经收到了我的去信，许多问题可以在此“省去”不谈，对于向群的决定和D哥的建议，我同意，并努力去作。这一点是你切盼“我们会一致的”。故先讲明，否则让你的心忐忑不安、虚实莫测，连我的信里其它问题都会“不”看、不考虑的。

D哥，我不是说过让你“祝我习惯”了吗？我对从“爱”开始的道路是不“习惯”的，不知道这条路从何时走起，我从来没有让别人介绍去认识一个人，而这个人是以特殊的地位在我目前及未来生活中出现的，请相信，我如果很顺利（不费这几次周折）地同向群建立了通讯关系，我的“本性”也决不会对一个我不了解（尽管你介绍过）的人讲出那种话。假使有人（非指群）这样唐突，没有头脑（算吧？）地对我说这种话，哼，我多半不仅不理睬，还死了同他往这方面发展的心。况且向群各方面都较成熟，老练的多呢，我决不信他会首先这么做。如果这个问题成了你们兄弟的担心问题之一，我想现在可以稍稍放心了吧？“不用‘爱’这个词框住，有些想法我们一起来探讨”，不错，我就这么打算的，跟你说过吗？我在很多问题上仅与你一致，某些想法也与群不谋而合了。

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客观的现实主义者，对什么都一分为二，怕也是阿拉之做人之标准，对无所谓的赞许是要起疑心的，我不能容忍自己盲目地干一件事。

（小余——你已从我的日记中晓得——又闯入，这项工作停止了4个小时）

是不是能做到这点呢？历史会下最后的结论的！（口气太大了？！）

说实在的，我看完向群的第一封信，脸都红了，我也陷入了幸福的（政治上）幻想中。被“宏伟的计划”深深吸引。我想，要是真能这样，该多么好呀！？我收回自己的意见，答应你的求爱，而能享受一种“拯救”一个人的快乐，该是一件美事。大概上帝才会同我交流“体会”的。我脸羞红了，觉得这个幸福之峰高不可攀，站在它的脚下，不禁为自己的轻率举动和不好意思，伊不是认为我太热情吗？这就显得我太幼稚了，没有很好地思索就……。

你对待诗的回答及评价，我看最好能给 A 写封信，我转寄。依晓得，我这支笔下水很不畅，现在，最近几封信全是蘸水笔乱画的。另外，，不管怎么说，我深信爱人们之间只要一看到对方的字迹就会产生一种看到别人字迹而产生不出来的感觉——这，我不用多啰嗦，不言而喻了。

D 哥，你看我最近的信写得很乱是吧？我四周也是“危机四伏”。上个星期末开始，我又整天奔走，为朋友出谋划策。有人看了我的行动，开玩笑说：庸人自扰。我好像在执行一项命令似的，不这么做不行。不错，，我心太善了，原谅我暂时无心思、无精力将“危机”的前因后果告诉你。我在竭力挽救着自己的朋友，睡得极晚，2 或 3 点。好像不知天下还有“吃饭”这件事，两天只吃了一磅牛奶、一盘炒白菜，七只饺子（我讨厌吃面食），一点也不想吃东西。幸好肝脏的糖元分解和糖元异生作用强些，不至于（虽险些）晕倒。等这件事过去了，我再告诉你吧。

附寄 A 给我的信。看后随你处理，你对她说的话，她听见了，在信里也谈到。

我的日记改名叫“胡说八道”罢。暂停。

祝我们大家好！

十分理解你的 R 妹 3. 26. p. m. 6

（你的“D”字花式写法像个老寿星的额头）

周向红写给黄项阳的日记（1）

好像今天谁惹了我似的，一个人坐在那里沉思不语，前两天的高兴劲全没了，古人曰：兴尽悲来，这就是吗？

“悲”、“乐”，多么折磨人的两个字！好像被王母娘娘用钗头划了一道似的，在我薄薄的史册上，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字迹，心情和记载。而它们之间吻合的是多么紧凑

呀！“71.10.14”这一天里那值得纪念的两分钟，一分钟前我还那么活泼幸福，一分钟后就落入了深渊，从此，身后的“高山”变成了眼前的高山，那不得不不顾一切地朝上攀登。幸福之神面带微笑，合掌坐在群山之巅，俯视着无数生灵，她的微笑是残忍的。

“悲”、“乐”这两个字体体会得多深哪！从前，我是“悲中会乐”，而今是“乐里有悲”。难道我就永久地失去了无悲尽欢的权利了吗？过去，由于全是甜的东西，我也搜罗人们悲切的呼声和诗句，其结果是觉得自己非常幸福的，想尝都尝不到悲的味道。如今，已经两年多啦！我过去寻找的诗句用以描述周围一切是很适宜的。吸一口气，苦的；喝一口水，苦的；苦，苦啊！似乎世界上所有的味道全在我面前消失了、退去了，惟留了这个——苦！

人们埋怨我们，指责我们，“立场、路线、阶级、革命与否”，质问的时代已经过去，我总算离这些人们远了，我是个“自由者”啦！

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留下道道伤痕在我们年轻的心上。我们的胸膛被剖开了，心被检查了一遍，多么残忍的人们！对于我们痛苦的呻吟全然不顾。两年过去了，人们又回过头来质问我，怒斥我们的思想改造得太不理想。他们奇怪，为什么这些子弟们总是同过去“不忍”一刀两断？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些“愚人们”呢？

《共产党宣言》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说得多好、多明白啊！我不禁独自赞叹起来。自称为“马列主义者”们，你们可曾还记得？能够回答你们问题的人正是你们自己！“存在决定意识”。我们的一切不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吗？我们站立的经济与政治地位，不是你们指定的吗？我们一切都顺从了，然而结果仍是不能令你们满意的，请问，你们究竟对什么满意？啊！不用回答了，你们脸上的表情已将答案揭示了：你们永远能从我们身上挑剔出不是之处！除非我们死……

不，我们不死！我们要争夺一个公民的全部权利，靠我们的双手！对付我们，这也太

容易了！然而你们并不是英雄。

“悲罢壮情注”，乃“悲壮”也。我看不清，想不通，但总有一天，一切都会一目了然、水落石出的，我只在真理面前低头。“Red”？不对，我不是什么“软的”，我要做个勇敢的姑娘！

“向红”，哥哥扭头冲我唉到。“唔？”我仍在写着，并未抬头看他。“我觉得你这次回家有一个使我不满意的地方，咱俩的观点老一致（此时我惊奇地停住了笔，抬头盯住他）。我觉得这样不好，应该争论一下才有意思。你说呢？”我咧了咧嘴，“说”不出来。

天哪！哪有这种道理？——观点一致“没意思”！他一定是被邪念迷住魂窍了！他想演说，想与别人辩论并压倒别人，想胜利，总之，他想“高人一等”。我预言：如果他当上了首领，其参谋长定是个反对派头头，哼，让他“有意思”去吧，等着他的只有“垮台”。为了自己的正确，不惜让妹妹站在“错误”的一面；为了“泄气”，不惜诅咒自己的哥哥。啊！这一对兄妹！

3.19

周向红写给黄项阳的日记（2）

.....

向红，这服务员站在这也不嫌别人看她——好几桌没饭哪！我扭头去看了他一眼，然后又把目光移到窗外楼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不知为什么说了一句：饭还没熟呐。

似乎是为了证明我这句话似的，果然半天过去，没饭吃的依旧呆坐着，那女服务员仍滔滔不绝地说着话，夹杂在碗碟碰击声中，显得格外刺耳。我简直想逃跑了。忽然，她闭住了嘴，扭身向屋里走去，对旁边伸出了的买饭的钞票视而不见。我暗自透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可走了！”哪知一会儿她又手托饭菜“热”气腾腾地走了过来，放下一盘红烧鸡块，两碗满得冒尖、不能再加一点的白米饭。我心想：“好家伙，要吃半斤？！”与此同

时，斜对面的桌上传来了服务员的话：三两饭吧？那位“时髦”女郎“娇滴滴”地粗声说到：“三两饭这么多呀？我吃不了呢！”我不禁用目光将这两个“三两”作了比较，“时髦”女郎的饭实在太多了，难怪她要说话。我忍不住想笑，“这女的真不知趣，人家多给她点，还说出来，岂不要那女的好看？”小余这家伙，看见我的嘴角牵动了一下，就凑过来悄悄说，“这种事多着呢，谁都有点小权利。他（她）们认识的人，饭来得早，给的多，特逗。”我瞪了他一眼，把嘴凑近他的耳朵：“哼！将来不认识他们的人还要给小费呢！”此时，我又想起了“公章不如私章，介绍信不如一根烟”以及反对“走后门”的呼声。

看着女服务员殷勤细致的招待，跑来让那男的去听电话时的表情，不禁想起了《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中的话，的确，现在人们的觉悟还不如文化大革命中那么高、那么“左”了，是错误的倒退，还是“正确的恢复”？追求“美”，赶“时髦”，是“生活水平提高”，还是“走下坡路”？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都迷恋于女性，沉醉于饮酒、打扮，自以为“美丽”，得意洋洋地在大街上东游西逛，革命的激情再也不能引起现在人们的胸中的共鸣。他们眯着眼睛奇怪地看这这“激情”，好像在说，“干嘛那么激动？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得很好了吗？难道我们不是在‘革命’？”回到北京，最刺耳的是妇女们假小子似的北京话，最刺眼的是服务行业的张张“横眉冷对”的面孔（似乎已知道了我的身份），真像欠了她二百吊钱似的。第一次我还真以为少给了钱或者说错了话。次数多了，也就知道，这是北京服务行业中的一个“通病”，这是她们的“职业病”——“了不起”（尽管在背后少不了说几句不满的话，用羡慕的眼光叮嘱工人们的背影），你得“求”她，（男售货员好像稍微好一点，不会是因为“异性相吸”吧？但愿他们马列学的“好”！）当然，谁也不敢得罪她们。

大概是因为搞医的，所以看起人来免不了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她们支配眼球活动的N（按：指神经）有点“毛病”——斜眼看人，全世界对她们来说也是不屑一顾的。同时我发现，她们不是感冒+头痛，就是鼻子里长了“息肉”，说起话来哼哼唧唧、皱着个眉头。另

外，同她们打交道必须“见色行事”，否则就是一个大“钉子”。千万要和气，不然的话她们会将你的“罪状”通过喇叭似的嗓门“公布于世”的。

在她们面前站着，我还有个自从打交道以来就产生的夙愿：变成一个年轻漂亮的男子。真的，那时她们就记起了自己还是个未婚女子，“假小子”的嗓门变温柔了，脸上的怒气速退，浮上了天晓得打哪里来的“红云”，自然，卖出去的东西也是精选的。啊，老天竟让我扮演“旦角”，你要知道，“旦角”经常买回烂水果呀！只能怨自己“没有口福”了。

马克思的神灵保佑，“开会时座位上放手帕”的景象千万别在中国再现！阿门。

值得自己暗暗庆幸的事是：①吾之成份知者甚少；②吾双亲临走给我一个还算“体面”的二世。

今日 P.M 我去安办了。冬哥，结果仍是“等”。还有三十多个女兵（搞医的，见鬼，肯定大部分是护理员）未分，总共分了 300 多名，分布 60 多个单位，我们属于“自然减员”，其实就是补空，即“人口过剩”。卫生局尚未下来指标，指标的具体内容及其具体时间都不知道。卫生人员才分了七、八个，到最后如果实在不能“对口”，那就只好“改行”。这些是安办负责人同我讲的。他对我挺热情，实际上我是以聊天的形式与他谈的。他（在知道我入伍后的经历后）说：那你一定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喽？我说，再等几个月就没了。他笑了起来，对解剖很感兴趣。

上封信忘了：仲秋、金秋去年（73）复员，仲秋今年 2.28 宣布的，金秋已回来。

不用回信。日记已堆积了。

3.23

周向红给鲁莹（晓艾）的信（1）

晓艾：

接到你的信已有几天了，因向阳、向华在家，头脑乱哄哄的，理不出什么头绪，也无心思写信。

处境很糟糕，是吗？你给向阳写信（对不起，叫向阳的人多了一些）来相互联系的吧，听小弟说你很高兴他带去的那个无字迹的信封，还要吗？我可以帮忙的。

我觉得，我们的政治地位不比从前了，父母的生命是否存在也帮不了自己的什么忙，所以现在自己应该把自己看成大人了，要求严格些，还凭着一时冲动办事，容易被人揪住小辫子。当初我想，有黄向阳在你身边，你们是知心的，可以互相帮助下，提醒提醒。有个什么事也能替你出个主意，安慰安慰。但是小艾啊，情投意合时可别忘了“山外山”，“楼外楼”啊。固然，风景秀丽，但这决不是谈情说爱的最好场所；那美好的感情，也不是抵挡侵扰的盾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说过，不再“谴责”你们的事，我现在也不想谴责，我只是劝你们掌握住幻想的缰绳，驾驭好感情的野马。

另外，现在他们这样一搞，看到你心中是不满的，张宁与公子亦可能不例外。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了，人们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以口中朗朗的“毛主席语录”声，压住感情的喷泉，盖过个人天性的自由呼声，反正我是不会的了。今日你整我，不知明日谁正谁。我确实不知道你们是否有翻案的思想，我嘛，既不去为翻案做积极的努力，也不反对历史的变迁。胡司令说：他不满意怎么着？！是的，我们的命运在别人手中掌握，满意与否的权利早已被剥夺了。我不想教导谁去耍什么欺骗的手腕，灵活地运用你的聪明才智，熬到学习班结束吧！“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宣扬自己，也不无中生有地贬低自己。但我也明白，有时我们真实的实事求是态度往往换来不信任的反应。

你们搞清算、交代，别人呢？

我的话不一定对，也许还不如“参考消息”有价值。

向红

七四年元月二十九日

9时20分

周向红给鲁莹的信（2）

可爱的友：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Q（按：指项阳的三弟向群）来信了。我无法回。你再好好看看信，别像跳少数民族舞蹈那样一转圈就不管了，你的眼球运动十分灵活啊！

D 让我转告你“四、日别去寄信。”是怕碰上你吧？为了让 D 速速看到你的“混合曲”，我给你的信晚一天发，日你能收到的。还有你的诗我改了一首韵脚，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盼吧！等到我们欢聚之余，你将我给 D 的信拿来全阅一遍，那时你什么都会晓得的。信已经封上，我自家阿勿晓得了。

“资料“？我只询问一个日期啊，如何谈得上”资料“？因为那天翻看我在沪接到的你的信，竟不知道这个明确日期，着也叫朋友吗？别人危机当中，我却傻乎乎地，啊，啊，你慢点讲，劈里啪啦这么快干什么？“D 的一套”？我正暗恨自己学不来呢！你不是一想起来就“心打颤”了吗？我这个医生生怕你心房纤颤额，随后一命呜呼，故只取一个日期也。我何尝不想知道自己的朋友所经历、所知道的一切？拼命克制住手中的蘸水笔。我要等到那一天，当我面让你谈个够，讲个透，如有“生命危险“，吾速救之矣！

你一定微笑着心想：这个老东西怎么又高兴起来了？对了，下面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高兴“的原因吧。

① 搬家仍无官方通牒下达，依可多饮几日家乡的“清泉水”；

② 去安办（按：指复退军人安置办公室）一次，得知还有 30 多名女兵未分，海淀区一千左右的人分了 300 多，分布在 60 多个单位。我们专等卫生局的“指标”下来，然后分，卫生方面才分了七、八个人。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只是 Q 至今未来信，我也“急”了起来。没得到他的个人表态（尽管冬哥一再说，伊布勉强，去年伊已同意，问题不大，等）我总归不放心。时间拖得越久，即使他来信，也说明有勉强之意的可能性。眼看这个礼拜就要过完，今日至冬哥说的日期足足十多天矣。

虽五天才能到，但“按理”也该来了。

你的诗写得很有感情，我看到描写 D 之子一段。鼻子直发酸，我敢发誓不是“过敏性鼻炎”发作。不知冬哥如何想，他的笔谈之体会，我一定会抄给你。D 之子何名？

你的字写错了吧？“但要劳驾你别抄一份寄去。”我可用双引号给你括下来了，连下面的表重要要的圈圈也一个不少，我差点把你的“字”又塞进信封，定睛一看，啊，她还要“遵守自己的诺言！”赶快住了手。

说实在的，我应该给你授予“开路先锋”的称号：每次我怀疑信寄不到或者失望了一天又没信而绝望时，你的信就来了！

“腹存躁心非君臣”，我懂，但鄙人认为需改之：“我终非君亦非臣”。“车到山前必有路”，什么路？回原籍？啊，多谢！俺不去。让别人掌握自己的命运比死还痛苦！同软禁有何异？

刚才在封信之前，苦心挤出几滴血，作为给 D 的信之结尾，你与他是一样的，故再抄一遍：

已是佳时无烟花， 萧风依旧点滴洒。
岂怕弥天浓云雾， 笑看西山五彩霞。
面对千里遥遥路， 敢踏万倾茫茫沙。
携手共行人生途， 心心相随海天涯！

你看，三四十分钟就这么几句，真不好意思！诗兴久去，何日方返？盼！盼！

红.

七四年三月二十日 p. m.

艾同志，明明一切的一切全是该死的林贼造成的，“消息不灵通”奈何吾辈乎？莫非我与 D 定了“攻守同盟”或背着你搞“阴谋诡计”？呜呼！我说不出话来！两个蛮大的人

竟然成了“一个次要因素”！？主啊，吾终身为汝之臣民也，如何今日否之？“因素”者，非人也！主！看吾效劳二十年之情分，将其收也！

“1/2 次要因素”

p. m. 12.



五十年代末，一家五口摄于哈尔滨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录入：忆 陵（辛 乙）

本期责编：启 之

本期校对：笑 谈